
蘇軾研究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63 期）

（季 刊）

卷首语

致敬先贤、缅怀先贤，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未竟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十不惑，自当明白，逝者已矣生者责任重大，今后要戮力为经济困窘的苏学老专家老学者、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学术专著的出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少留遗憾，多留遗产。四十不惑，还当明白，始终抱定天下苏研一家亲的执念，少些对头多些碰头，少讲格律多讲格局，少出成见多出成果。四十不惑，更当明白，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才能珍惜今天，所有的成功都奠基前人茹苦含辛、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执著与坚韧；薪尽火传，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共同温热的酒，共同品过的茶，共同座过的谈，共同论过的文！



研究 SUSHIYANJIU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63 期）

（季 刊）



目 录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苏轼研究》编辑部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主 编：周裕锴
□副 主 编：潘殊闲 方永江
□责任编辑：刘清泉
□编 辑：袁 丁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印数：2000 册
发送：苏轼研究学者、爱好者，有关高校
及图书馆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特 稿

- | | |
|------------------------------------|--------|
| 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总结 | 周裕锴/04 |
| 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告 | 秘书处/06 |
| 四十不惑铸风流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40 周年纪略 | 方永江/08 |
| “三能”杭州眉山情
——在中国杭州苏东坡主题文化邀请展上的致辞 | 方永江/15 |
| 苏轼研究：可持续路上行稳致远 | 袁 丁/16 |

□苏学论坛

- | | |
|--|--------|
| 试论苏轼的教育思想 | 周裕锴/18 |
| 从苏轼做人看家庭的教育与影响 | 杨胜宽/24 |
| 论苏轼“和而不同”教育思想的价值
——以苏轼门人“同”与“不同”为视角 | 喻世华/29 |
|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 王晋川/37 |

□顾问：慕新海 胡元坤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尚荣
张志烈 苏 灿 邱俊鹏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王启鹏 刘川眉 刘小川
刘清泉 孙开中 朱 刚 陈才智
冷成金 李景新 宋明刚 杨胜宽
杨常沙 张海鸥 张 鸣 张忠全
张国文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袁 丁 康 震 韩国强 喻世华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苏轼“内圣外王”的教化之道 杨吉华/42
在“学”与“不学”之间 戎恺凯/50
陈秀民《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杜春雷/56

□诗文鉴赏

苏轼廉政诗文点评二则 饶学刚/61

□新书序评

《苏轼十讲》前言 朱 刚/65
熊朝东《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读后 方永江/66
《十年史料汇编》后记 刘清泉/68

□研究史话

第一章 “经纶不究于生前”（二） 曾枣庄/70

□苏学专家

张炜的东坡情缘 刘川眉/72

□景苏札记

我的邻居苏东坡 刘小川/74
苏东坡：一轮叫婵娟的月亮 许 岚/76

□苏学动态

三苏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举行 唐雅兰/78
“三苏与眉山”中秋沙龙举办 有 愚/78
四川历史名人丛书推广启动仪式举行 唐雅兰/78
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举行 熊 莉 有 愚/79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四川交流经验 熊 莉/80

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总结

周裕锴

2015年10月16日，全国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在西华大学举行。期间，召开了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张志烈会长辞去会长职务，把接力棒交到我手里，迄今整整五年了。五年来，在广大会员、各位理事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传播活动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作简要总结。

一、学术活动

本届理事会任职期间，学会主办挂届的学术活动，举办了4次，推迟举办1次。

2016年6月10—13日，“全国第20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收到来自20个省市，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论文150多篇。

2017年8月22—25日，“纪念苏轼葬郑915周年暨全国第21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平顶山学院召开。收到20多个省市的论文121篇、专著6部。

2018年4月20—22日，“第3届东坡居詹文化思想研讨会暨全国第22届苏轼学术会议”在海南大学召开。收到两岸三地提交的会议论文103篇。

2019年4月19—21日，“全国第23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收到会议论文100多篇。

2020年3月下旬，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全国第24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收到会议论文129篇，因新冠疫情原因推迟到2021年3月下旬举办。

学会参与不挂届的学术活动若干次。2015年12月1—3日，第六届（惠州）东坡文化节举办“苏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发布暨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2016年9月6—7日，第七届（黄冈）东坡文

化节举办黄州东坡禅学研讨会；2016年11月3—4日眉山，举办“苏东坡法治思想与实践论坛”；2016年12月22日黄冈，举办“纪念苏东坡980周年诞辰学术报告会”；2017年11月22—26日，“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举办首届（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2018年9月28—30日眉山，举办“第二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2019年9月10—12日眉山，举办“苏东坡税收思想研讨会暨减税降费与开放对话”；2019年9月19—20日眉山，举办“三苏清风廉政文化研讨会”；2020年10月27—29日眉山，举办“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2020年11月9—11日，举办“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扩大会议”等。

二、传播活动

本届理事会任职期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举办了两次全国性交流活动。2015年10月22—24日宜兴，举办“第三届全国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传播交流活动”；2017年11月22—26日眉山，配合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举办了“第四届全国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传播交流活动”。

受眉山市东坡区教育体育局委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举行“传承东坡文化”骨干讲师团培训活动，从2017年9月开班以来，组织外出游学4次，专题讲座10次，学员讲座29次，经过2年培训，结业学员29个。2019年10月，从报名的中小学青年优秀教师中，择优录取第二期学员30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暂停培训将近一年，现在已启动培训。

2016年至2020年，按时出版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刊《苏轼研究》（季刊），免费邮寄会员，以

达到会聚苏学专家、交流研究成果、追寻东坡遗韵、展现三苏风采的目的。

2020年1月至2021年2月,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潘殊闲,应邀在成都、眉山、重庆作苏东坡专题讲座20多场。

另外,举办端午、中秋沙龙活动若干次,每次一个主题,形式活泼,如2019年9月19日,举办了苏东坡与他仰慕的前辈诗人沙龙活动;苏轼诞辰寿苏活动、清明节祭祀活动也年年如期举办。

三、研究成果

学会会员出版的专著、传记、注评等不胜枚举。

方永江主编《苏轼“立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方永江著《且思——苏祠外浅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曾枣庄著《三苏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喻世华著《苏轼的人间情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陆雪卉《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的心路依归研究》(九州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熊朝东著《苏轼人生风范》(中国方正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何晓苇、杨兴玉、方永江主编《东坡西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蔡世华、管仁福编著《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王友胜著《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胡先西著《龙川略志译注》(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谈祖应著《三苏醒世哲言》(当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刘小川著《婉约圣手秦观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谢飞、夏文峰编著《雪浪石》(文物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熊朝东著《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巴蜀书社2019年5月第1版),高智笈注《苏轼〈海外集〉笈注》(巴蜀书社2019年6月第1版),张花氏著《东坡茶》(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朱刚著《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第1版),李常生著《苏轼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2019年8月第1版)、《苏辙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2020年6月第1版),陆志成著《苏东坡与颍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李公羽著《峻灵独立秀且雄——苏东坡昌化江遗踪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张志烈、潘殊闲著《苏东坡传》(天地出版社2020

年12月第1版)等。

其中,《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包括《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苏辙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380万字,巴蜀书社2018年2月出版。该丛刊是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轼研究中心的重点项目,也是曾枣庄一生从事三苏研究的论著集成,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宋明刚主编《苏轼全传》共15册,作者分别为张忠全、赖正和、刘寅、宋明刚、熊朝东、徐新民、陆明德、刘清泉、王晋川、胡正清、李云、蔡心华、王启鹏、李景新、邵玉健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是迄今为止最具体、最详尽的苏轼传记。

四、学会发展

本届理事会任职期间,发展会员83人;增加副会长7人:潘殊闲(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木斋(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增加理事36人。

本届理事会任职期间,支持地方或单位成立苏轼研究的学术组织或科研机构3个。2017年1月成立的广东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2017年成立的四川工商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2018年12月成立的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得到我们学会的大力支持。

五年时间,转瞬即逝。我的总结,不尽完全,请各位会员、理事审阅,并提出建议、意见。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告

秘书处

2020年11月10日，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第六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召开了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主要包括修改章程、发展会员、增加理事、总结工作和换届选举等有关事宜。主要成果是总结了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成立了第九届理事会，从而开启了苏轼研究的新征程。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

第二十四条“本团体的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三款“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修改为“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等理事会成员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若不再担任理事会职务，仍保留“名誉”理事会头衔，如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名誉秘书长等。”

第二十六条“本团体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任期10年”，修改为“本团体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等理事会成员任期10年，若不再担任理事会职务，或者因故辞职的理事会成员，仍保留“名誉”理事会头衔，如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名誉秘书长等。”

二、2020年发展会员名单（8人）

万赓/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四川轻化工大学行政办公室副主任、教授

王永波/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崔铭/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

邓静/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翟晓楠/四川大学文学硕士，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助理馆员

卓夕又/台湾东吴大学文学硕士，成都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张本刚/徐州矿务集团党委工作部高级政工师，徐州市苏轼研究会副秘书长

许岚/作家、诗人、文化策划人

三、新增理事（9人）

李常生/台湾城乡风貌工作室主任

万赓/四川轻化工大学教授、行政办公室副主任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伟东/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教授

崔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阮怡/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余红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眉山分院副研究员

张国文/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编审、《苏轼研究》编委

陈仲文/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

四、第九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72人

会长 1人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会长 7人

潘殊闲/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师

木斋/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海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

秘书长 1 人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

副秘书长 5 人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罗宁/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戴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李公羽/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
 魏新建/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

常务理事 8 人

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汉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社科联副主席
 金生扬/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熊朝东/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新闻中心原总编
 刘小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
 王书华/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编审

理事 49 人

吕肖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彭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李景新/海南热带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原院长
 王琳祥/黄冈市赤壁风景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胡先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苏慎/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
 齐会斌/凤翔东湖风景管理处主任
 尧军/吉奥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
 何晓苇/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

授、副院长

方星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刘继增/河南郑县文体局原局长、郑县苏轼研

究会副会长

杨常沙/眉山市政协副主席
 刘川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晋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心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院长
 程磊/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
 彭文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由兴波/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维玉/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三苏文化

研究所所长

喻世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审
 王渭清/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程刚/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许外芳/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教授
 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松冀/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高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
 庆振轩/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方新蓉/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衣若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中文系教授

安熙珍/韩国檀国大学中国语系教授
 江惜美/台湾铭传大学华语文教学系教授
 管仁福/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苏轼研

究院院长

海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张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杨吉华/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苏子营/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
 袁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
 周云容/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副馆长
 彭林泉/眉山市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李常生/台湾城乡风貌工作室主任
 万焱/四川轻化工大学教授、行政办公室副主

任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伟东/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教授
 崔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阮怡/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余红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眉山分院副研究员
 张国文/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编审、《苏轼研究》

编委

陈仲文/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

四十不惑铸风流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纪略

方永江

“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自1980年9月在眉山三苏祠成立以来，走过了金色少年不惧青涩、三十而立开创新局、四十不惑铸就风流的不平凡路程。今年9月，适逢学会成立40周年，原计划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如期开展。在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学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编辑出版《十年史料汇编》（在2010年9月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三十年回顾》）和全国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评选颁奖，被纳入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同时学会召开了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和东坡教育思想论坛。2020年11月9—11日，活动热烈、简朴、隆重举行，成果丰硕，将转化为眉山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的强大智力支持，得到充分转化和运用。现就活动中学会成立40周年的事项略作纪录。

一、十年精彩回放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挂届的学术研讨、高峰论坛、文化节之类，因其专业、规则，因其学术性、严肃性，我称之为“主旨演讲”；此间的回放，精彩在于开放、率性，在于可读性、趣味性，我视之为“散打补白”。

（一）建设三苏研究资料索引数据库

为传承三苏文化，推动三苏文化研究，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加强校地合作，2010年1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学会秘书处）与乐山师范学院签订协议共建三苏研究资料索引数据库。该项目2011年11月如期完成。为了强化成果运用，2018年11月，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又与三苏文化研究院洽谈“百年三苏研究数据库缩影”交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事宜，目前，进展顺

利。

（二）首届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传播交流活动

2011年7月22—23日，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传播交流活动”在眉山隆重开幕。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注意传播的可接受性。就东坡文化的内容而言，应该了解苏轼的哪些生平事迹？应该阅读苏轼的哪些诗词文赋？应该学习苏轼的哪些精神品质？就东坡文化的形式而言，应该采取老师讲授还是学生自学？应该采取课堂形式还是课外形式？应该采取听说读写还是情景表演？由于学生年龄特点不同，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生对东坡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可接受程度不同。如果不注意学生的年龄特点，一刀切，就可能损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挫伤学生走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热爱苏东坡。二是注意传播的可活动性。把传播衍化成游戏，因为“游戏是孩子的天职”；把传播衍化成活动，因为活动是学生的最爱；把传播衍化成文学，因为文学是形象的载体。游戏、活动的文学的传播形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为单位和以活动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可以不断激发学生的热情、兴趣，从而主动、积极地接纳、传播，从而不知不觉地受到东坡文化的浸润、影响，因东坡之风的熏陶渐染而有东坡之风。

（三）苏东坡酒文化高峰论坛

2011年12月20日，眉山市首届“苏东坡酒文化高峰论坛”在岷江东湖饭店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原省长宋宝瑞，文化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赵维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理事长、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副主席程路，眉山市有关领导出席论坛。三苏酒业“苏东坡酒传

统酿造技艺”今年被正式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会上,四川省酿酒协会组织的中国著名白酒专家一行9人对三苏酒业的“非遗·古窖”系列新产品进行了鉴评,给予高度评价。宋宝瑞为三苏酒业“非遗”授牌。

(四) 张炜主讲《数字时代与东坡文化》

2011年12月26日,由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山东省作协主席、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主讲的专题讲座《数字时代与东坡文化》在眉山举行。张炜认为,苏东坡是位世界级伟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眉山作为苏东坡的出生之地,值得每一个眉山人骄傲和自豪,只要紧紧把握住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眉山的文化建设便可大有作为。张炜还与现场听众开展了互动问答,并为广大读者举行了其获奖小说《你在高原》的签名仪式。听取讲座的有眉山市相关领导、作协会员、文化界和市级部门有关人士,以及社会各界的热心读者共300余人。

(五) 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举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成立

2012年11月16日是苏辙逝世90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在眉山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承办。在开幕式上,时任眉山市委副书记刘十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时任眉山市政协主席王影聪宣布开幕,时任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久伦、眉山市政协副主席杨常沙出席了开幕式。研讨会由原眉山市政协主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苏灿主持,来自法国以及我国台湾、广东、江苏、江西、河南、河北、湖北、山东、海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张学松,台湾苏学专家江澄格,法国凡尔赛大学博士刘昊旻等18位学者先后发言,就苏辙的生平、思想、作品和遗址等进行探讨。四川大学教授、时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作了总结综述。本次研讨会征集到论文40余篇,这些论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视角独特、见解新颖,赋予了三苏文化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鲜明的时代感。择优39篇,计38万字,编辑成《苏辙研究——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任中共眉山市委书记李静作序,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多方面填补了苏辙研究的学术空白,意义十分

重大。研讨会的召开,既是眉山文化建设的重大活动,也是苏轼研究的重要成果,进一步展示了眉山坚定不移推进“文化立市”战略的决心和勇气。

当日下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

(六) 《苏轼全集校注》获中国图书奖

2014年初,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苏轼全集校注》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由四川大学几代学者耗时20余年编纂完成,共20册80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全、最新、最权威的苏轼全集校注本。该书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坡乐府笺》为底本,对苏轼的诗、词、文进行了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的“五通”工作,不仅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对原本失校之处进行了重新校正,而且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在考订编年、征典释义等方面均取得新成果。该书是一部对苏轼及苏集既具总结性又具开创性的大型著作,对学术发展、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七) 穿越千年,对话东坡

2015年8月21日,著名作家贾平凹、孙绍振、谢有顺来到眉山,与近300名东坡文学爱好者相聚,共话苏东坡。“人人都喜欢他,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真正懂他。”贾平凹说,苏东坡是绝代的天才,且有着旷达的心胸。其人就像一个天然磁场,吸引着不同的人。然而,有着旷世寂寞的苏东坡,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贾平凹说,要读苏东坡的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人。不了解作家全部的东西,有时候就不能懂,他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好,好在哪里。所以,对于苏东坡,除了要了解他的文字,还要了解他的书法、绘画,以及他的政治、经济、人文活动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苏东坡。苏东坡参透了天地人生,一生写抒情性的东西,脱口而出,不矫情、不做作。他经历了很多苦难,有着旷世的寂寞。他把生命融进写作,这就是写作的“在场”。现在留下来的苏东坡脍炙人口的名句不只是词句优美,还都富含哲理。在一些论辩的文章中,有着对人性独到的见解。他的性情,沈从文形容得分毫不差,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的真性情“害”了他的仕途和入世的生活，他的官职不是那么大，还遭到政敌的陷害，一生孤独失意。但苏东坡对父母、兄弟、爱人的感情都很强烈，这种爱让他战胜苦难，成为了思想家。贾平凹、孙绍振、谢有顺一致认为，苏东坡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无论他身处什么困境，写出的文章都没有刻薄、抱怨，而是刚健、明亮，能滋养别人。谢有顺说，20世纪以来，关注黑暗面的作品太多，人的善良、温暖体现得不够，其实应该向苏东坡多学习。

（八）苏轼入选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

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启动了“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2017年2月，《关于做好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下发，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的评选设定了六个入选条件：卒年在辛亥革命以前；出生地、祖籍地、成长地、旅居地在当地；在当地有故居、遗迹、遗址等历史遗存；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思想著作或功绩有当代价值。截至4月15日申报结束，各市（州）推荐申报四川历史名人共144位。7月4日，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对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复选名单进行了审议，最终确定首批十位四川历史名人，北宋大文豪苏轼入选。作为“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特邀的知名专家，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强烈推荐苏东坡，他的推荐理由是：“（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全面性、顶尖性、复杂性的文化巨星，国际上称为‘千年英雄’，是‘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永远的苏东坡！”

（九）《苏轼全传》出版

《苏轼全传》共15册，约300余万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策划启动，2016年9月完成书稿，2017年5月出版发行，历时三载有余，堪称苏学研究史上的鸿篇巨制。全传以时间为序、地域为界、事迹为脉、人文为髓，生动全面地诠释了苏轼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他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始终保持高尚的人品、艺格和官德的形象，真实客观反映了苏轼的政治生涯和艺术生活，乐观旷达情感丰富的精神世界。

（十）东坡文化讲师团游学凤翔

2017年11月5—10日，东坡文化讲师团培训学员一行30多人游学凤翔。他们从眉山出发，途经西安、周至、扶风、岐山、凤翔、宝鸡，追寻苏轼足迹，以实地考察的形式追寻青年苏轼做官、游历和生活的足迹。本次游学活动有四个特点：其一，游。指考察苏轼遗址遗迹和浏览沿途的古迹，重读苏轼的相关诗文，并亲身莅临其场景；其二，学。每到一地，与当地苏学专家和学者交流学习，深入了解当地的苏轼掌故、地方文化；其三，研。游学途中遇到问题随时研讨，学员做到每日一悟，游学结束前认真梳理感悟和收获，并作总结发言，由专家点评；其四，记。游学途中随身携带笔记本，做到眼记、手记、心记，游学结束后有游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孔子周游列国治学精神即为现代的游学始源。游学结束后，学员和老师们用游记、散文、诗歌、歌曲等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本次活动的感受和体悟，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感觉苏轼的形象更鲜活了、更立体了，苏轼的诗文也更亲近了、可爱了。“东坡文化讲师团”成立于2017年9月，是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联手东坡区教育体育局共同开办的培训班，旨在培养传承宣讲东坡文化的骨干教师团队。

（十一）话剧《苏东坡》巡演苏轼遗址地

2018年6—7月，由眉山市和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苏东坡》全国巡演相继登陆黄冈、惠州和海口等城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话剧《苏东坡》历时三年，六易其稿，剧中创造性地融入了川剧的“帮腔”、眉山方言俚语，以及戏曲中的“串场人”角色，使戏剧与戏曲完美融合，令人耳目一新。在剧中，一边上演着古人古事，一边穿插着今人今论，将戏剧内容和评述相结合，既客观展现东坡的人生际遇，又主观表达他的内心世界。2018年3月，话剧《苏东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此后5个月时间，剧组沿着苏东坡的人生轨迹，分别在四川、重庆、湖北、广东等地的10多个城市演出30多场。眉山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说：“此次话剧《苏东坡》首轮全国巡演取得很好效果，所到之地都引起热烈反响。通过巡演，进一步传承了东坡文化，提升了眉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东坡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进一步修改完善，努力把话剧《苏东坡》打造成精品，不断扩大东坡文化的影响，

把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和市委市政府确立的“文化立市”战略推向深入。”

(十二) 学会两次在四川历史名人研究推进会上做经验交流

为进一步推进四川历史名人的研究交流、传承创新工作，2020年11月20日，“四川历史名人研究工作推进会”在成都举行。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作了题为《苏轼研究：可持续路上行稳致远》的经验交流。本次活动仅推举3个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中心或研究会作经验交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是全省众多历史名人研究会中唯一一个。

近年来，眉山市大力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认真落实市委慕新海书记在市“两会”上关于建好研究院、用好研究会指示精神，不断拓宽苏轼研究新领域，设立并颁发全国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有序推进东坡文化讲师团培训和定期开展主题沙龙文化惠民活动，探索出了一条苏轼研究可持续发展之路，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受到大会充分肯定。

上一次全省历史名人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是在2018年11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同样作为四川省首批10个历史名人研究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作《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经验交流。

(十三)《东坡西湖研究》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

2019年10月31日，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在成都颁奖。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与乐山师范学院合作的《东坡西湖研究》(专著)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奖。《东坡西湖研究》是眉山市唯一获奖的专著，该课题历时五年、数易其稿，从东坡西湖这一维度切入，生动的展现了苏轼浚治西湖、赏玩西湖、咏写西湖的历史画卷，并扣住“君子如水”之意，凸显了苏轼与西湖的精神关联。全书材料丰富，题旨鲜明，文辞雅致，论证充分。编著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东坡西湖缘、东坡西湖图，扼要阐发了东坡西湖的意象谱系、理水德迹、思想始基，并且围绕许州西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以及雷州西湖，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东坡西湖的意象谱系。本书可供苏轼研究者、西湖研究者、古代文学爱好者、旅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高校学生学习参考，是一部价值高、应用性强的学术专著。

(十四) 创作《寿苏轼文》、《祭三苏文》

为苏轼诞辰、清明或其他重大活动日，祭拜苏轼(三苏)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寿苏文、祭苏(三苏)文，学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学者创作了《寿苏轼文》和《祭三苏文》。2020年1月13日，眉山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苏学专家、苏氏宗亲，以及市民代表、学生代表、企业代表、文学艺术界人士，齐聚三苏故居，纪念苏轼983周年诞辰。此前，苏学专家创作了《寿苏轼文》；此后，常州等苏轼遗址遗迹地以《寿苏端明文》等不同形式广泛运用。其文曰：

孙氏书楼，文脉昭彰。孕奇蓄秀，郁然栋梁。景祐丙子，公生穀行。崇仁尚义，浩气善养。奋厉当世，慨而以慷。挥帚连螯，初露锋芒。

朝发眉州，清风江上。山间明月，尘寰朗朗。名动京师，忠厚刑赏。人呼贤良，初仕凤翔。历典八州，功在四方。宦迹十六，是处吾乡。五日登州，千载以飨。实以治称，非只文章。

经国大业，引领风尚。词开一派，尚意首创。铜板铁琶，挽弓射狼。英雄柔情，西湖波光。举杯对影，夜雨对床。寓意远景，痴心守望。文化自信，惠风和畅。桃寿千年，非遗琳琅。羹肘鱼丸，真一佳酿。茶菹饼酥，清欢味长。

苏轼眉山，百业兴旺。眉山苏轼，奕世其昌。

2020年4月3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眉山部分苏学专家代表在濛濛细雨中前往苏洵家族墓地祭拜三苏。此前，苏学专家创作了《祭三苏文》；最近一次的使用是在11月13日，由民革中央主办、民革四川省委承办的“在陆台胞同心活动”上，祭拜三苏，诵读了由三苏祠提供的祭文。其文曰：

岷山之阳，来凤栖凰。灵秀江乡，并蒂呈祥。眉山苏氏，源出唐相。苏序行状，精识远量。乐善好施，一时无俩。明允博辩，游学四方。俯仰宇宙，排山走浪。

夫人亲授，礼义文章。嘉祐二年，魂归天堂。治平二年，王弗卒亡。没不待年，老泉西往。自汴入淮，沿江扶丧。道大才高，时运何伤。颇不合宜，迁逐遑遑。随僧一饭，凝泪成霜。岁更三黜，隔海相望。生当作棺，尤为凄凉。靖国元年，轼殁于常。政和二年，

辙止颍昌。

哀哀二子，恨不归葬。斯邦修文，衣冠其旁。乡人崇礼，永祀以享。惟松与篁，咬定山冈。家族墓地，此心安放。文化自信，赓续荣光。三苏精神，传承弘扬。奋厉当世，苍生为上。报国之心，没齿难忘。

主题公园，公与武阳。流连忘返，懿德流芳。清明来祭，掬之馨香。菊香袅袅，春溜泱泱。春溜泱泱，山高水长。山高水长，尚飨尚飨。

（十五）郦波“三苏祠”开讲

2020年5月9日下午，郦波走进三苏学社文化沙龙，以《三苏诗词与当代精神》为题，解读从眉山走出的“一门三父子”。郦波从三苏父子说起，讲到了三苏父子如何成为人生范本，当代人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郦波认为，苏东坡是苦难造就出的一位“偶像”，正是因为苏轼在官场失意，转而将精力投入艺术创作、投入生活，进而才慢慢进阶成一位伟大的意境超然的文学巨匠。此外，郦波还分析了苏辙和苏洵的人生轨迹，倡导大家学习苏辙的行动力与苏洵不断丰富思想充实内心的思考力。郦波从小在圣贤孔子的老家山东曲阜长大，他说“眉山与曲阜都是诞生过伟人的城市”，他从文化的角度寄语传承，“希望我们的城市气质与建设中带上‘三苏文化的基因’，让‘三苏文化’深入人们的生活，走进人们的灵魂。”

二、颁发全国“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

眉山生三苏，草木自葱茏。作为三苏故里眉山，主动扛起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的大旗，2009年召开了首届全国苏洵学术研讨会、2012年召开了首届全国苏辙学术研讨会，今天（2020年11月10日），又在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国际高峰论坛之时颁发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

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的颁发源于一段感人至深的情缘。痴迷东坡三十载，跨国追随半世情，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眉山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苏学专家、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女士生前先后4次来到眉山，参加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参与对苏学的研究。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之时，罹患绝症的唐凯琳女士毅然决然停止治疗，应邀赴眉，来与她深爱的苏轼、深爱的眉山、深爱的四川、深爱的中国，

以及一生敬重的恩师和恋恋不舍的友人，作最后的道别！她不仅拒绝了报销机票，高峰论坛后，她又把主办方付与她的主旨演讲报酬捐赠给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为了让唐凯琳女士的善举和爱心得以传递，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特别设立了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由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为组长的专家评审组，从《苏轼研究》2019年第1期至2020年第2期刊载的论文中评选青年学者（45岁以下）优秀论文给予奖励。此间刊载的论文中有18篇青年学者论文符合要求，经专家评审组的严格筛选，评选出了5篇获奖作品，分别是：张洵的《苏轼古文在江户时期的接受与批评空间》、万燚的《美国学界的苏轼贬谪心态研究》、徐建芳的《〈周易〉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杨吉华的《苏轼理想人格追求的双重困境与自我突围》、卓夕又的《汪紱〈苏轼论〉评议》。周裕锴教授为之撰写了精彩的授奖辞：

张洵《苏轼古文在江户时期的接受与批评空间》，该论文全面介绍了苏轼古文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接受情况，梳理了江户各个阶段的学术思潮与苏文评价之间的关系，展示出在该时期中国明代朱子学、前后七子、唐宋派对日本文坛古文辞派、古义学派的影响，由此揭示出苏文评价由低到高的过程及其原因。论文选题颇有学术性，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为开拓域外苏轼研究的新领域作出较好的贡献。

万燚《美国学界的苏轼贬谪心态研究》，该论文介绍了四个美国汉学家研究苏轼贬谪心态的著作，能提纲挈领地概括其不同观点，如金斯伯格讨论了苏轼如何使自己与隔离开的世界再度调和的心态转变，唐凯琳剖析了苏轼有意将贬谪传统转化为隐逸传统的精神寄托，艾朗诺认为苏轼“和陶诗”是疗救其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杨治宜则认为“和陶诗”是苏轼从自然撤回到内在的乌托邦。作者主张借鉴他山之石，在苏轼研究中追问“为什么会这样”，采用更动态立体的视角和方法，这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

徐建芳《〈周易〉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该论文通过研究《东坡易传》对《周易》观点的理解和解释，探索出其审美鉴赏论的主要哲学来源。如《周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对其兼容并包的审美态度的启

迪,“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其辩证的审美思维模式的启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对于审美活动取决于主体素养的观念的影响。论文挑战学界关于苏轼文艺思想主要源于庄子的主流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用比较的方法分析论述,逻辑严谨,论证充分,结论令人信服。

杨吉华《苏轼理想人格追求的双重困境与自我突围》,该论文从道德人格“君子”的缺席和理论悬置、“君子”缺席的政治斗争复杂性的现实原因、“君子”缺席中两个自我的内在调和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苏轼理想人格追求的双重困境以及面对困境的自我突围。论文不纠结于苏轼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君子的讨论,而是从君子理想预设、君子实现路径、个体特殊性等三个角度,分析以苏轼为代表的集文人、学者与官员三位一体的宋代士大夫的自我内在冲突与弥合斗争的复杂性。其分析颇有理论深度,对于实事求是研究和评价苏轼具有一定的鉴戒意义。

卓夕又《汪绂〈苏轼论〉评议》,本文对清儒汪绂的《苏轼论》作了透彻的解读,通过与《朱子语类》的对比,指出其误解朱熹观点之处。又通过宋代史实记载与王安石新法的讨论,辨明王、程、朱的专制思想倾向与苏轼的区别,以及汪绂论苏的颠倒黑白之处。再由《苏轼论》揭示出朱熹对苏轼的评价在后世理学门徒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对汪绂《苏轼论》的虚夸无实、偏激失当、自相矛盾的论点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逻辑严谨,引证翔实,对宋代王学、苏学和程朱理学都要较中肯的理解把握,结论发人深省。

从苏轼出发,从全世界回来。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的设立和颁发,旨在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到眉山朝圣,旨在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苏轼研究的行列中来,让苏轼研究走向青年,走向群众,走向世界,使东坡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亮”起来。

三、编辑出版《十年史料汇编》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十年史料汇编》(2010—2020年)分为上下两册,包括学术活动、学会发展、苏学专家和新书序评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大致以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学术活动

包括第七届理事会(2010/08—2015/10)、第八届理事会(2015/10—2020/09)的工作,分别以年度为单位分类编排,每一年度之前设置工作大事记,之后设置相关资料附录;学会发展包括会员发展、理事变动和会刊编辑等内容;苏学专家、新书序评两部分,则按照会刊《苏轼研究》刊载相关内容的顺序编排。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十年史料汇编》客观生动地展示了苏学专家的风采,这个群像中,既有著述等身的学界达人,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确实令人倍感欣慰。“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销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苏轼《行香子》携手江村)作为中国脐橙之乡、中国柑橘之乡、中国椪柑之乡的三苏故里,眉山正是瓜果飘香、喜迎丰收的美好时节,睹物思人,分享喜悦,我特别怀念那些在这十年期间驾鹤而去的先生。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孔凡礼先生

2010年8月20日,孔凡礼先生因病逝世。刘尚荣顾问特作《千秋岁二首》为孔先生祈冥福:

星霜流换,孤彩横天半。宋词补,苏集变。放翁悬案多,元量亦非贱。无所好,一生兴致唯开卷。垂暮逢清晏,堆案书山乱。学友见,皆惊叹。不移立壑志,著述名山愿。翘首处,鸿篇巨帙非虚幻。

星移物换,岁月销磨半。人虽老,因时变。素心诚可贵,岂信古书贱。抒壮志,研读整理万千卷。难料温泉晏,月冷行云乱。竟撒手,须忧叹。芸编清理罢,告慰平生愿。公去也,流芳百世谁云幻。

(二)晚年惟一记忆是宋词的刘乃昌先生

2015年2月2日,刘乃昌先生因病逝世。山东大学王培元教授深情追忆:“最近四五年时间,老先生患上阿兹海默症,惟一没有忘记的,就是学术研究。”“老先生刚患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你一跟他提学术问题,比如说到宋词,他立刻就会目光炯炯,跟你聊起来。”王培元说,有一次他去家里看老先生,跟先生聊到宋词,老先生赶紧回自己书房,拿出他出版过的相关书籍,仔细给他解释。“后来师母为了防止先生病情进一步发展,经常请他谈自己过去发表的文章,来调动他的思维活动。”

(三)魂兮归来,“万里家在岷峨”的唐凯琳

先生

2019年3月3日，唐凯琳先生病逝。周裕锴会长沉痛悼念：“今天听到她病逝的消息，整个上午脑海中都是她的音容笑貌。去年秋天她来成都、眉山，与她最爱的东坡先生告别，拖着病体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她是我的朋友，也是成都人、眉山人、中国人的朋友。此刻，她的灵魂已到了天国，在那里定能得到安息！”

（四）英年早逝一曾涛

2019年4月11日，曾涛先生不幸病逝。天妒英才，令人扼腕。菏泽学院潘守皎教授说：“曾先生以忘我的精神，在最后的时光里，孜孜于学术，完成了心心念念的苏学著作，实在令人感佩！”湖南科技大学王友胜教授说：“我和曾涛兄认识才半年，但常微信联系，彼此点赞。我查看了一下，他发朋友圈止于2月12日，离今天刚好两月。我猜想，这两月他一定在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在《三苏文化大辞典》的编写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达观、热情，做事极认真、投入的人。”

（五）默默的耕耘者赖正和先生

2016年6月11日，赖先生撒手人寰。我撰写了《生死一脉》表达深深的哀思：“赖先生病中，我多次想去医院探望他，并就一同参与的文化策划项目向他求教。乐观豁达的他婉拒了，说小病小痛的，要不了多久就出院了，有啥事到再说。正和师的脆爽，我是耳闻目睹了的。2009年8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一讲成名的康震先生来眉，基于对苏学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着，慈眉善目的正和师与温良谦和的康震先生有了一场针锋相对又开诚布公的对话，场面如盛夏眉山的天气一样火爆。两位学者一个言辞恳切，一个从善如流。相惜相敬，一展文人相重的君子之风。6月1日，我趁学会年检的机会去成都，终于站在先生的病榻前了。此刻的先生，已处于时断时续的昏迷状态，我泪眼朦胧地拉起他的手，他的手指竟动弹了几下。一脉相通，因为苏轼；一生相许，他有诸多不舍，因为苏学。4月28日，是我与赖先生共同替苏学跑腿的最后一次交集。斯时，我们为程夫人公园建设通关文牒。赖先生念念不忘北京之行，还说想去故宫看看。还有他为之殚精竭虑写作的《高处不胜寒》（《苏轼全传·开封卷》），也在等待付梓。这些都成了未竟的事业和未了的心愿，每每想起，不禁悲痛万分。”

我在《十年史料汇编》中没有读到一篇怀念赖正和先生的文章，却见到了柳絮先生的《潜心

研究，独出奇谈》，那时的赖正和先生是以“苏东坡的卫士”、苏学专家面世的。最让我揪心的是，“近日，正和先生对我说，安徽有个叫史钧的大学教师出版了一本《苏东坡这个人》，用十分下流的语言给苏东坡泼脏水。正和先生非常气愤，想把自己近几年写的苏学论文结集出版，以对抗史钧散播的坏影响。可是，现在的出版社多以求利为目的，不肯出版这种赚不到钱的纯学术著作，有关部门又不肯给予补贴，‘难产’就在所难免了。但他并未放弃结集出版的想法。他打算自己筹措一些出版经费，再求苏东坡的铁杆粉丝（有钱的）资助一些。我听他这么说，既佩服他的执着，心里也涌起阵阵难言的酸楚。但愿他的论文集能够面世。”我虽于正和先生及其他学者学术专著出版，给予了些微的帮助，但总觉太少太少，而如正和师这样的心愿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致敬先贤、缅怀先贤，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未竟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十不惑，自当明白，逝者已矣生者责任重大，今后要戮力为经济困窘的苏学老专家老学者、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学术专著的出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少留遗憾，多留遗产。四十不惑，还当明白，始终抱定天下苏研一家亲的执念，少些对头多些碰头，少讲格子多讲格局，少出成见多出成果。四十不惑，更当明白，牢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才能珍惜今天，所有的成功都莫基于前人茹苦含辛、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执著与坚韧；薪尽火传，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些共同走过的路，共同温热的酒，共同品过的茶，共同座过的谈，共同论过的文！

所以，亲爱的人啊，希望您不要把这史料当作无生命无温度冷冰冰的纸，当作一堆枯燥无聊冷漠无趣乃至苍白虚无的文字；希望您能有一份内心的坚守，一次深情的回眸，触摸到那些滚烫的心，重温过去的光辉岁月和曾经璀璨的烟火，看得见那些温情脉脉血肉丰满的音容笑貌……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三能”杭州眉山情

——在中国杭州苏东坡主题文化邀请展上的致辞

方永江

各位画家、书法家，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今年9月1日至10月30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举世瞩目；12月2日，首个展现唐宋八大家家国情怀和时代风华的展览——“‘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今天，“中国杭州苏东坡主题文化（书画）作品邀请展”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盛大启幕，这不仅是杭州书画艺术界的大事、盛事、喜事，而且是所有苏轼遗迹遗址地的大事、盛事、喜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轼的生花妙笔是杭州最好的代言，怀揣着诗和远方的我们，能不忆杭州？苏轼从眉山出发，把他民本的政治理念、全能的文化才干、高尚的生活情操，带到杭州，成为杭州最重要的文化遗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想起苏轼在杭州创办的堪称我们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在2009年底，印象西湖和宋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杭州有关领导告诉我，杭州在建生活品质之城。在杭州的启发下，眉山在实施“文化立市”战略中，把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也作为了重要内容。他还告诉我，天堂在西方的语境下是另一个世界，杭州与国际接轨，不宜再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致力于建设爱情之都，最是令我怦然心动。中共四川省委赋予眉山建设开放发展示范市重任，形成大开放格局，眉山与杭州有着天然的契合。因为苏轼和王弗，因为他们生死与共风华绝代的爱情，眉山与杭州情感上又有着天然的亲密。这些，都让我深深地怀念杭州。

“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浙江是全国文化大省，杭州又是文化大省中的文化强市。学习杭州、借鉴杭州，能不到杭州？三苏故里眉山结合四川实施十大历史名人工程，强力推进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让东坡文化走出

书斋、走进社会、走向世界，使东坡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亮”起来，受到苏轼遗址地广泛好评。但是，我们深深知道，与杭州的差距还很大。就拿苏东坡传说申报非遗来说，也是难以望其项背，在2010年杭州即把她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我们2018年才申报成省级。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合作发展，和谐共进”，是2007年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眉山宣言》的主题。2017年，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首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苏轼遗址地十八城又共同发表了《东坡文化传承与当代城市发展眉山宣言》，进一步深化了合作的共识。加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不能没杭州。苏东坡不仅是中国千古第一文人，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他不仅是人们敬仰的旷世文化天才，还是医学、餐饮、养生等方面的通才，更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他卓越的创作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为人类塑造了崇高的人格和道德典范。东坡文化是苏轼遗址地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继承好、保护好、发展好东坡文化，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弘扬中继承，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永葆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这次主题书画展，就是传承发展东坡文化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和探索，衷心祝愿活动圆满成功！衷心希望杭州、眉山广泛开展各层级、多渠道的合作、交流，推动两市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真诚邀请各位艺术家来眉山传经送宝、作客叙情！谢谢大家！

2020年12月13日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会秘书长。

苏轼研究：可持续路上行稳致远

袁 丁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8年“四川历史名人研究工作推进会”召开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秉持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理念，牢固树立服务苏轼研究大局、服务地方党政中心工作意识，勇于创新，积极作为，不断拓展苏轼研究新领域，深入探索苏轼研究可持续发展之路，两年来，主要围绕整理研究、普及传播、发展壮大等方面开展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

一、研究领域新拓展

我会顾问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说：“说不全、说不完、说不尽的，永远的苏东坡。”的确，苏东坡身上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挖掘。两年来，我会以学会为主导，举办了多次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实现了苏轼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2019年至2020年，我会举办挂届学术活动一次：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了“全国第23届苏轼学术研讨会”（2019年4月），收到会议论文100多篇。原定于2020年3月下旬在徐州市举办的“全国第24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收到会议论文129篇，因新冠疫情原因推迟到2021年3月下旬。此外，参与或举办不挂届的学术活动多次。例如：2019年我会在眉山协办了“苏东坡税收思想研讨会暨减税降费与开放对话”、“三苏清风廉政文化研讨会”；2020年在眉山举办了“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等。在这些会议中，我们探讨了苏轼的税收思想、法治思想、廉政思想、教育思想、书法艺术、苏轼与书院文化等，力争从不同角度对苏轼进行深入解读，从不同侧面挖掘东坡精神、东坡文化，使苏东坡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丰满、更加深入人心。

二、研究力量可持续

研究力量的可持续是学会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会十分注重对青年学者的鼓励，对地方研究力量的团结、培养，争取吸收更多的力量加入苏轼研究队伍，实现研究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其一，苏轼研究的希望在青年，未来在青年，因此我会重视对青年学者的鼓励，特别设立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这个奖的设立源于美国著名苏学专家、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女士。她痴迷东坡三十载，曾4次到眉山追寻东坡足迹。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之时，邀请唐凯琳女士参加，她罹患绝症却决定停止治疗，应邀赴眉，来与自己深爱的苏轼、深爱的眉山，以及恩师和友人，作最后的道别！她不仅拒绝了报销机票，而且把主办方付与她的主旨演讲报酬捐赠给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为了让唐女士的善举和爱心得到传递，我会特别设立了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由会长、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为评审组长，从《苏轼研究》2019年第1期至2020年第2期刊载的论文中评选出5篇青年学者（45岁以下）优秀论文，给予点评和鼓励，并在今年举办的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进行颁奖。

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的设立，旨在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苏轼研究队伍，让苏轼研究走进青年，走进群众，走向世界，使东坡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亮”起来。

其二，团结、培养地方研究力量。眉山是东坡故里，是三苏文化的发源地。学会地处眉山自当主动扛起苏轼研究的大旗，发挥纽带桥梁作用。2017年9月，我会与眉山市东坡区教育体育局共同举办“传承东坡文化”骨干讲师团培训活动，从眉山中小学择优录取优秀青年教师集中进行东坡文化培训。迄今为止，结业学员29个，2019年10月，择优录取第二期学员30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东坡文化讲师团的成立将为眉山

培养更多优秀的研究、创作人才;将为地方研究、创作、普及力量的培养开辟出新思路、谱写新篇章。

三、传播活动有亮点

历史名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载体,然而时间的鸿沟使他们面目模糊,与我们相隔万水千山。如何生动呈现东坡形象,让东坡灵魂融入今天的精神家园是我会一直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会积极整合手中资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传播东坡文化,让苏东坡走出历史、走进当代,走出四川、走向世界。

其一,大力开展东坡文化主题讲座。生动活泼的主题讲座是最为直接,百姓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之一,因此我会从学会领导到普通会员都十分重视,积极开展主题讲座。两年来,学会开展多场东坡文化主题讲座,例如2020年1月起,西华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我会副会长潘殊闲,应邀在成都图书馆、眉山、重庆等地作苏东坡专题讲座20多场;我会常务理事刘小川应邀到陕西、山东等地作苏东坡专题讲座10余场;东坡文化讲师团深入眉山的学校、街道、社区作苏东坡专题讲座100余场,我们计划在今后两年将达到200场。

其二,建立苏轼+的传播模式。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宣传东坡文化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对此,我会施行“传统+现代”的思路,建立了苏轼+的传播模式。我们重视传统媒体传播,按时出版会刊《苏轼研究》,免费邮寄会员,以达到会聚苏学专家、交流研究成果等目的;与本地报社合作,开设东坡文化专栏等。此外,我们也重视新媒体传播,利用电视台、苏轼研究网站、苏轼研究微信公众号、苏轼研究微信群等传播东坡文化。

其三,传播活动常态化、生活化。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种体验性、浸润式的文化熏陶和生活方式。对此,我会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东坡文化主题的端午、中秋沙龙活动,每次突出一个专题,形式活泼,2019年9月和2020年10月,我们分别举办了“苏东坡与他仰慕的前辈诗人”、“三苏与眉山”沙龙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每年还有苏轼诞辰寿苏活动、清明节祭三苏活动等,使东坡文化传播活动常态化,让东坡文化融入百姓生活,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四、组织机构更科学

组织机构是否科学,关系到学会能否协调各种关系,有效运用每个组织成员的才智,充分发挥组织系统力量等问题。因此,我会不仅着眼大局,而且重视从细、微处下功夫,力求组织机构更科学,更好地团结学会老中青研究力量。

其一,只做加法,增加中青年学者比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学会成立以来,历届领导都在践行: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凡是热爱苏轼、关心苏轼研究的,都可以加入进来。中青年学者是学术研究、学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会重视发展会员,不仅主动向优秀学者抛出橄榄枝,同时文化巨人苏东坡强大的魅力也吸引着广大苏学爱好者主动加入。两年来,我会发展会员15人,增加理事22人,其中大部分为中青年学者。

其二,修改章程,发挥老专家学者余热。今年,我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将章程中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做出修改。例如在第二十四条“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后,增加了“若不再担任理事会职务,仍保留‘名誉’理事会身份,如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名誉秘书长等。”这不仅是一个称呼的改变问题,而是体现了学会对老一辈专家学者的重视、尊敬和团结,有利于他们保持热情、发挥余热,投入研究交流和学会工作,帮助年轻学者尽快成长。

五、研究成果质量高

由于工作思路明晰,开拓创新力度大,两年来,我会推出了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出版了一批专著、传记、注评,结项课题多个,发表了学术论文多篇。例如:熊朝东著《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巴蜀书社2019年5月第1版),高智笈注《苏轼〈海外集〉笺注》(巴蜀书社2019年6月第1版),张花氏著《东坡茶》(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朱刚著《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第1版),李常生著《苏轼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2019年8月第1版)、《苏辙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2020年6月第1版),陆志成著《苏东坡与颍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李公羽著《峻灵独秀且雄——苏东坡昌化江遗踪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张志烈、潘殊闲著《苏东坡传》(天地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等,均受到业界追捧。(下转第23页)

试论苏轼的教育思想

周裕锴

内容提要 从人格的培养、教育的模式、求学的态度、学习的方法和科考的取向五个方面，论述苏轼对于宋代教育科举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以及指导后生学子的经验之谈。

关键词 苏轼 教育 求学 学习 科考

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天水一朝”的宋代算是教育事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代之一。除了官方的太学、州学、县学之外，民间也有不少书院、私塾，读书尚文成为一代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丰富多彩。在这样重视教育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文化巨人，苏轼虽未直接出任过任何教职，但对于宋代教育科举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过不少精彩的看法，并在指导后生学子方面，留下了不少谆谆教诲，发人深省，切实可行。本文尝试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谈谈我对苏轼教育思想的粗浅理解，以期从中发掘出能为我们当今教育事业所借鉴的智慧和办法。

一、人格的培养

中国古代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做官大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主要驱动力。《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还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观念。苏轼的读书求学当然也是为了履行这样的理想，力求完善自己，成为博学多才、明德亲民的君子。由此出发，他在不同的诗文里，留下了颇具个性特点的关于“明德”、“亲民”、“至善”的人格培养的论述。

何为“君子”？苏轼在《仁说》一文里指出，“君子之志于仁”。“仁”作为君子追求的美德，其实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仁”如何培养呢？苏轼举例说：“吾尝学射矣，始也心志于中，目存乎鹄，手往从之，十发而九失，其中者，

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诸身，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四肢百体，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病随之，病尽而法完，则心不期中，目不存鹄，十发十中矣。四肢百体，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内；而失于彼者，在寻丈之外矣。”这个观点来自孟子的话：“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身。”（《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仁的培养如同学射箭一样，不要只看箭靶，只想射中，这样想，这样看十有八九要脱靶，即使射中一次，也属于幸运。善射的人，教人反求诸自己的身体，手的姿势，脚的姿势，四肢百体，都有规矩。自身规矩完善了，射出去的箭就十发十中。仁的培养也如此，自己身体践行都符合规矩，符合“礼”的要求，那么自然就成为一个仁人君子。苏轼认为孟子所说“反求诸身”，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相通。作为治国的“君子”，如果“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因此要做到真正的“仁”、“亲民”，就必须“自克而反于礼”，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有害于仁者的东西都去除干净，“则仁不可胜用矣”（《仁说》）。苏轼这里提到的“仁”的培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为“礼”之实践，去掉“非礼”的行为。所谓“仁”与“礼”，就是一个“君子”道德的体现，是一个文明人的应具备的素质，一个文明的君子，才能真正成为亲民爱民的好官。

苏轼借为年轻人作《杨荐字说》的机会，阐述了关于“礼”的教育观念。对于古之君子的各种礼节，在有的人看来“无乃为纷纷而无益”，苏轼则认为，这些所谓“迂阔而过当”的行为，“凛乎其若处女之在闺也，兢兢乎其若怀千金之璧而行也”，小心翼翼的谨慎行事，目的乃在于“君子之所以自尊”，使不仁不义者不敢轻易靠近。苏轼借《周易》祭祀荐献时“藉用白茅”的恭敬谨慎，给杨荐取表字曰“尊己”，意思是君子只有行为谨慎，遵守礼节，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尊。黄震评价说：“字杨荐以尊己，俾自爱重，而毋恃聪明，后

学所当深味。与妄自尊大为尊者，其说正相南北。”（《黄氏日钞》卷六二《苏文·叙说》）换言之，苏轼所说的“尊己”，是君子的洁身自好，而不是小人的妄自尊大。

关于“仁”的具体实践，苏轼一方面主张忠恕、宽厚，戒骄戒吝（见《张厚之忠甫字说》），另一方面主张刚直不屈，坚持原则，坚守正义。在《刚说》一文中，他引用孔子“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说法，并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印证了这一规律。他说：“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并从自己的遭遇中得出“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的结论。由此苏轼谈“士”的培养教育问题，即所谓“长养成就”的问题。世俗的普遍观点是“太刚则折”，但苏轼认为“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岂能“忧其太刚而惧之”。那些“太刚则折”的论调，其实是“鄙夫患失者”，与培养士君子的人格背道而驰。所以苏轼特意作《刚说》以申说“刚者之必仁”的品德。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培养仁人君子，在苏轼心目中，教育应该“长养成就”的人格，既有“仁者爱人”的亲民本色，又有“克己复礼”的自尊自爱，既有宽恕包容的仁厚精神，又有刚毅正直的勇气操守，这些观点对于当代人才培养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二、教育的模式

众所周知，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改革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治国主张，与王安石变法的急功近利有根本的冲突。在教育问题上，苏轼也多次对王氏的人才培养模式作出尖锐的批评，以至于把王氏的新学称为“俗学”。客观说来，王安石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锐意改革，提出很多全新的观点和主张，比如《三经新义》（含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合撰《毛诗义》《尚书义》）自有其冲击传统陈腐训诂的思想上创新的价值。然而，王安石为了达到“一道德”的目的，于熙宁八年将《三经新义》这一研究成果，作为新法教育的标准，颁发于学校，成为法定教材，统一经义，并用以取士。天下的学子只需要阅读《三经新义》，背诵教材，便可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样做的恶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耳目

闭塞，千人一面，只知道背诵老师传授的知识，毫无独立见解。

苏轼在《送人序》一文中，抨击王氏的教育法给培养士人带来的危害：“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诵其师傅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他直接点明这“俗学”就是王氏之学：“王氏之学，正如脱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意思是说，王安石新学培养的人才，就像翻印出来的东西，按形模模板制作的器物，看起来虽然成器，但要从中挑出真正桓璧彝器一样的国器，则根本不可能。

苏轼得知张耒要作太学博士，管理教育，于是特意作书予以告诫勉励。其《答张文潜县丞书》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搞教育也应当如此，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和长处。苏轼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名人。而苏轼主张教育环境的“地之美者”，就是“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即同样出人才，人才的个性长处却各不相同，因此苏门群星灿烂，风格迥异，苏门四学士、六君子，诗词赋文，各有擅长。

王安石“欲以其学问同天下”的教育措施，也受到其他苏门文人的批评，陈师道《赠二苏公》诗曰：“平陈郑毛视荒荒，后生不作诸老亡。文体变化未可量，万口一律如吃羌。”指出万口一律的教育的危害性。黄庭坚在《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几首诗里，都提到诸生追随王氏之学的坏处：“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末派弥九县。”（其二）“先皇元丰末，极厌士浅闻。只今举秀孝，天未

丧斯文。”（其五）“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其七）指斥诸生束书不观、浅薄穿凿的不良学风。这种看法跟苏轼是一致的。事实上，苏轼直到晚年贬官岭南，仍对“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的现象痛心疾首（《与王庠书》）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王氏之学的危害呢？苏轼的方法是：“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送人序》）其中“广其闻见”是医治“士浅闻”的良方。具体说来，就是提倡阅读的多样性，“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自己就是这种教学多样性的榜样，正如南宋人所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于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王十朋序）

广阔的阅读视野，促使苏轼思考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的问题，他在《祭龙井辩才法师文》中指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正统的儒家学者，都会把道家 and 佛家视为异端邪说，这未免过分狭隘。苏轼既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为人类和民族的智慧作出贡献，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与《三经新义》试图“一道德”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三、求学的态度

为了克服新法科举“万口一律”的弊病，苏轼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高度评价读书的意义：“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他回顾了古人艰难求书的过程以及精进求学的做法，“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然

而，在印刷业发达之后，诸子百家之书多且易致，“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就是王安石新法科举考试造成的后果。于是，他大力提倡李氏山房的主人李常的读书法：“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当今电子书、数据库海量出现，图书信息资料极其易得，而年轻学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轼之论对此很有针对性，足可引以为戒。

孔子理想中的“学而优则仕”，在宋代的科举现实中可以是“考而优则仕”，如此一来，读书的目的成为应试，尤其是王氏之学的《三经新义》成为官方教材后，只背经义、束书不观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更成了一时风气。

急功近利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求“早”，早出成果，早出人才，不惜拔苗助长。教育之事如同种庄稼，苏轼早在《稼说》中就作出精彩的比喻，“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他指出，真正人才的培养过程是：“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信（伸）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也就是说，只有在久屈至足、充溢持满之后，才真正学有所成。清末民初古文大家林纾评论道：“所云‘不敢轻用，以待其成’八字，此公悟道之言。”又说：“如‘信（伸）久屈’、‘用至足’、‘流既溢’、‘发持满’四语，皆悟道后语也。”（《古文辞类纂选本》卷三《稼说送张琥》）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二十出头就考中进士，名满天下，他却能对急功近利、求早成速就的教学理念作出反思，对自己成名过早感到担忧，“自以为不足”，因此特别希望能通过“务学”来减少“早”的危害。由此他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告诫友人，而且以之自勉。

苏轼在给年轻学子书信中，也反复申说《稼说》中的观点。如《与张嘉父书》说道：“公少年高才，不患不达，但志于存养，孟子所谓‘心勿忘，勿助长’者，此当铭之座右。世人学道，非助长也，则忘而已矣。仆少时曾作《杂说》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尝观于富人之稼’者是也，愿一阅之。”又说：“君年少气盛，但愿积学，不忧无人知。‘譬如农夫，是穠是蓂，虽有饥馑，必有丰年。’敢以为赠。”告诫张嘉父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又说：“当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

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学者当广泛阅读，精炼提取，如富人修房子，先储备各种建筑材料，储备充足后，自然可大功告成。苏轼的观点，与韩愈“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的看法如出一辙，不仅对于新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有针砭作用，而且对于当今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具有警示意义。

在《盐官大悲阁记》中，苏轼通过美食作比喻，批评那些鄙弃“古之为方”的做法，所谓“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的制作酒食的态度，也就是那些声称古书“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的态度。苏轼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有广博的阅读面，“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不能借口学那些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的玄虚的东西。他引孔子的话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并借此批评当世的学风：“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主张求学过程中“思”与“学”的结合，反对思而不学的习气。

四、学习的方法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轼的侄女婿王庠来信求教读书之法，问及他年轻时参加科举的文章。苏轼在《与王庠五首》其五中说，自己年轻应科举的题目跟近岁大略相同，过去的文章已被举主取走，都是些无用的文字。对此，他一方面承认在学习方面“实无捷径必得之术”，相信王庠“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少年为学者面对“书海”时不知所措的困境，因此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给王庠提出很好的建议：“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面对书海，一个人精力有限，那么每次就只集中于一个类别或一个专题来探究，弄通后又再就另一个专题深入钻研，以此类推，逐步获得多个知识点，解决

多个学术问题。这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迫使读书人具有“八面破敌”的能力，由此融会贯通，这和一般浮光掠影的涉猎浏览有天壤之别。正如苏轼所说，这种方法“甚非速化之术”，不能满足急功近利者的要求，但真正学成之后，知识广博，视野开阔，使人受用无穷。

历代学者都非常称道苏轼“八面受敌”的读书法，如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称：“此最是为学下工夫捷径。”这里所说的“捷径”，不是指“速化之术”，而是说苏轼指出了良好的方法和路径，可使求学的年轻人少走弯路。明代孙承恩《与吴国用书》也以苏轼为榜样：“昔苏长公谓观史不宜泛泛，如礼乐，如食货，如兵刑赋财，必各作一类，而以次通之。久之浹洽，自然可以八面受敌。古人求博如此，岂非学者之要诀耶？”（《文简集》卷四十五）杨慎在《苏公读书法》中对此高度评价：“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三五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此言也，虞邵庵常举以教人，诚读书之良法也。”（《升庵集》卷七十二）这种读书方法有学者称之为专题读书法、分类读书法，直至现在对我们教育培养研究生以及从事人文科学研究，仍然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苏轼也很看重实践经验在求学致道中的作用，比如《日喻》一文，以眇者不识日，比喻抽象的“道”之难见；而未达道者无异于眇。他进一步指出，“达道”的途径不在于“求道”，而在于“致道”，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的观点，具体方法是“学以致其道”。就像南方的“没人”（潜水者），日与水居，天长日久，自然能得水之道。而北方人要学潜水，向“没人”问潜水技巧，而自己去河里尝试，没有不溺水的。苏轼由此得出从学习实践中求道的方法，指出“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这个比喻移到士人科举教育上来说，就是“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但苏轼对这两种现象显然有偏向，这就是宁有志于学而致道，不因求道而废学。《乌台诗案》审理此文说：“轼作文一篇，名为《日喻》，以讥讽近日科场之士，但务求进，不务积学，故留空言无所得，以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新法不便也。”

苏轼还在《梁工说》一文中，用寓言的形式

批评了求学过程中的浅尝辄止。古时一梁工搞炼丹术，有一方士自海上仙山来，欲传授秘诀给梁工。方士尚“未毕其说，工悦之，然以为尽之矣”。这梁工虽得方士之方，然而未能追根究底，知其一不知其二，最后用尽了家财也没炼出丹来，到死也终不悟。苏轼指出：“术之不慎，学之不至者然也，非师之罪也。居士曰：朽墙画墁，天下之贱工，而莫不有师。问之不下，思之不熟，与无师同。其师之不至，朽墙画墁之不若也。”梁工最终的失败，不是老师的责任，而是未能学得老师的本事，“师之不至”的结果。

五、科考的取向

宋代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为朝廷选拔人才，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将直接引领教育的方向。苏轼虽一向提倡尊重学子的个性和长处，主张教育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但总体而言，在考试内容上他更强调诗赋对于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他与王安石科举教育观念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诗赋与经义的对立。

早在熙宁二年，朝廷议更改贡举法，各种建议纷纷出现，“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这些大体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考试罢除诗赋、帖经和墨义，而试以经义、策论。苏轼奏上《议学校贡举状》，认为这些更改大可不必，行之有效的祖宗科举之法没必要废除。他首先指出“兴德行”的虚伪性，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接着说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然知道文章无用，但不仅本朝祖宗以来不废文章，以为设法取士，而且古尧舜也如此。苏轼举以诗赋取士获得的人才为例：“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考文章诗赋，获取的人才众多，如像杨亿这样诗文风格华靡的西昆体领袖，在政事方面，却非常杰出优秀，不害其为忠清鲠亮之士。由此可见，以诗赋取士并无不妥。反过来看，那些“纂类经史，缀缉时务”的所谓“策括”，事先

准备好题目，临时剽窃，窜易首尾，更容易欺骗考官，弊端更大。“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在这篇文章里，苏轼显然认为诗赋取士的考试难度更大，且有规矩可依，同时因为诗赋考试有规矩可依，所以取士也就更为公平。事实上，诗赋考试可检验士人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诗赋写作难度大，需要博学多才，其声病对偶、丽词典故的处理，不仅需具备文字、声音、训诂的基本知识，还需要对经史子集各类知识的稔熟，同时还得有修辞技巧和表达能力。一言以蔽之，诗赋成就的高低，可显示出一个人智商和学识的高低。有诗赋创作能力的人去从政，知古通今，聪明练达，比从事于“策括”的士人更容易成为好官员。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说：“我认为，在中国，具有文学能力——这不仅指被动的读者，还指具有主动进行文学创作的能力，是受尊重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驾驭中国语言作文章，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当时最顽强反对王安石意见的是苏轼，他反对的理由就是，因为写作诗赋是很难的，只要具备了这一才能，就能通晓其他事务。”（《中国文学史》，徐公持《吉川幸次郎论中国文学的特色》摘译）

选拔人才重诗赋的观念，贯穿于苏轼一生有关科举考试的各类文章奏议中。元祐元年，司马光为宰相，朝廷决定恢复科举以诗赋取士之制，与经义兼行，苏轼写下《复改科赋》以示庆贺。在赋中，他先从有司的立场比较了经义、诗赋考试之区别：“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因为经义的渊源没有标准，汉唐宋诸儒各有不同的说法，而辞章的声律却容易辨别考生的水平，谁落韵，谁失律，谁中规中矩，谁文采斐然，一目了然，不存在争论。又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诗和赋的源流，强调其典范性和文化传统，并赞赏本朝百年用诗赋取士“号为得人”的历史经验，这与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接着他回顾了“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的教训。他认为那些鄙薄诗赋的人，“殊不知采摭英华也，簇之如锦绣；较量轻重也，等之如锱铢。韵韵合璧，联联贯珠。稽诸古其来尚矣，考诸旧不亦宜乎”，根本不懂诗赋之辞藻韵律之美以及酌古通今之妙，所谓“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经义考试有两个弊病，一是经书之旨义各说不一，难定是非；二是论述经

义由散文写成,“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总而言之,考经义缺乏公正的评价去取标准,而考诗赋则可克服这样的弊病:“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槩括者必在于枢机。”巧拙美恶有标准可依据,方圆槩括有绳墨可裁定,这就保证了取士的客观公正。

在《复改科赋》中,苏轼还批评了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太学取士法。王安石罢开封府试,将各地解送举子的名额尽归太学。而太学例以官宦子弟为主,这样边远地区的学子无法入太学,又断绝开封府试之途,因而入仕无门。苏轼描写了太学取士带来的恶果:“谓罢于开封,则远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诸太学,则不肖之富者私于怀金。虽负凌云之志,未酬题柱之心。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边远地区的人才无法进入仕途,官二代富二代可公然贿赂学官,这就是王氏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公平之处,所以“公正者为之切齿”,而苏轼正是这样一个为考试公平大声疾呼的“公正者”。

元祐四年,苏轼又上奏议《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对朝廷实行的“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的科举法提出质疑。在恢复诗赋取士之初,因为学子久习经义,一旦改为诗赋,习者尚少,于是以五分立法,即诗赋、经义各占录取一半名额。这是元祐初年的权宜之计。苏轼认为,到了元祐四年,“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这时如果再实行五五开的“平分解名”,这就太亏待诗赋进士。苏轼以自己的见闻为例,“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由此他主张应根据习诗赋、经义人数多少来分数发解,这样更能保证科举的公平。

苏轼对诗赋考试的强调,源于对孔门“四学”的深刻理解。《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赋源于诗,也有同样的功能。诗赋的学习,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不可包容在诗赋里。诗赋的创作是一种综合素养的体现,诗赋考试可避免考生对经义的死记硬背,可淘汰废学徒思、游谈无根之人,可从中选拔有独立意识、文学才华、聪明博学的人才。

此外,在苏轼的文集中,还有不少关于学校功能、教育管理的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

一讨论。仅从以上论述就可知道,苏轼的教育和考试理念,不仅在推动宋代社会教育事业的繁荣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而且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轼研究中心主任。

(上接第17页)

2018年11月,“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会及研究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成都召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作为全省首批10个历史名人研究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作《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经验交流;2020年11月,“四川历史名人研究工作推进会”在成都举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再次作为全省众多历史名人研究会中唯一代表作经验交流。荣誉的背后是鼓励、是期许;信任的背后是责任、是担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东坡文化博大精深,苏学研究任重道远。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新、行稳致远,是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和践行的话题。

袁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从苏轼做人看家庭的教育与影响

杨胜宽

内容提要 苏轼的最大成就在于其做人的成功，这不仅体现在其为千载所仰的伟大人格上，也体现在其为政、创作等“立功”“立言”方面。做善人，行善政，为善事，是苏轼一生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这种追求与成功，都与其早年受到的来自父母及家族重要成员的言传身教分不开。大体而言，母亲教会他做人，父亲教会他写作，伯父教会他为政。而其所受潜移默化影响，则更为广泛和多样。这些因素，塑造了苏轼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全能型士大夫形象。

关键词 苏轼 做人 为政 创作 教育与影响

唐代益州长史苏味道后代留居眉州的苏份一支，历中唐至五代末的二百余年间，一直默默无闻，到苏轼祖父苏序，与史氏夫人共育三子，中子苏涣进士及第入仕，改写了五代以来眉山苏氏家族无人入仕为官的历史，也转变了当地土族避乱不愿做官的风俗。季子苏洵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两次科考失败转而“自托于学术”，后来不仅成为宋代散文名家，而且与程氏夫人共同培养造就了苏轼、苏辙兄弟两位复合型人才，使他们联袂成为宋代一流的名臣和文学大家。按照苏洵作于真宗至和二年（1055）的《族谱后录·下篇》的说法，其父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1]386}从苏洵的这段重要叙述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眉州苏氏迅速崛起的一些耐人寻味的经验启示：“为善”是苏序立身处世的根本，“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是其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从“得人欢心”之中获得自身的最大满足与快乐。“为诗”不必仅靠读书以获取知识技能，而是要表现时代社会主题和现实生活内容，且最重要的是要诗如其人，观其诗俨然能够见到一个“表里洞达，豁然伟人”的诗人形象。也就是说，写诗即书写人生。人生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如实道来，不须刻意追求所谓“工”的技巧，故写诗并非什么艰难之事。苏洵自谓作《族谱》“藏之于家，以示子孙”，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教育子孙后代，让他

们从先辈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为人为学的有益启示及成功经验。如果从教育的角度去理解苏洵所讲的“为善”与“为诗”之道，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家庭教育的两大核心内容：为人与为学，以及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人生根本问题。

在苏轼兄弟的成长经历中，来自父母及家族的教育与影响极为重要，耳提面命的教诲与言传身教的影响缺一不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后者的作用更为广泛而深远。因此，今天探讨苏轼的人生成功秘诀，可以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一、读书目在于懂得做人的道理

从苏轼兄弟的相关资料记载看，苏轼开始读书时年八岁，入乡校读小学，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他晚年在儋州作的《众妙堂记》里有详细追忆：“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2]361}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苏轼人生观影响甚大的事，即苏轼与张易简关于石介所作《庆历盛德诗》的一番对话。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所作的《范文正公文集叙》里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盛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其词”。^{[2]311}苏轼问老师，所诵十一人是什么样的人？老师回答：童子何必关心这些？苏轼并不满意老师嫌他年幼而不告知，故有所谓是天人则不敢知，是常人则何尝不可知的惊人之语。张易简“奇轼言，尽以告之”。^{[2]311}并且趁机开导苏轼说，韩、范、富、欧四人是一代“人杰”。苏轼自言：“时虽未尽，则已私识之矣。”^{[2]311}年仅八岁的苏轼对所谓“人杰”的含义可能还不完全理解，对他们何以被老师赞扬为“人杰”的原因也未必很清楚，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将韩、范、富、欧四人是当代“人杰”这一关键点记住了。乡校老师对苏轼的启蒙教育，在苏轼天真无邪的心中，留下了“人杰”受到世人赞美的深刻印象，也播下了做“人杰”的人生理想种子，特别是由老师亲口道出，令初入小学的孩童苏轼尤其信服，并且成为永久性记忆，终身未尝一刻有忘。后来他

为范仲淹作《范文正公文集叙》，为富弼作《富郑公神道碑》，与韩琦保持亲密关系且受到对方“国士”的礼遇，而其受欧阳修的知遇之深与提携之大，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可算其为儿时记忆中的“人杰”尽了一份心想而事成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评范仲淹，则对其以“德”取信天下，士人无不师尊之给予高度赞美。^{[2]312}评价欧阳修，谓其“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则以气节引领士林风俗、培育成就一代英才称誉之。^{[2]316}

苏轼十岁时，见母亲读《后汉书·范滂传》，母子之间又有一番关于如何做人的对话。苏辙在苏轼死后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里，对此事加以特别记载：“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3]1411}程夫人之所以读《范滂传》而慨然太息，是因为范滂的为人与悲剧人生太令人感动了。

范滂的事迹，载于《党锢列传》中，与之同传者，有李膺、陈蕃、杜密等所谓“党锢”主要人物。范曄在记载这些人的事迹之前，有一长段议论性文字，叙述汉代政治清浊与士林风尚变化的关联性，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4]2185}显然，士林与执政官吏以清浊形成分野，最终招致掌权者以“党锢”的罪名搜捕二百余人，范滂即是其中之一。范滂自知必死，在与母亲诀别就狱之际，安慰道：“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毋增悲戚。”母亲则对范滂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范滂跪而受教，再拜辞行。行前又对儿子说道：“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4]2207}令人唏嘘的是范母对儿子范滂所说的“令名”与“寿考”不可兼得，以及范滂对儿子所说的做人“为恶”与“为善”是非抉择之反讽意味。母子二人用不同的话语，道出了一个相同的做人道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最可宝贵，但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为善”，虽然掌权者可以夺去生命，但“为善”之人将名垂青史，永远被后人所铭记和颂扬。

程夫人之感慨太息，表明她切身感受到了范母在亲情、善恶、生死之间做出的毅然选择。范滂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将要在苏轼的身上重放光彩。苏轼似乎已经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叹息。故

主动向母亲说，愿意做范滂那样的履善嫉恶之人。程夫人听到儿子有此远大而崇高的做人志向，非常欣慰，故鼓励苏轼，自己愿做范母那样的人，需要在割舍亲情与让儿子从善嫉恶之间做出选择时，她会欣然与范母同风。程夫人发出“吾有子矣”的由衷感言，是对苏轼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教导，让苏轼明白做好人、行善事可能将面临生死考验的深刻道理。观察苏轼一生为人处世，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与期望，尽管在仕宦道路上遭遇了许多坎坷，也曾面临或将付出生命的重大考验，但他不仅没有后悔过，反倒是越来越坚定了做人的根本信念，善待自己，善待他人，一直是苏轼平生行事的基本准则，朋友的喜爱，政敌的憎恨，均在于此。宋高文虎《蓼花洲野录》云：“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5]191}只有心地无比纯洁善良的人，其视天下人才能皆见其善，甚至包括那些打击陷害过他的恶人。

二、入仕目的在于实现人生的理想

苏轼早年潜心科举，其为应试而写作的《策论》《进论》各二十五篇，虽然首要目的不在于阐述其对天下治乱的观察与感悟，但事实上表现了对当朝政治变革的基本主张，他在获得科举考试成功之后，这些政治主张大多在其为政履职过程中得以实践和完善。苏轼一生几起几落，宦迹四方，但他始终把以身许国、务实为民作为其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目标，矢志不渝。这跟其早年接受来自父母、伯父的谆谆教诲密切相关。

苏轼早年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中，就有很突出的引导其树立远大人生理想的用意。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说：“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常戒之曰：‘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自名而已。’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6]755}这里所教的不仅是怎样读书，而且是告诫苏轼兄弟：读书只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过程与手段，绝不能把它作为最终目的。像范滂那样一开始就有澄清天下高远志向的人，才能够在遭遇挫折乃至生命危险时坚守理想不动摇、不畏惧，以身殉道，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不应退缩。母亲可以断然割舍儿女亲情，子辈才可以在面临考验时无所牵挂，义无反顾。

苏轼伯父苏涣是苏家第一个考取进士而步入仕途的人，后来苏轼进士及第，即将做官，对于为官之道并无经验，故专门向伯父请教。据《颍滨语录》载：颍滨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

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

^[7]表明苏家后来入仕为官者，均遵循苏洵的“为政之方”。这种方法的根本，在于对于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深入调查了解，弄清事情的真实情况及其来龙去脉，这是处理事情的前提和基础。但更加重要的是，要“见得破”，即必须考虑清楚解决此事的有效办法，其中包括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建议及反对者的声音，对利害得失进行权衡比较，对可能遭遇风险障碍准备应对预案及破解方法等；一旦到了“了了而后行”的阶段，付诸行动就必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工作步骤与方法，力争取得最好的结果。

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处理衙前役工伐木放漕之事，就很好使用了伯父交给他的为政方法。苏轼在写给韩琦的书信中，陈述了凤翔之衙前役，非常繁重，已经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而自渭入黄的放栈任务，恰恰安排在两河汛期进行，令不少役工因此而丧身，导致人亡家破。苏轼对此事的处理，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有详细记录：“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伏。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械，自渭入河，经底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械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械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3]1411}以前的官员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主要在于习惯了官僚主义作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不知道问题症结在哪里。经过苏轼“遍问老校”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了解决放栈之害的关键，在于选择恰当的时机，给衙前役者自择水工的权限，不仅保证了任务的完成，而且避免了放栈者触险丧身的悲剧发生。苏轼从修订衙规着手，实践成功之后又上报知府，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他能够把一件长期为患的事，处理得如此周全而完美，充分体现了“尽心其职”的务实为民作风，不仅让“老吏畏服”，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苏轼后来对神宗与王安石所厉行的熙宁变法，其持反对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质疑变法的调查研究不深入、心理准备不充分、谋划布局不周密、利弊研判不全面，担心其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难以坚持到底，无果而终。他在上奏

神宗皇帝的奏疏中说：“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上神宗皇帝书》）^{[5]731~732}熙宁变法追求富国强兵的目标，目的在于解决北宋立国以来日益凸显的财政危机和国防薄弱，本身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求利太急，超过了老百姓所能承受的程度；重大变法措施出台没有广泛征求朝野上下的意见，下层民众对这些举措因不理解而难于接受；变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管和追踪了解，使看起来较好的政策措施在执行之中变形走样，老百姓成为最终受害者。一次涉及内政外交的重大变法活动，就因为受到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和民众的不支持，不得不因神宗去世半途而废。一定程度上应验了苏轼最初的担心。

苏轼母亲支持父亲苏洵读书治学的例子对苏轼为政敢于担当的精神也颇有积极影响。据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记载，“府君（苏洵）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日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6]754~755}苏洵二十七岁犹不务学，忽然之间专心学问，其一家生计之事全赖程夫人操持，况且这一年正好苏轼出生，这样的家庭负担，对于程夫人来讲是极为繁重的，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毅然作出牺牲并且郑重承诺，把家里的所有事务都扛在肩上，为了生计，甚至将自己的衣服饰物等全盘卖掉。数年间，苏家的生活不仅有保障，而且成为眉山城里的富裕之家。虽然在此过程中，苏轼还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这段特殊家庭发展变化史，他不可能没有耳濡目染，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母亲重然诺、敢担当、有作为的性格与精神，在苏轼一生为官做事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苏轼在后来的仕宦经历中，始终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利民惠民作为施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积极作为，勇于担当，善谋善成，即使是需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也无所顾忌。这是他做官为政贯穿始终的人生理想追求，也是其从小所受父母亲及家族教育影响的必然选择。故其每到一处都能有所建树，留下很好的亲民、惠民的循吏与廉吏形象。比如密州抗旱捕蝗，徐州保城抗洪，杭州疏浚西湖，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分享着苏轼当年的政绩成果。即使是在被贬谪的艰难岁月，他依然心系

百姓，力所能及地为民解忧纾困，像在黄州劝导改变溺杀女婴的陋习，在惠州推广秧马技术、捐助修桥、改善城市饮水，在儋州劝阻杀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偏远地区教育等等，他每到一处留下的惠政惠声，让当地老百姓永世难忘。林语堂曾评价苏轼说：“在社会改革的余波中，他一个人热心赈灾，不顾官僚制度的巨大阻力，简直好像只有他关心广泛的饥荒和流浪的灾民。他始终替人民对抗政府，为穷人争取债务免还的德政，最后终于成功。他只想维护自己的本色。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真是一个现代人。”^{[8]12~13} 历代为苏轼遗迹所建的各种亭台祠馆，今天还在发挥着教育世人的作用。后世爱戴、景仰苏轼的，正是他始终不变地关注现实、不计荣辱的初心，及其重视民生、为民造福的德政。

三、创作目的在于直面现实的需求

文学艺术创作是苏轼人生的重要内容，是将其生活艺术化的主要途径，无论在其身处顺境时，还是跌落逆境中，创作都是其生活乃至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当遭遇人生苦难时，更能让他回归内心世界，冷静地思考生活的方式、人生的价值、未来的去路。苏轼在灿若繁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留下其靓丽的身影，某种程度上讲，主要不是以其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而是其在文学艺术上所留下的众多杰作，以及为中华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苏轼的创作发展道路上，其父亲苏洵无疑发挥了教育的主导作用，并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苏轼的文学写作，与很多宋代读书人一样，都是从练习科举应制作文开始的。苏洵因为自身两次应考失败，使得他无法像一般士子那样打通科举入仕的门径，直接影响到其一生的仕途发展。这跟其兄苏涣相比，无疑对苏洵的自信与自尊，都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从其父苏序得知苏涣高中进士，远道去剑门关迎接之举看，苏洵知道父亲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其心中未尝没有对自己“终日嬉游”（《极乐院造六菩萨记》）^{[1]401} 贪玩误学的某种失望。笔者在二十多年前所著的《苏轼人格研究》一书中曾对此有过探讨，此不再赘言。^{[9]261~}

²⁶² 苏洵把自己科举考试失败的耻辱与教训，转化为对两个儿子精心准备进士考试训练的动力，希望以此弥补自己的遗憾，开创苏轼兄弟的光明仕途前程。苏辙《颍滨遗老传上》说：“先生（苏洵）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3]1280} 而其《坟院记》也说：“先公既壮而力学……有二子，长曰轼，季则辙也。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

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3]1568} 苏洵以所学教授二子，当然不仅仅是应付科举，但在他们准备科考的过程中，父亲作为过来人，悉心教之，希望他们一举成功，也是极为自然的。

但是，苏洵打心底里是极为反感科举考试的程式刻板模式和淫辞丽藻文风的，他让儿子们练习“时文”，只不过是把它当“敲门砖”使用，而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并不在此，这方面的道理苏洵也为苏轼兄弟讲得不少。苏轼后来在所作《晁绎先生诗集叙》里依然记得父亲当年的教诲：“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晁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虽然苏洵没有对颜太初的诗文作直接评价，但苏轼已经深会其意，故其发挥父亲语焉未详之意曰：“先生（颜太初）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六一居士集叙》）^{[2]313} 苏洵把为文之“道”与文章之“工”相对立，意在批评仁宗庆历时期的文学风气，重在追求形式之工巧，而对于文章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却鲜少重视，故苏洵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前景表示悲观。苏轼认为，父亲之所以称扬颜太初的诗文，就在于这些作品对现实有用，可以如五谷之疗饥，如药石之伐病；而其诗文风格，则很好地避免了游谈为高、枝词为美的形式主义偏向。苏轼领悟父亲关于为文的此番道理，努力将其落实到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始终牢牢把握住创作服务现实的方向与需要。苏轼为父子三人南行入京沿途所作诗文唱和集作序，也特别申言此旨：“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文章）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南行前集叙》）^{[2]323} 强调不能为文而文，不要把工巧作为创作的首要追求，而应该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只要内容充实，感受真实，自然会成为好作品。事实上，苏洵针对现实所作《几策》《权书》《衡论》等，苏洵自言是“不得已而言之书”（《权书叙》）^{[1]26}，“其用可以至于无穷”（《衡论叙》）^{[1]79}，这种创作实践，给了苏轼很好的启示和示范。

纵观苏轼一生的文学艺术创作理论与实践，有为而作，讲求实用，特别注重揭露现实矛盾，针砭时弊，以求匡补之效，是其始终不变的创作原则追求。在熙宁变法期间，新政不断出台，但实施效果如何，农民是否真正从改革中受益，朝廷并不太关心。苏轼作为地方基层官员，他针对新法实施中所见所闻的弊端与问题，以诗歌的艺

术形式加以反映,期望执政者能够体察民情,注意纠正政策失误。但这种创作动机和表现方法,却被新法推动者视为别有用心、大逆不道之举,采用断章取义、任意曲解等手段,罗织成为“乌台诗案”,把苏轼送进了御史台监狱。苏辙在苏轼死后追记其事说:“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必欲置之死”。(《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3]1414}变法政策不便于民,苏轼作为地方官员和诗人,他不敢上书直言,转而采取托事以讽的艺术手法来为民代言,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正当的,因为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求诗文要如药石一般发挥救治社会弊病的疗效,这是其服务现实需要的充足理由和基本权力,却不料遭遇诗祸,差点送命。

尽管如此,苏轼并未因遭遇文字之狱而搁笔退缩,他那颗忧国之心,依旧怦然跳动,不以一己祸福而改易素操。在其第二次遭遇岭海之贬时,诗人在惠州作《荔枝叹》,愤然喊出“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10]4592}的强烈讽喻呼声,其锋芒直指皇帝,言辞尖锐程度丝毫不减于当年揭露新法弊端。南宋人黄彻对此评价说:“坡作《荔枝叹》云(略),补世之语,不能易也。”^{[10]4592}清人汪师韩则云:“‘君不见’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本为荔枝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10]4592}只有把民生疾苦永远装在胸中的诗人,才能触事辄发,敢于大胆表露真心真情。如此命意深刻、感情丰富的批判现实作品,即使没有刻意讲究写作技巧,也是可以流芳百世的“至言至文”。苏轼一生文学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及佳作盛产期,往往出现在其身处逆境之时,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爱国诗人陆游在跋苏轼《与吕陶帖》时指出:“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跋东坡帖》)^{[11]177}陆游以书观人,极为赞赏苏轼书如其人,文如其人,希望后世士人学习苏轼,不仅在于学习其创作典范,还要学习其忧国忧民情怀和敢于面对灾祸的凛然气节,这是很有见地的。

苏轼一生的成就和影响,超过父亲与弟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超越了父母亲早年的预期。苏洵早年作《名二子说》,对苏轼唯以“不外饰”告诫之。^{[1]415}作为父亲,苏洵从小就看准了苏轼的个性,提醒其要注意“外饰”,不然人生道路恐怕免不了坎坷崎岖。然而,苏轼的个性发展,

似乎一直触犯着父亲的忌讳,以及弟弟的多次好心劝告。无论是为官、为文、为人,他都尽量消除一切掩饰、遮蔽其本性的东西。苏轼在遭遇诗祸前的元丰元年(1078)为友人章惇作《思堂记》,论及思与行的关系,结合自身入仕以来的进退得失,说过这样一段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2]363}苏轼一生灾祸,可以说都跟其口无遮拦有关。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性格特点。但他反省的结果,仍然决定保留本色,坚持向善嫉恶,不假辞色,心之所欲言,即使招惹祸端,也绝不违心地吞回肚子里。他把穷达得丧,都交给命运安排,不刻意去作选择和避就。看来,母亲早年读《后汉书》,鼓励他做范滂那样的人,这一儿时记忆影响了他整个一生,也塑造了成功而伟大的苏轼。

注释

[1]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 范曄撰《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5]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

[6]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7]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以为《颖滨语录》系陈天倪所撰,其说恐误。观“颖滨尝语陈天倪,子瞻‘见先伯父’及‘至今以此言为家法’等语,似为苏辙孙辈所编纂,类似苏籀编纂之《栾城遗言》。颜说见该书第25页《凤翔签判》注(1)。

[8] 林语堂著,宋碧云译《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9] 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 陆游著《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十九,上海书店1992年版。

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原党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副会长。

论苏轼“和而不同”教育思想的价值 ——以苏轼门人“同”与“不同”为视角

喻世华

内容提要 苏轼门人的“同”表现在文艺上有共同的爱好、生活上有多种联系、政治上同升并黜，其“不同”表现在年龄不同、交往的时间长短不同、经历不同、取得的成就不同这些显性差异，以及文风不同、政见不同等隐性差异上。苏门“和而不同”是师生双向互动的产物，苏轼主观上自觉地传承意识与客观上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为群体的“和睦”提供了保障，宽容、平等的胸襟、气度与尊重个性、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为个体独立成长“不苟同”创造了条件，而为生者对于苏轼的尊崇始终如一，共同铸就了这一教育史上的历史佳话。“同”与“不同”问题牵涉到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统一、个性发展与制度约束等一系列矛盾，其核心在于“不同”（或者“存异”）与“求同”的矛盾。要评估其价值，只有将其放在历史时空中，从时间的纵向勾勒和空间的横向比较中才能对其价值作出准确定位：从纵向角度看，教育家孔子不能使人“同”；从横向比较看，王安石在教育、文化、思想领域追求的“同一”造成的文化荒漠，更加彰显了苏轼“和而不同”教育思想的价值。因此，苏轼“和而不同”教育实践与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能带来深刻启示。

关键词 苏轼 苏轼门人 “和而不同” 教育思想

学界对于苏轼的教育思想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专著有张帆的《苏轼教育思想研究》从其家族渊源、教化理想与革新主张、身体力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论文方面，仅“中国知网”标题涉及“苏轼教育”的就有30篇，内容涉及多个层面，大致可以划分为泛论^[2]、专论^[3]、启示^[4]、比较^[5]四个类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多篇硕士论文涉及苏轼的教育思想，如江晓梅《苏轼的妇女观与女子教育思想》^[6]，曹红波《苏轼的人

生境界与中学生的人生观教育》^[7]，韩鸿伟《苏轼教育思想研究》^[8]，陈琼琰《苏轼文学教育研究》^[9]。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从苏门^[10]“同”与“不同”角度探讨苏轼“和而不同”教育思想者还没有。笔者曾从苏轼与秦观、苏轼与李廌的交谊角度探讨苏轼与弟子的“师生情”，但不够全面和深入^[11]，拟从苏门“同”与“不同”教育现象入手，进而探讨其成因，挖掘其价值。这对于苏轼教育思想研究的拓展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一、现象：苏轼门人的“同”与“不同”

苏轼门人，一般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或者“苏门六君子”（黄、秦、晁、张外，另加陈师道、李廌）之说，甚至还有“苏门后四学士”（廖正一、李禧、董荣、李格非）之说。本文的苏轼门人以“苏门六君子”为研究对象。苏轼门人的个人经历、特长、爱好并不相同，苏轼都大力推荐、多方揄扬，不将自己的个人偏好强加给学生，尊重其个性发展，因此出现了苏门“和而不同”的现象。这种现象大致可以从“同”与“不同”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同”：同升共黜的命运共同体

苏轼与弟子的关系，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除李廌外，苏轼与其他弟子的关系甚至像苏轼与欧阳修那样考生和座主的关系都不能算。但苏轼与弟子的关系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多个层面上：

首先，在文艺上有共同爱好。《宋史》是一个最好的参照指标，“苏门六君子”（黄、秦、晁、张、陈、李）均列于“文苑六”前六位，其在文艺上的成就与苏轼的提携不无关系，见表1。

表 1 苏轼与“苏门六君子”文艺上的关系

姓名	苏轼的提携	取得的成就
黄庭坚	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其词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语，其重之也如此。	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
晁补之	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稔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缜，其凌厉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词》，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
秦观	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张耒	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	耒仪观甚伟，有雄才，笔力绝健，于骚词尤长……作诗晚岁益务平淡，效白居易体，而乐府效张籍。
陈师道	元祐初，苏轼、傅尧俞、孙觉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荐，为太学博士。言者谓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改教授颍州。	于诸经尤邃《诗》《礼》，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然小不中意，辄焚去，今存者才十一。
李廌	谒苏轼于黄州，贻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轼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益闭门读书，又	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当宣涸仓卒间如不经意，睥睨而起，落笔如飞驰。元祐求言，上《忠谏书》《忠厚论》并献《兵鉴》二万言

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	论西事。
-----------------------------	------

资料来源：《宋史·列传·文苑六》^{[12]13109~13117}

从表 1 可以看出，苏轼在文艺上对于“苏门六君子”的提携以及对于“苏门六君子”成长的重要影响。

其次，在生活上有多种联系。黄庭坚舅父李常为苏轼密友，黄元祐时期一直在朝为官，与苏轼过从甚密。晁补之因其父与苏轼的同年、同僚关系，与苏轼结识最早；元祐初年，又与苏轼同朝为官；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黄庭坚、晁补之为“点检试卷”官员；元祐七年（1092），苏轼出知扬州，晁补之“通判扬州”。至于秦观，有“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之说，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秦观是“苏门六君子”中唯一在苏轼之前去世的弟子，苏轼的悲痛溢于言表，笔者曾对苏轼与秦观交往有过仔细梳理，不赘言^{[13]83~89}。李廌是苏门最为特殊和另类的弟子，也是“事师之道，于门人为最勤”的弟子，著有以苏轼言行为主的《师友谈记》。关于李廌与苏轼的交往，可参见笔者的相关论述^{[14]59~64}。比较特殊的是张耒和陈师道。张耒是因苏辙关系列于苏门弟子，陈师道原为曾巩弟子，元丰元年（1078）苏轼知徐时与其结识，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路过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陈师道到南京送行，以擅离职守被劾去职。

第三，在政治上同升并黜。苏轼一生在政治圈浮沉，苏门弟子与其不但是一个文学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元祐时期，苏轼与苏门弟子同聚京师谈诗论文，相交甚欢，这方面有不少逸闻趣事记载，如“西园雅集”之类。绍圣、元符时期，同样是因为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特别是在仕宦中的“苏门四学士”的遭遇最为典型：黄庭坚“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言者犹以处善地为骖法。以亲嫌，遂移戎州”（《宋史·黄庭坚传》^{[12]13110}）；晁补之“章惇当国，出知齐州……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亳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宋史·晁补之传》^{[12]13111}）；张耒“绍圣初，请郡，以直龙图阁知润

州。坐党籍徙宣州，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宋史·张耒传》^{[12][13][14]}）；秦观“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宋史·秦观传》^{[12][13][13]}）。秦观是绍圣、元符时期受处分最重的苏门弟子，这与秦观在苏门弟子中“所扮演的政治舆论代言人的地位”^{[15][13~18]}有关。

从文艺、生活、政治三个维度看，苏门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二）“不同”：各具鲜明特色的个体

苏轼与苏门弟子虽然在文艺、生活、政治上有诸多共同点，但苏门弟子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既表现在年龄、经历、成就不同这些显性因素上，也表现在文风、政治见解歧异这些隐性因素上。

1. 显性差异

首先，年龄不同，与苏轼交往的时间长短不同。黄庭坚（1045~1105）是苏门弟子中最年长者，与苏轼的年龄差距只有9岁，元丰元年（1078）以通信的方式与苏轼结识；晁补之（1053~1110）是苏门弟子中与苏轼结识最早的，于熙宁四年（1071）在杭州以《七述》见知于苏轼；秦观（1049~1100）于熙宁十年（1077）在徐州与苏轼定交；李廌（1059~1109）是苏门弟子中年龄最小的，与苏轼的年龄差距达23岁，也是与苏轼相识最晚的，是在苏轼最为困顿的黄州时期拜访苏轼的唯一弟子。

其次，经历不同。在科举考试中，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基本上是一帆风顺，仕途也相对顺利；秦观科场屡遭挫折，李廌则是在苏轼知贡举时名落深山。正是因为秦观的遭遇特殊，元丰七年（1084），当时仍在贬谪中的苏轼向政见不合的王安石推荐秦观（苏轼《与王荆公二首》之二）^{[16][144]}；李廌落第后苏轼也曾有举荐的念头，显见其爱才之心。

第三，取得的成就不同。在中国文学史上，黄庭坚、秦观是名声与苏轼齐名的大家。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对宋诗的影响甚至超越苏轼；书法方面，则有“苏、黄、米、蔡”之说。在宋词中，秦观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婉约正宗”。孙兢《竹坡老人词序》称赞：“苏东坡辞胜乎辞，柳耆卿情

胜乎情，辞情兼胜者，唯秦少游而已。”孙兢对于秦观词的评价甚至高于苏轼、柳永。张耒称赞：“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此耶！”

2. 隐性差异

首先，文风不同。作为文人集团，苏轼与苏门弟子的共同点大约是对诗文书画的爱好和巨大成就。但无论是诗、词，还是书法、书画，苏轼与其名声显赫的弟子黄庭坚、秦观并不相同。在诗歌方面，虽然“苏黄”并称，但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其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把宋诗带入了形式主义泥淖，与苏轼主张的以意为主、辞达而已的主张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词方面，苏轼对于秦观词风是有所批评的：“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含蓄表达了对秦观词风的不满。在书法方面，有“苏黄”并称，但其分歧也是明显的，《独醒杂志》曾有记载：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17][124]}

关于苏门弟子文风的不同，古人早有体认。吴曾《能改斋漫录》“四客各有所长”条对于苏门四学士的不同有过如是记载：

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鲁直与秦少章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足下可从此四君子一一问之。”其后张文潜《赠李德载》诗亦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17][121~122]}

其次，政见不同。文人集团对于文风差异的宽容实属难得，对于政治上同升并黜共同体内部差异的容忍更是罕见。就以苏轼最为钟爱的弟子秦观而论，其双方在政治见解方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杨胜宽先生曾对苏轼与秦观在哲学思想、治国宽严分寸把握，以及财政、军事、教育、法

治等问题上的差异进行过比较^{[18]3~5}。苏轼对秦观政见上“不同”的包容，在政治命运共同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二、原因：师生双向互动的产物

“苏门”的“同”与“不同”是很明显的，但苏门既能和睦相处又不随便附和，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19]。这可以从为师者、为生者两个维度探讨其成因。

（一）为师者的风范

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作为主导者的苏轼，对于苏门共同体“和而不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苏轼为苏门弟子群体的“和睦”提供了保障，也为苏门弟子个体的“不苟同”创造了条件。

1. 为群体的“和睦”提供了保障

作为为师者，苏轼主观上自觉的传承意识，以及客观上良好而巨大的声望为苏门群体的“和”提供了保障。

首先，主观上自觉的传承意识。欧阳修对后进之士的赏识、提携，《宋史·欧阳修传》有明确记载：“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轼是受惠者，继承并发扬光大欧阳修爱惜、保护、奖引、提携、扶持人才的传统，苏轼视为己任。这在《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有过说明：

昔吾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数年，忽然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见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废学，自视缺然，而天下士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16]1979}

李廌《师友谈记》有过更明确的说明：

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17]122}

因此，苏轼在与弟子的多篇私人通信中，如《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16]1979}《答张文潜县丞书》^{[16]1427}中表达了对苏门弟子的推崇与肯定，在另外的书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观点：

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玘书》）^{[16]1439}

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而况外物之进退。（《答毛泽民七首》之一）^{[16]1571}

朱弁《曲洧旧闻》也有类似记载，可以作为旁证材料：

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17]223~224}

提拔人才是欧苏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是苏轼与苏门弟子“和”的基础。

其次，客观上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苏轼为人宽厚，为政干练，诗文书画堪称一流，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其本身的言行为苏门弟子树立了为人、为政、为文的标杆。苏轼以近乎完美的人格和多才多艺的天赋确立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这为苏门的“和”提供了保证。

2. 为个体的“不苟同”创造了条件

在威权社会的古代中国，群体的“和睦”或者“相同”，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而为群体中个体的“不苟同”（独立）留有空间和余地，是需要胸襟、气度、方式方法的。苏轼宽容、平等的胸襟、气度以及因材施教的方式方法，为苏门弟子个体的“不苟同”创造了条件。

首先是宽容、平等的胸襟、气度。在师生的互动中，不强求一致、一律，容忍不同于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甚至容忍弟子对自己的批评，这是保证群体中个体“不苟同”的先决条件。在“师道尊严”的古代中国不容易，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是需要胸襟、气度的。宋人笔记小说中留下了苏轼与弟子的诸多逸闻轶事，如：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17]122}（《王直方诗话》）

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九云：“初日头。”问其义，但云若此僧负暄于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岂有用白对天乎？”余异日问苏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17]123}（《明道杂志》）

苏黄二公，当时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盖指东坡而言也。^{[17]125}（《茗溪渔隐丛话》）

宋人笔记小说留下的逸闻轶事不能完全当信史看，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弟子的不同意见以及批评的宽容胸襟，以及对话的平等态度，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可资借鉴的范例。

其次是尊重个性，因材施教。苏门弟子经历不同、秉性各异，有的甚至在为人、修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和弱点，比如李廌经济上很困难，品行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声誉不佳、好名急进、见誉过当等）。苏轼对李廌则是“处之以情”，经济上给以支助；“导之以理”，对于存在的缺点进行指正；“守之以法”，在考试中秉公办事。苏轼与李廌的交往，特别彰显了苏轼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是保证个体独立性、不苟同的重要因素。

综上，苏轼为师者的风范是“和而不同”教育理念得到实施的坚强保障。

（二）为生者的本分

师生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虽然苏门弟子年龄悬殊、秉性各异、经历不同、与苏轼结交时间早晚不同，成就有差异，文风、政治见解也与苏轼相异，但对于苏轼的尊崇始终如一。这是苏轼

与苏门弟子虽然有诸多不同，但却和谐相处传为历史佳话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解析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这一现象必须关注的另一因素。

人们常说，危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苏轼遭受贬谪和去世后，苏门弟子的表现特别彰显了这一点。

一是苏轼困厄时的真情救助。苏轼在黄州时期的处境是相当孤寂的，这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多有追忆，如“亲友几于绝交”（《祭徐君猷文》）^{[20]7005}，“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谢量移汝州表》）^{[20]2590}被黄庭坚称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燕石斋补》）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21]250}，真实反映了苏轼在黄州的这种孤寂心境。李廌在苏轼最为困顿的黄州时期前来拜访，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贬谪岭南时，苏轼路过润州（今镇江），其门人张耒当时为润州（今镇江）太守，冒着政治风险遣兵护送，同样显示了危难时的不离不弃。《三苏年谱》绍圣元年（1094）五月条有“知润州张耒（文潜）遣兵王告及顾成奉事轼路途”^{[22]2583}。苏轼《答张文潜四首》其四有记载：“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又不惮万里再来”。^{[16]1539}

二是苏轼去世后的真情追悼。闻知苏轼去世的消息，苏门弟子纷纷以实际行动表现对于恩师去世的痛切之情，这在后来的《宋史》以及当时的笔记小说中有诸多记载。

李廌“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12]13117}

东坡讣至京师……张耒时知颍州，闻坡卒，为举哀行服，出俸钱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谪房州别驾。^{[17]245}（《宋稗类钞》）

黄鲁直在荆州，闻东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鲁直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17]245}（《拊掌录》）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每

早衣冠荐香肃挹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17]245} (《河南邵氏闻见后录》)

苏轼与苏门弟子良好融洽的关系,是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教育思想能够实现的重要因素。

三、价值:历史时空中的纵横比较

“和而不同”教育思想,牵涉到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统一、个性发展与制度约束等一系列矛盾,其核心在于“不苟同”(或者“存异”)与“求同”的矛盾。“不苟同”与“求同”的矛盾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划分:一是在个人发展路径上,个体自由发展(“不苟同”)与制度的刚性约束(“求同”)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二是在文化层面上,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不苟同”)与必要的规范约束(“求同”)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三是在政治思想层面,个人的独立思考(“不苟同”)与群体的集中统一(“求同”)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张力。

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现象,在个人发展路径、文化层面、政治思想层面的处理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要对其准确定位需要将其放在历史时空中,从时间的纵向勾勒和空间的横向比较中,才能评估其价值。

(一) 时间上的纵向勾勒

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个体“不苟同”(或者“存异”)与群体“求同”的矛盾始终存在,从古代到现代概莫能外。

1. 古代:“孔子不能使人同”

“和而不同”是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翻开《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出生、爱好、禀赋各异的弟子也很难彻底践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首先,在“求同”方面并不完全成功。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礼”,孔子力图用“仁”“礼”规范自己及弟子的行为,但可以看出成效并不显著。

用“仁”的标准衡量弟子,孔子的评价均不高: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

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23]77} (《论语·公冶长》)

对于自己与礼不合的行为,孔子则只有强行辩解: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23]91} (《论语·雍也》)

其次,在“存异”方面同样存在一些问题。这可以从孔子对与己“不同”的弟子的指责、戏评中找到佐证。

比如对于“宰予昼寝”,孔子近乎谩骂: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23]78} (《论语·公冶长》)

对于子路“好勇过我”,孔子也带有戏评味道: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23]77} (《论语·公冶长》)

对于孔子教育思想中“求同”存在的问题,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曾有精到论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16]1427} 苏轼清醒认识到,在个人发展路径及在文化层面、政治思想层面,完全求同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孔子也无法办到。应该容许并包容个体自由发展、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以及独立思考空间。苏轼身体力行践行了自己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尊重。

2. 当代:“求同”与“存异”的教育困境

在今天的教育环境中,实际上面临个人发展路径选择的矛盾和困境,即个体自由发展(“不同”)与制度刚性约束(“求同”)之间的矛盾。制度刚性约束的求同趋势,比如统一考试、标准答案等,压抑并压倒了个体的自由发展。虽然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但成效并不显著。其症结就在于此。因此,在制度刚性约束的求同趋势面前,无

论是在家庭教育中还是在学校教育中,家长或者教育工作者对于“不同”的孩子或者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容忍孩子或者学生保持有别于自己的选择、追求、爱好,真正尊重孩子或者学生有别于自己的选择、追求、爱好(“不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代教育面临的困境,其实在苏轼生活的北宋早已出现。苏门弟子秦观、李廌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秦观屡试不中,李廌在苏轼任主考时落榜,苏轼的处理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比如,对于秦观,尽力指导其应举、著书:

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答秦太虚七首》其四)

[16]1536

尊重制度的刚性约束,同时竭尽全力引荐。元丰七年(1084),苏轼向政见不合的王安石推荐秦观;元祐二年(1087),苏轼、鲜于侁联名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推荐秦观。

对于李廌的落榜,苏轼虽有《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表达愧疚之情,但守住了为人、为师的道德底线。

(二) 空间上的横向比较

将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的交往与相同时空背景的王安石的作为展开对比,其价值更为明显。

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研究者往往关注其政治层面的纷争,其实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在个人性格、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教育、文化、思想层面同样存在巨大分歧。在“求同”与“存异”方面迥然不同。

首先,在个人性格、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苏轼的宽容、包容弟子的“不苟同”与王安石以自我为中心、“求同”心切有云泥之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载:

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

则疏。^[24]

王安石最终走向众叛亲离,其实与缺乏宽容、包容的“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性格特点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缺陷有关,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的交往则彰显了宽容、包容弟子“不苟同”的成效。

第二,在教育、文化、思想层面,王安石的“求同”政策造成的恶果更是触目惊心。王安石改变贡举法,行三舍法于天下,学舍将其《三经新义》《字说》作为教材与科举考试的依据,以达到“一道德”的目的,苏轼对其有过鞭辟入里的评价: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16]1427}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诵其师传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壁彝器,其可乎?(《送人叙》)

[16]325

王安石在教育、文化、思想领域采取的统一措施,窒息了个体发展的生机。苏轼与苏门弟子“和而不同”取得的成效与王安石“求同”造成的恶果成为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苏轼“和而不同”的教育实践与思想,较好地诠释了为人、为师之道,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对于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 张帆《苏轼教育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泛论苏轼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有,陈元、欧阳勇《苏轼教育思想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6~19页),范琐哲、徐金玲《苏轼的教育思想

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2期19~23页),吴洪成、许娟《苏轼教育思想述论》(《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4年第2期21~25页),吴洪成、王彤《苏轼教育思想探析》(《衡水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112~117页),曹文霞《苏轼的教育思想研究》(《兰台世界》2014年第21期115~116页)。

[3] 专论苏轼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有,戴续威《苏轼论“有所不为”的教育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48页),范琐哲《追寻“求实重情”的教育之旅——苏轼教育思想解读》(《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75~78页)、《心理学视野下苏轼教育行为的探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193~194页),陈建锋《苏轼童蒙教育思想及其对幼儿道德养成的价值》(《教育探索》2011年第3期6~7页),向俊《情感教育在苏轼作品教学中的体现》(《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117~119页),王惠梅《例谈苏轼贬谪词中的品格教育》(《文学教育(上)》2015第2期138~139页),李忠鹏《苏轼教育信号思想探微》(《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7期119~120页),王利娜、卢焱、胡志峰《语文教学与心理素质教育结合的设计与思考——以苏轼作品专题课程设想为例》(《语文教学之友》2017年第9期21~23页),张国露《论苏轼的文学教育活动》(《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75~80页),陈晓《传承地域历史文化,弘扬高校国学教育——以徐州的苏轼文化为例》(《高教学刊》2018年第22期12~14页),骆爱芳《审美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以苏轼的诗文为例》(《学周刊》2019年第13期91页)。

[4] 苏轼教育思想启示的期刊论文有,陈明宝《高职创业教育与苏轼人格的学习借鉴》(《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14期96~97页),刘东山《从苏轼黄州词赋创新,说到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80~82页),徐希平《苏东坡成长经历之要素及其对当代中国教育之启示——苏轼对“情圣”杜甫的接受与情感教育实践略论》(《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2013年214~221页),陈立仁《苏轼人生哲学对现代人教育价值的认识》(《第23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45~57页),张瞳钰《苏轼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西部素质教育》2019年第11期21~22页),陈宁《论苏轼的乐天精神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交通职业教育》2019年第4期24~26页)。

[5] 对苏轼教育思想展开比较研究的有,林晓青《苏轼与朱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189~191页)。

[6] 江晓梅《苏轼的妇女观与女子教育思想》,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7] 曹红波《苏轼的人生境界与中学生的人生观

教育》,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8] 韩鸿伟《苏轼教育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9] 陈琼瑛《苏轼文学教育研究》,石河子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10] 为了概念明确,在本文中,笔者将“苏门”定义为“以苏轼这个老师为中心的苏轼弟子群”,将“苏轼门人”限定为“苏门六君子”,以避免概念混淆。

[11] 喻世华《苏轼的人间情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2]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 喻世华《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载《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4] 喻世华《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5] 王水照《论洛蜀党争的性质和意义》,载《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6]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

[18] 杨胜宽《试论秦观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苏秦异同论之一》,载《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9]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概念有着特殊含义,其中“和”即和睦,与现在通用含义没有差异;“同”即苟同,“不同”即不苟同,不随便附和。这与现在“同”即“相同”的通用含义是有差异的。笔者在使用“同”的概念时,除“和而不同”的“同”为“苟同”外,其他都使用“同”即“相同”这一现代汉语词典确认的通用含义。

[20]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2] 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3]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

喻世华,《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王晋川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苏父子浩然之气的源头梳理、养气的各自特色、浩然之气的精神实质，苏家家风家训对三苏父子浩然之气形成的影响四个方面，揭示了三苏父子为人为文、仁爱修德的执著初心和坦荡无私的浩然正气。

关键词 三苏 浩然正气 源头 异同 精神实质 家风家训 影响

被誉为“南州胜迹古祠堂”的三苏祠，有一座飨殿，供奉着三苏父子的塑像。文安公苏洵着红袍居于中，文忠公苏轼和文定公苏辙着紫袍侍坐两边。宋朝官服以颜色分等级，三品以上为紫袍，四品至六品为红袍，六品以下为绿袍，不入品级者为灰袍。

苏洵塑像的龛顶悬挂一匾，谓之“养气”匾，由清乾隆二十年（1755）眉州知州张兑和撰写：

苏氏之学，以养气为宗。洛中兄弟之理，眉山父子之气，前人并论之矣，而斤斤者狃于洛蜀之见，余谓君子之学，苟有德于心身，有裨于家国，有补于纲常名教，虽圣人复生，亦将进诸闾閭侃侃之列矣。兑和登公之堂，有感于此，遂揭其为学之旨，以志景行。盖我公父子，学有本源。长公之言曰：《易》可忘忧，家有师。次公之言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观其家庭授受之间，则我公父子之崛起，有宋而陵越百代者，岂独文章名世也哉！乾隆二十年，岁在乙亥二月十八日，吴兴后学张兑和拜书。

张兑和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吴兴区）人，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于湖州知州任上，因此张兑和与苏轼也算有些渊源。张兑和在眉州任上，多次拜谒三苏祠，并写下这篇跋文，揭示了三苏父子为人为文、仁爱修德的执著初心和坦荡无私的浩然正气。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匾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华名匾”。

—

苏氏之学，以养气为宗，其源头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来一个千古之问：气为何物？

气是中华民族精神巅峰的人格范式和生命价值。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高唱《离骚》，让汨罗江水洗濯尘世的污浊，而高贵的灵魂却飞升九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这是中华正气最悲壮、最华美的歌唱。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2]232}浩然之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2]289}。面对事功世界，只要胸中有这“浩然之气”，就可以做到“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守住做人的底线，就可以称之为“英伟大丈夫”！在孟子心中“民贵君轻”，孟子用浩然之气，把“民”扛在肩上，托举在泰山之巅。

司马迁在“千夫诺诺”的冷漠中，发出“一夫谔谔”的挚言，不过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触怒了皇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没有遵从圣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屈辱地活了下来。“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3]司马迁忍常人之不能忍，擦掉身上的污泥秽水，奋笔疾书。人生的不幸是勇士的战场，带血的头颅换来的是生命的代价——《史记》。

淡泊名利的竹林七贤，嵇康愤慨不屈的一声长啸，炸裂沉闷的暗夜，而临刑前坦然抚琴的

《广陵散》，至今回响在历史的天空。阮藉拍遍栏杆，叩问苍茫大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传》）^[4]千百年过去仍掷地有声！

彭泽小令陶渊明，断然扔掉乌纱帽：“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陶渊明传》）^[5]毅然回到属于他的田园，回到他心中的“桃花源”。

狂傲不羁的李白得到唐玄宗重用，封为翰林，醉卧长安。可李白扪心自问：“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6]。这狂气是中华血脉里特有的风骨、傲骨。

韩愈四次考进士，四次考制科，一顶乌纱帽来之不易，面对举国上下的尊佛狂潮，他逆势而上《谏迎佛骨表》。流放八千里，云横秦岭，谪贬如囚徒，雪拥蓝关，终成“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宗。

胸纳天地，气吞乾坤，纵情山河，激扬文字。非有大视野、大格局、大心胸，不能成就大气象、大功绩、大伟业。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得罪权贵，贬谪蛮荒。他把个人得失化作天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3]，至今洞庭湖畔岳阳楼头，仍振聋发聩，激励后人。

苏东坡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为官四十载，流放十二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7]5573}他在凤翔为民求雨，密州绕城拾乞儿，徐州抗洪，颍州罢修八丈沟，黄州拯救溺婴，西湖筑堤，定州戍边，惠州建东西二桥，即使谪贬海南，仍开馆办学，传播文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大江东去）^{[8]391}他在给好友李公择的信中，展现了一个真实、勇敢、内心强大的苏东坡：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十七首》十一）^{[9]5617}

蒙冤受屈，谪贬流放，昔日的光环倏然褪去，身处逆境仍不忘报国之志，足见苏轼坚忍不拔的性格，勇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南宋大诗人陆

游精准概括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10]陆游也因“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而名垂青史。

及至南宋“精忠报国”的岳飞；伶仃洋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立德立功立言，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五千年中华文明，文脉不断，文气沛然，承先启后，气贯山河。鲁迅先生讲，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同志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写下铭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1]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无数的仁人志士、圣哲先贤，挺起中华的脊梁。一股英雄气，驰骋天地，功昭日月！

二

三苏父子养气，虽同出一源，又各有特色。

苏洵养气是从科考落榜开始的，“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仰面啜云霞，垂手抚百山。临风弄襟袖，飘若风中仙。”（《忆送山人》）^{[12]452}游学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以气养文”的道理，因此愤而烧去平日文章，誓不再试。埋头精研六经百家之书，稽考古今成败之理。嘉祐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进京，献《权书》《衡论》《机策》等22篇文章，名震京师，轰动朝野，天下学者竞相仿效。其《六国论》^{[12]62}开篇即言：“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对照当下中美和国际局势，媚美无异于赂秦。苏洵可谓一针见血，血流千年，至今未干！苏洵还在《心术》^{[12]29}中进一步阐述：“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

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气即士气，养气即鼓舞士气，使之斗志激昂。对战如此，为人做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苏轼养气重在自我人格的完善，充实自我道德力量，最终达到人生价值的至高至美境界。他在《留候论》^{[9]350}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能隐忍，不为小者所夺。培育心志，养其大志，气将随之。此或曰：超越小我，善养其浩气。

苏辙养气，另有心得。他在《孟子解》^{[13]948}中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何气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气，气者，心之发而已。”“气者心之使也。心所欲为，则其气勃然而应之；心所不欲，而强为之，则其气索然而不应。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后有是气。故君子养其义心以致其气，使气与心相狎而不相难，然后临事而其气不屈。”“故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养志以致气，盛气以充体。体充而物莫敢逆，然后其气塞于天地。”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13]381}中指出：“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养气是可以达到“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愈高”的人生境界的。

三

元丰六年（1083），河北清河人张怀民谪贬黄州，流放中的苏轼多了一位意气相投的朋友。张怀民，字梦得，又字偓佺，贬黄州寓居城南承天寺。苏轼与张怀民同为贬官，对政事看法相近，苏轼常与之交往。

有一天晚上，月色入户，苏轼睡不着，便去承天寺找张怀民游玩。归家后写下一篇短文，流传至今：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

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寺夜游》）^{[9]8082}

短短八十五个字，仿佛在不经意间，便将月色、竹柏影和信步的两个“闲人”刻画得栩栩如生。明代王舜俞《苏长公小品》云：“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记承天寺夜游》不过寥寥几笔，就速写出一幅澄净空明、如诗如画的意境，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点睛之笔，更是令人击节，叹为观止。

不久，张怀民买地建房，在长江边筑一亭。苏轼取宋玉《风赋》中“快哉，此风”之句，为之榜书《快哉亭》，并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8]431}：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上阙以亭入景，追忆恩师欧阳修的平山堂。“江流天地处，山色有无中。”本是王维诗句，欧阳修借用为“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苏轼却再次借用：“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表达了在快哉亭上观览胜景的喜悦心情。下阙异峰突起，于平静中掀起波澜，指斥宋玉的幼稚可笑，不识天籁而把风硬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民之雌风”。其实只要胸中有浩然正气，就能坦然沐浴这令人愉悦的千里雄健之风，享受这豪爽不拘的快意人生。

苏轼为快哉亭命名，苏辙则为快哉亭作记：

……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

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黄州快哉亭记》)^{[13]409}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可以看作三苏父子道德完善、人格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高地。

四

三苏的养气是有传承的，从快乐的爷爷苏序到大器晚成的布衣宗师苏洵，再到苏轼、苏辙及后辈儿孙，其家风家训为人称道，竞相效仿。

《‘三苏’家风研究》^{[14]36}指出：“‘三苏’家风是三苏前后几代在家庭内部形成的读书之路、史事之鉴、仁爱之心、廉洁之德、直言之性、贤内之助的家庭风气。”“其流风余韵对于党风政风、民风世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久，眉山市纪委把三苏家风提炼归纳为四句话十六个字：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三苏家风的推出，对于弘扬三苏文化，加强廉政文化教育，纯洁干部队伍廉洁风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近，我在准备国家图书馆《公开课》有关三苏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眉山苏氏一族的繁衍兴盛的密码，这四句话十六个字，似可看作三苏家训：

奋厉当世，循理无私，谦以厚人，自洁自好。

(一) 奋厉当世

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13]1117}载：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更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冲天豪气。少年苏轼听母亲程夫人读汉书《范滂传》，便生出“奋厉有当世志”的万丈豪情，并贯彻于一生。奋厉即奋起、奋斗，当世即现实社会。苏轼从政四十年，无论典领八州，还是谪贬三地，无不心怀天下，奋斗不已。习总书记在新时期讲奋斗时指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

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15]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二) 循理无私

苏轼在《东坡易传》里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16]理是什么？规律，法则。循理就是要充分认识和充分尊重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无私则要求剔除私心杂念，时时警惕物欲和私欲。他在《上曾丞相书》^{[9]5198}中进一步指出循理与无私的关系：“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循理无私在当代社会，可以理解为树理想、守初心、遵法纪、断私欲。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1]这与苏轼的“循理无私”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谦以厚人

苏轼的高祖苏杲(944~994)“轻财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不及。岁凶，卖田赈济其乡里；逮秋熟，人将偿之，终怜其屡辞不受，久致破业，厄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元白珽《湛渊静语》)^{[17]352}。苏洵在《苏氏族谱》中借苏序之口，记下苏杲之德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间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族谱后录下篇》)^{[12]385}

苏轼的祖父苏序(973~1047)，“为人疏达自信，持之以谦，轻财好施，急人之疾”(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苏轼在《苏廷评行状》中另有评说：“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9]1787}

满招损，谦受益。厚于待人，薄于待己。可见苏家祖上除耕读传家，更传下谦虚仁爱，厚人薄己的优秀家训。

（四）自洁自好

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洵之妻程夫人歿于眉州，享年 47 岁，三苏父子匆匆离京奔丧。苏洵在武阳安镇乡可龙里柳沟山寻得墓地。山分两股，其间有泉，蓄为大井，日饮百家。苏洵乃作《老翁井铭》^{〔12〕 406}：“山空寂寥，或啸而嬉。更千万年，自洁自好。”“自洁自好”亦可看作“洁身自好”。苏轼秉承父训，将之传诸子孙。他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7〕 4002}十五中写道：“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欣然六男子，可以传清白。”六男子即苏轼三子：迈、迨、过，苏辙三子：迟、适、远。苏轼、苏辙把一生“清白”传给了苏家后人。

苏轼《六事廉为本赋》^{〔9〕 131}云：“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所谓六事，即善（善良）、能（能干）、敬（恭敬）、正（正直）、法（守法）、辨（明察）。《周礼·天官·少宰》篇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9〕 131}以上六事，皆以廉为首，以廉为本。

清廉正直，是苏门家训的重要内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2〕 48}三省者：忠、信、勤。朱熹《集注》说：“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2〕 48}古之圣贤皆以“省”修身，省即反省，是一种自省自纠的自我完善。古谚云：“正人先正己，不正己焉能正人。”严于律己，率先重范，方为君子风范。废于贪，行于廉，除了制度的约束，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内心要有红线，做人要有底线，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心宁静方能致远，这就是苏洵在《老翁井铭》中提出“自洁自好”的深意。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三苏祠的飨殿前，一起来欣赏清光绪十九年（1893）眉州州判、云南丽江拔贡杨庆远撰写的长联：

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

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

注释

- 〔1〕 屈原著，李山译注《楚辞译注》，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 〔2〕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3〕 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 〔4〕 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
- 〔5〕 房玄龄等《晋书·陶潜传》。
- 〔6〕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
- 〔7〕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8〕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9〕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10〕 李之亮注析《陆游诗文选》，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 〔11〕 孙希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敬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www.cpcnews.cn。
- 〔12〕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 〔13〕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14〕 “三苏家风研究”课题组《‘三苏’家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7 年第 1 期。
- 〔15〕 习近平 2015 年接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2018 年 2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 〔16〕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 〔17〕 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王晋川，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苏轼“内圣外王”教化之道

杨吉华

内容提要 北宋范仲淹的庆历兴学，对苏轼科举应试的教育准备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作用，也为苏轼形成德才兼备的“内圣外王”型人才理念主张，准备了实践经验。在王安石的熙丰新政中，苏轼直接参与了与教育和科举取士改革相关的理论争锋。苏轼主张以科举取士为手段，敦促文人士大夫“学以成圣”，并通过文教事业，在塑造宋代文人士大夫“内圣外王”型文化人格的过程中，传承“斯文”之道，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文化主体身份应有的自觉责任担当。在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追求中，苏轼将“文”的理想与“官”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实际文教行动学以践道，较好地诠释了在唐宋转型背景下，“内圣外王”的教化之道对于宋代新型文人士大夫的塑造培养、斯文传承的文道责任和“明体达用”的为学之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科举取士 内圣 外王 苏轼

在唐宋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赵宋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理念的提出与“重文轻武”政策的执行，极大地激发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型淑世情怀；另一方面，伴随着极具内敛成熟型“宋型文化”的逐步发展形成，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也经历了一个由外在进取逐渐转向内在精神关怀的过程。自《庄子》以来的“内圣外王”思想，经过历代儒家创造性的诠释，在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背景下，“内圣外王”之学，也成了“宋学”的一个重要精神要义。通过内在心性修养之径成为道德高尚的圣贤之人，是“内圣”的本质性规定；对于王而言，以道治世，实现天下太平盛世，是“外王”的必然要求，而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则将“王”的“以道治世”替换为“以道事君”，并在修己成人的过程中，辅佐君主实现王道理想，是为“外王”。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善，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真正意义上落实“内圣外王”之道，并最终实现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但是，由此而来的冗官问题、科场文风问题、君子小人之争，以及政治场域中师生裙带关系而来的朋党之争等负面影响，也成为了赵宋王朝急

需解决的内部问题。加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引发了朝廷对人才的渴求，使得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丰新政”，都涉及到了与教育和科举改革相关的诸多问题，形成了北宋两次著名的兴学运动：庆历兴学和熙宁兴学。亲身经历了这两次兴学运动的苏轼，就宋代“以道事君”的理想人才、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并在政治和文教领域付诸实践，这对于我们深度理解唐宋转型背景下，新型文人士大夫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斯文传承的文道责任担当意识，以及明体达用的“内圣外王”为学之道等问题，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苏轼的政教理想：学以成圣

针对北宋初期的浮华学风、日益明显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费）现象以及对外军事战争的人才需求等，既能够深悟圣贤之道，又能够真正安邦治国、道技两进的经世致用型人才，成为赵宋王朝的迫切需求。从真宗朝开始，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为主的方式，在事实上选拔了一批重声律而轻实用的官员之弊端，也使得“先策论后诗赋”的呼声日益高涨。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有感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1]210}于是，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兴起了宋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时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2]3613}同时，范仲淹启用欧阳修，主持新的科举考试改革制度，将原来进士科考试先诗赋、次策、后论的顺序改为：先策、次论、后诗赋，这就改变了进士科以诗赋定去留的淘汰机制。应

该说,这对于国家选拔具有较强政务能力的经世致用型人才,是具有一定积极引导作用的。此时,七岁的苏轼,正在家乡眉山,在家庭教育中蒙以养正,复又进入乡校,学习经史,为日后的“举子事业”做着准备。但遗憾的是,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便下台了,欧阳修也被迫离开了中央政府,“先策论后诗赋”的改革方案,形同虚设。

直到嘉祐二年(1057),已经成为古文运动领军人物的欧阳修,在主持礼部贡举时,决心以科举考试扭转“太学体”之风,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治国之才,“先策论后诗赋”的科举考试改革方案才真正得以实行,成就了“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嘉祐二年龙虎榜”。22岁的苏轼,受益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平易朴实的文风,为以文求仕进的文人士大夫所争相效仿,对改变以“太学体”晦涩奇怪为主的北宋科场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围绕富国强兵而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涉及国家教育与科举考试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虽然并不是熙丰变法的核心内容,但以“三舍法”为基础改革太学、恢复发展地方学校,并整顿教学课程、编撰《三经新义》(《诗经》、《尚书》与《周礼》)以统一教材和培养专门人才等相关措施,对宋代人才选拔与教育改革等,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兴学运动中,特别是针对科举制度的改革,由神宗皇帝于熙宁二年(1069)发起的一场大讨论,无论是参与人员的广度,还是讨论问题的内容深度,对宋代政治和文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神宗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选,遂议更法。王安石谓:‘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乃诏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进贤兴能,抑由贡举。而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戾矣。今下郡国招徕雋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2]3616}由此可以看出,这场讨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文学取士与经术取士展开,其核心在于宋代人才标准的确定及其选拔问题。

苏轼力主以德为主,不改变原有科举取士方法的态度,较为坚决。“游庠校者忘朝廷,读法律者捐诗赋。场屋后进,挟声技以相苦夸”,(《谢秋赋试官启》)^{[3]1334}“今之读书取官者,皆屈折拳

曲,以合规绳,曾不得自伸其喙”,(《送水丘秀才叙》)^{[3]327}对于现行科举取士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成名于科举,受益于科举的苏轼,并未文过饰非,而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在苏轼看来,以文官政治为主的赵宋王朝,需要的是德才兼备型的安邦治国之才。主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方式,对于为官者处理行政事务的学识与能力,可以依靠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检测,但为官者的德行修养,则难以通过科举考试得到较为公允的评判。然而,若以德行设科名取士,则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也很可能会选拔出一批矫饰言行、弄虚作假的沽名钓誉之徒,甚至会导致文官政治场域内结党营私,并“教天下相率而为伪”的恶劣局面。而实践证明,已经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以诗赋出身而为国家栋梁的忠清鲠亮之士,也为数不少。因此,苏轼认为,能否选任德才兼备之人为官,关键在于君臣是否有知人之明和任用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而不在于诗赋取士还是经术取士。他奏上《议学校贡举状》,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

至于贡举之法,……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

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3]723~725}

神宗皇帝在看了《议学校贡举状》后，赞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2]3617}最后，在与王安石等力主改革的当权派理论交锋之后，宋神宗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部分改革。在考试科目及内容上，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而罢诗赋及贴经、墨义。直到宋哲宗时期，旧党当政，在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科举进士科考试中，才再次恢复诗赋取士，并同时设立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科。诗赋进士以诗赋定去留，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去留，同时，两科均考策论，且参照策论定名次高下。

应该说，在神宗皇帝兴起的这次科举取士改革大讨论中，无论是力主变革的王安石，还是力主沿袭不变的苏轼，他们争锋相对的改革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切中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时弊，目标直指对德才兼备型的圣贤理想文士的选拔培养。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张，对于重德轻才的人才观，具有一定的纠正作用；苏轼的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其以圣贤人格为指向的理想道德君子人才观，则较好地体现了“夫学，王者事也”（《南安军学记》）^{[3]374}的政教理想。在《策别安万民一》^{[3]253~255}中，苏轼就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安万民者，其别有六。一曰敦教化”。因此，作为安万民之首的大事，教育要继承三代之风，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时，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详且密也。学校之制，射飨之节，冠婚丧祭之礼，粲然莫不有法。”“昔武王既克商，散财发粟，使天下知其不贪；礼下贤俊，使天下知其不骄，封先圣之后，使天下知其仁，诛飞廉、恶来，使天下知其义。”只有这种指向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于国家而言，方可“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心，然后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飨，而谨之以冠婚丧祭”；于人民而言，方可“是以目击而心谕，安行而知得也”。对于赵宋王朝而言，从庆历兴学到熙宁兴学的改革调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目的也就在于希望通过帝王科举取士方法与内容取向的变化，来较好地引导天下士子“学以成圣”，道技两进，以便具备治国安邦的实际能力，并最终实现“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苏轼在这场兴学运动中的态度立场和主张，

可谓敏锐地指出了教育手段与教育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直指“学”与“道”的深层次问题。

在《策问六首》中，苏轼指出：“国家承平百年，文武并用，所以辅成人才者，可谓至矣。而五路学者，尚未逮古。岂山川气俗有今昔之殊？将教养课试之法未得其要？”^{[3]216}因此，科举取士作为赵宋王朝遴选德才兼备型圣贤理想人才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始终在于为国家求得符合太祖所谓的“得贤以共治天下”，^{[4]586}太宗所谓的“为致治之具”，^{[2]3607}以及仁宗所谓的“愿得忠孝状元”^{[5]89}的理想圣贤之士，也就是符合儒家仁义礼乐素养要求的，能够真正担当与皇帝共治天下之时代使命的新型文人士大夫。而“三代之学”的精髓，也正在于以人伦道德教化之道塑造理想的道德人格主体。因此，科举取士制度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不是手段方法问题，而是目的问题。“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日喻》）^{[3]1981}由此，针对王安石“经义取士”与“德行取士”的争论，苏轼才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辩证地指出，以德行取士未必都好，以文章取士也未必都坏，以策论定贤愚未必完全可靠，以辞赋决高下也未必全部准确。也正是因为“学”关乎“王”道理想的实现，关乎“敦万民之教化”的重任，在《谢制科启二首》其一中，苏轼才感叹“取人之难”。进而又在对考试和察举存在的弊端分别进行分析后提出，“兼用考试察举之法”：“以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3]1323~1324}

虽然，苏轼通过科举考试塑造并选拔圣贤理想人才的美好愿景，在现实中也并不可能完全得以实现。但是，在“以道事君”逐步成为宋代文人理想追求的政治文化中，作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文人士大夫，无论科举取士采取何种具体方式，从庆历兴学到熙宁兴学的激烈理论争锋中，“学以成圣”的理想追求，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共识。这既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在与君主共治天下中推进“道治合一”政治理想的时代需求，也是文人士大夫将自己“文”的理想带入“官”的实践中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需要。不仅关系到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学识涵养与精神塑造，还关系到这群新型文人士大夫对“道”的理解阐发与责任担当。在关乎政教理想的“学以成圣”追求中，苏轼也以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在“文”与“官”的实践中，实际上承担了唐宋转

型期“斯文”传承的伟大历史责任,表明了宋代新型文士对文与道的责任担当。

二、苏轼的文道责任:“斯文”传承

虽然,在北宋兴学运动的实际展开中,苏轼对于科举制度改革的意见,绝大多数都没有被采纳,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但是,在宋代文官政治背景下,苏轼主动站在与君主共治天下的立场上,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美好期许为目标,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之于王道理想的重要性,同时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辩证地思考了德行教化与科举取士的关系,积极参与了科举取士制度改革调整的争论,希望藉此为国选拔真正意义上德才兼备的新型理想圣贤人才,尤其是在对文学取士与经术取士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士方法的思考里,表现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对“文”与“道”政教理想的深层思考,蕴含着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自我文化身份赋予的时代责任感的自觉担当意识。

“自科举取士以来,如唐韩氏、柳氏,吾宋欧氏、王氏、苏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举之士也。此无他徒,以在场屋苦心耗力。”^{[6]2089}在文官政治背景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格局追求中,科举取士对于宋代文人士大夫读书求学、入仕为官、自我心性修养,乃至有宋一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苏轼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拟进士对御试策》)^{[3]301}他也说过,自己“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3]1432}苏轼的科考之路,主要是在父亲苏洵的引导下完成的。“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7]115},在此科考背景下,苏洵反感于当时文坛上好奇而虚浮不实的文风,在对苏轼苏辙的教育中,格外注意引导他们关注符合儒家《五经》精神要旨的历史政治文化知识,并以孟子、韩愈的文章为学习典范:“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上张侍郎第一书》)^{[8]346}这与当时欧阳修正在酝酿的诗文革新运动精神不谋而合,为后来苏轼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举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进士科依然是最重要的,且其考试内容基本上也还是以诗赋为

主:“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2]3604}这种科举取士对于士风、学风的负面影响,成为了范仲淹庆历兴学的直接原因,欧阳修对此也深表不满:“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盗偶俪,以应试格”。^{[9]663}苏轼后来也曾对自己年轻时,在科举取士价值导向下的文风进行过检讨:“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学,以卒远业。”(《与王庠书》)^{[3]1422~1423}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却旗帜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废诗赋的做法,并指出“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答张文潜县丞书》)^{[3]1427}在这看似矛盾的态度里,实际上隐含着苏轼对其师欧阳修“付子斯文”责任的努力担当。他在《再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说:

呜呼,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3]1956}

欧阳修之所以要对苏轼“付子斯文”,主要原因也就在于北宋“斯文”凋敝的现状:“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六一居士集叙》)^{[3]316}对于文坛而言,则“复自翰林杨公唱淫词哇声,变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聩聩晦晦,不闻有雅声。常谓流俗益弊,斯文遂丧。”^{[10]178}这也是欧阳修发动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希望通过诗文变革来拯救北宋摇摇欲坠的“斯文”现状,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性。他将传承“斯文”的重任委托于苏轼,并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以看出,在欧阳修这里,所谓的“斯文”,与孔子的“斯文”,乃一脉相承之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11]110}孔子的“斯文”,主要是指源自上古而来的礼乐制度与思想文化。这样,在传统礼乐社会文化背景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思想成

为主流之后的漫长封建社会里,“斯文”便逐渐扩大为一种维系国家长久稳定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了。历史上圣贤先哲的社会实践彰显出的是“道”,道的显现便是“文”。那么,“文”也就扩大为了一切包含文学、经术、历史、思想等在内的文化体系了,它也就自然而然地与“道”发生了天然的直接联系。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对文道关系的思考、宋代文人士大夫热衷于探讨的“道统说”,以及面对“咸通以来,斯文不竞”(王禹偁《送孙何序》)^{[12]266}的现状,苏轼前后文人士大夫们反复提及的“振斯文于将坠”、(曾巩《王深父文集序》)^{[13]196}“庸诘非天之将兴斯文也,而以余赞其始”、(王安石《熙宁字说》)^{[14]428}“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辈同扶持。……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石介《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齐济北张洞》)^{[10]19}“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15]638}“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朱熹《圣贤》)^{[15]643}等的感叹,都表现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强烈的济世情怀与责任担当之勇气。因此,欧阳修将苏轼作为自己的衣钵传承人,并将“斯文”大道交付于他,那就不仅仅是学术之道,更是指向“内圣外王”的经世理想。这样的“斯文”之道,必然承担着培养士人圣贤理想品格,进而改造社会,最终达到实现治国安邦的重任目标。因此,“斯文”传承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于塑造形成具有“内圣外王”文化气质的圣贤文士。

既然“斯文”是自历史而来的“道”之可见者,那么,凡是符合儒家正统王道政教理想的礼乐制度、声名典章、文物典籍等,都内在地归属于“斯文”体系。对于身负“斯文”大道的文士而言,传承“斯文”,就不仅意味着要继承上古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并推行于政治实践,而且还意味着,在“斯文”将坠时,文人士大夫需要以守道、存道、修道、行道、明道的方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挽救“斯文”的重任。而“斯文”之道,不仅见诸于儒家经典,而且还散殊于百家思想中,在具体知识形态上,既有经术之学,也有诗赋之文。只有会之合之,不抛弃任何一端,方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斯文”传承的历史重任。

王安石以经术取士,并以《三经新义》统一科考的主张,在实践中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理想效果:“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

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出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16]116}连王安石自己也曾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14]236}

自然也遭到了后世的诸多非议。但是,平心而论,王安石对科考变革的主观目的,也是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型理想人才。他认为,诗赋取士的方式,难以选拔出济世堪用之才。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说道:“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14]2}特别是在面对当时宋夏战争中,北宋政府内部人才匮乏的现实窘境,“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14]2082}诗赋取士客观上存在的弊端,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共识,急需进行调整改变。变“诗赋取士”为“经术取士”的负面影响,是王安石始料不及的。叶梦得就对此批评道:“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7]115}也就是说,需要辩证地看到,“诗赋取士”对于应举者综合学识与能力的要求,包括历史知识、儒家经典思想理解感悟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一味夸大经术取士的积极作用,且以《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的应举者不读“斯文”谱系中的其他丰富历史文化典籍,包括政教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诗赋文学作品,必然带来文人士大夫知识面狭窄、国家整体文化水平下降的后果,这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由于经义取士规定专治一经,也改变了诗赋取士时士人阶层博观泛览的风气,结果造成士人知识面的狭窄,导致了文章写作的浅陋空疏”,^{[17]141}这对于北宋本就存在的“斯文将坠”现实,无疑雪上加霜。

在此意义上说,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经术取士、统一科举用书的做法,对于保存维系“斯文”丰富而完整的文脉体系及其思想传统,具有一定

程度的积极意义。对王安石科举变革带来的新流弊,苏轼也进行了不遗余力地反驳:“近来史学凋废,去岁作试官,问史传中事,无一两人详者”,(《与千之侄二首》其二)^{[3]1840}“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议学校贡举状》)^{[3]724}“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拟进士对御试策》)^{[3]301}可见,长于策论,并因之而科场得意的苏轼,对于诗赋取士和经术取士各自存在的利弊,始终保持了相对客观的认识。他在《谢梅龙图书》中说:“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仓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3]1425}因此,他主张先试策论而后诗赋。从“斯文”传承角度上说,苏轼的这种主张,不但较好地保存了“斯文”内部文脉体系的相对完整性,而且较好地保障了“斯文”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宋代圣贤理想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塑造作用。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9]663}从欧阳修手中接过“斯文”大任的苏轼,谨遵师教,在其亦官亦文的人生中,还以自己的实际文化行动学以践道,典型地体现了苏轼对“内圣外王”为学之道的体悟及其明体达用的文教实践精神。

三、苏轼的文教实践:明体达用

纵观北宋兴学运动中的苏轼,可以说,其对“学以成圣”政教理想目标追求的真正落实,以及对“斯文”之道的真正传承完成,主要是通过他进士及第经历对北宋科场文风的改变,从欧阳修那里接过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大旗,对“斯文”之道的极力拯救,以及对苏门文人及后生士子的教育指导等实现的。

自先秦儒家以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的为学要旨,就是引导文人士大夫以不断反省自我为目标追求。到了北宋,

一方面,一大批通过科举登上历史舞台的庶族知识分子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的整体道德素质、人格精神及文化主体意识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在科举取士的指挥棒作用下,难免使功利之学成为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文化经典对于个体修身养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的重要作用。如王应麟就曾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18]1094}清代的皮锡瑞也说道:“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傅,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9]220}因此,在唐宋转型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受到不断内省化的“宋学”文化精神影响,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我道德境界修养,以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来完成自我超越的“为己之学”,也就成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为学之旨的必然精神追求,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明体达用”之精神。

“明体”就是要在儒家经典上做足通经明道的功夫,并在为学修德中不断增益德行,成圣成贤,实现经世致用,此即为“达用”。早在庆历年间,胡瑗就针对宋初的浮华文风,提出了“明体达用”之学:“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20]57}胡瑗认为,学校教育不应该只是满足于让学生获得词章训诂之学,而是要培养明体达用之材。由他首倡的“苏湖教法”,即以“经义”、“治事”分斋教学,经义斋重明体,治事斋重达用,也就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逐渐为宋代教育领域所普遍接受。这种思路延续到科举取士的改革理念及文人士大夫的“斯文”传承中,便自然地呈现为偏于内圣之学的“明体”与偏于外王之学的“达用”两种路径相结合的主张。

庆历兴学的时候,范仲淹提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人在熟读圣人经典中通达圣人之意,如此才能明“内圣外王”之道:“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御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以为乡先生者。”^{[1]192}因此,教育劝学就应该宗经:“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1]237}因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这样,方可培养出修齐治平的理想圣贤人才。那时,还在眉山为“举子事业”而准备的苏轼,正在父亲苏

洵的指导下,做着“通经致用”的理论学习准备。当然,苏轼所通晓的“经”,不但包括以“六经”为代表,能够经世干政的儒家经典,还包括能够较好修心养性以提升个体精神境界的佛道经典。据苏辙《藏书记》中回忆:“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21]1238}又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一》)^{[21]958}可见,在苏洵的教育下,苏轼兄弟“内以治身,外以治人”的为学目标追求,也具有“进能立功、退能立言”的双重性,依然是沿着“内圣”与“外王”两个方向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这应是苏轼后来在王安石熙宁兴学运动中主张“学以成圣”以实现王道理想的重要实践经验来源之一。

在关于科举取士的理论交锋中,无论是苏轼的“诗赋取士”,还是王安石的“经术取士”,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即科举考试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知识性考试,而在于实现修齐治平的经世之功。科举取士的标准也并不在于单纯看中士子对文化经典中文字章句的训释,而是要探寻其中所蕴含的,能够实现“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义理”所在,这亦是“明体达用”之学。因此,当兼通经史、诗文皆擅,横跨政治、思想、文学、绘画等各个艺术领域的苏轼横空出世后,“修喜得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文风为变”^{[22]55},苏轼以自己出色的文学才华和成就,直接影响了北宋科场文风的改变。在王安石熙宁兴学运动中,他又先后写了《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拟进士对御试策》等陈述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和对科举改革的主张,直至最后在变法中遭受牢狱之灾,依然不改初衷:“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3]935~936}这也正是苏轼践行明体达用、“以道事君”的立身行事之大节所在,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承担“内圣外王”主体精神的一种表现。如此,则不单纯做一个有学识才华的文人,而是做一个胸怀苍生、勇担道义、热爱生活、潇洒出入儒释道三家的新型“内圣外王”型文人士大夫,也就成为了一代文人士大夫的榜样力

量,对北宋理想圣贤型文人士大夫的培养,也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特别是苏轼担负师尊赋予他传承“斯文”之道的重任,培养奖引了一大批如“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这样的优秀文人学子,较好地自欧阳修以来的诗文革新运动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力图通过诗文革新运动,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复兴理想王政,以此解决个体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和重建人间理想秩序的问题。因此,在对苏门学子的教育中,他格外注意对“文字华实相副”的文风、“期于适用乃佳”的务实求学之风的培养。在《与侄孙元老四首》其二,苏轼说:“然亦须多读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3]1841}这种教育主张,较好地契合了“宋学”精神的内在要求。钱穆先生曾经说道:“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23]7}。作为“宋学”精神创造的主体,宋代文人士大夫经历了从民间士人到庙堂士大夫的上升过程,从民间书院讲学到官方办学的教育及科举取士,是推动“宋学”精神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无论是五经,还是诗赋,以及经术,其思想主旨都是从国家政治与个体道德中提升出来的,与王道政教理想相关的思想体系,在关怀天下经世大业的同时,也始终关注文人士大夫的“内圣”精神追求,较好地将经邦济世与身心性命结合起来。宋代学者自称“宋学”为“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义理之学”,就在于强调自己所追求的为学目标在于通过求学问道之途,完成修己治人,并最终实现经世治国的宏伟目标。

在“斯文将坠”的严峻现实面前,苏轼说道:“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24]44}因此,在与苏门学子及其他文人士大夫交游唱和的翰墨活动中,苏轼秉承欧风,以其出类拔萃的学识才情、崇高的道德力量、亦师亦友的文宗师范,直接影响了北宋文学的发展。在对苏门弟子的培养过程中,与他对“道技两进”型内圣外王理想人才的目标追求相一致,苏轼特别注意对年轻学子“丰于才而廉于德”的教导。如,他就曾经批评李廌说:“足下但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丧失所有。言切而尽,临

纸悚息”，（《与李方叔书》）^{[3]1420}以此警示苏门弟子重视对道德品质的内圣追求。包括在他充满坎坷的仕宦生涯中，苏轼也始终特别注意对后学之士的奖掖栽培。在被贬儋州时，他不但身体力行传播，以诗书礼乐之教传授生徒，为海南培养了第一位进士符确，使得儋州文风大振。正如包弼德说的那样：“对苏轼来讲，文化事业代表了他实践自己道德之学的一条可能的道路。它不是惟一的道路，而且由此产生的诗文书画，对人类的福利和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并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个地盘，在这里一个学生可学以践道，而任何能在文这个领域里学以践道的人，也能够其他领域里做到这一点。”^{[25]310}

从范仲淹的庆历兴学，到王安石的熙宁兴学，可以看出，无论他们的政治思想主张和教育改革主张有着怎样的差异，但在最终实现“外王”事功的目的上，他们的追求始终是一致的。庆历兴学时期，改变当时“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1]23}的不良士风与官风，培养“内圣外王”之士以救民之弊，到王安石颁行《三经新义》，希望天下士子能够深挖其中所蕴含的治国大道并按之行事，以实现“其人足以任官，任官足以行法”（《王文公文集》卷八十四《周礼义序》）^{[14]1610}的主观美好理想预设，都在于以圣贤之道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苏轼在北宋两次兴学运动中的理论主张及其文化实践，从求学之道与政教事业两方面，体现了明体达用的精神。求学是为“明体”，事业是为“达用”。苏轼在学习文化经典和古代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的同时，又以强烈的文道责任担当“斯文”传承重任，并致力于师道推崇、重振士风的道义关怀及经世事功，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理念的提出和“重文轻武”政策执行的背景下，表明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终极追求，通过内修其身的“内圣”追求，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文化使命。在这种明体达用精神的引导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当他们通过科举之路成为赵宋王朝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时候，他们的人格理想、学术视野和政治情怀，必将推动宋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整合与共识，从而在权力、思想与教化的互动中，塑造出唐宋转型背景下的新型文人士大夫，并推动唐宋学术的重大转型，使宋代学术、政治、文化、教育等，获得新的生命力。

注释

- [1]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2] [宋]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 [3]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4] [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附录《陈亮言行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 [5] [宋]王得臣著《麈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
- [6] [宋]陆游著《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 [7]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 [8]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9]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 [10] [宋]石介著，陈植锷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 [11]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2] [宋]王禹偁著《小畜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13] [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 [14] [宋]王安石著，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 [15]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 [16] [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
- [17] 林岩著《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18] [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19]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 [20] 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21] [宋]苏辙著，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 [22]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 [23] 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24] [宋]李廌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
- [25]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杨吉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

在“学”与“不学”之间

戎恺凯

内容提要 苏轼“学书观”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强调“积学深至，心手相应”，肯定了书法学习中的毅力与恒心；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表明了书法之法可以不学的态度。事实上，这种矛盾恰恰体现了苏轼“学书观”不执一端的圆融与思辨，而其所谓的“学即不是，不学亦不是”，正是其学书理念的精义所在。

关键词 苏轼 尚意 “学书观” “不学”

作为一代通才，苏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中国文艺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若以文学而言，其以雄逸豪放的文风荣登“唐宋八大家”之列；若以书法而论，其更以秣秀尚意的书风雄踞“宋四家”之首。黄庭坚、米芾、秦观、李之仪等北宋书坛翘楚，或受其亲炙，或得其私淑，可以说，苏轼凭借自己在当时文艺界崇高的地位与声誉，扛起了北宋“尚意”书风的大旗。时至今日，苏轼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固然已成为书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但依旧存在进一步阐释的可能。以苏轼书学思想之“学书观”而论，其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宣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似乎正应了黄道周所谓的“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书品论》）^{[1]402}；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孙岳颂《宋苏轼轮毂人书》）^[2]，充分肯定了书法学习中的毅力与恒心。这两种对于书法学习截然相反的态度，往往使一般学书者愕视沉沉而不知所从。事实上，这种矛盾恰恰表明了苏轼“学书观”不执一端的圆融与思辨，也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体悟其书学思想之精义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层面对苏轼的“学书观”进行初步探究。

一、“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学”的重要性

中国艺术，旨在超越“器”而力执“道”之牛耳的精神，注定其形而上的特质，书法艺术尤其如此。因而，在古人眼中，只有书家的字才能

被认为是书法，而那些仅仅掌握书写技巧能够把字写好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善书者或是字匠。正如苏轼所言：“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3]2206}作为“宋四家”之首，苏东坡的书法技法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此他不强调书法其技之“工”而重视书家其人之“品”，重视由书及人、以书见人是很自然的。

宋人书法“尚意”，尤以东坡为中流砥柱，但只凭借虚无缥缈的“尚意”口号无法垒砌起根基坚固的宋代书法史。在“凡书精神为上”的书法理念指引之下，所谓“尚意”，便是要求以合乎书法创作规律的“笔意”，来表现具有“真我”的艺术特质和审美理想。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其最高境界并非是“自然地表现”，而是“表现得自然”，是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自然书写状态下，融汇书家的技法、想象、精神学养以及传统积淀的某些书法审美要素。所以，想要打开感觉的阀门，自然的书写状态不可或缺。然而，正如孙过庭所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4]只有历经极其严格的技法学习方能实现“进乎技”而达到“道”的境界。显然，苏轼深谙此道，因此他感叹说：

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

苏轼对书界前贤的推崇与对学书下苦功夫的认可是显而易见的。此句未有纪年，曹宝麟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其少时所作，因为那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以及发愤图强的志向，都符合志学之年的心理特征”^{[5]111}，但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更像是苏轼晚年书法达到“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后，于其一生学书经验的平心之论。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他二十九岁时曾有过的“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的“狂妄”。这种前后心理的转变，一如董其昌从青年“目无吴兴”到晚年“始知吴兴书法之妙”的感愧。可见，即便天赋如苏轼者，也不敢真正轻视学书的重要性。尽管苏轼本人并未详尽记述其一生的学书历程，但黄庭坚的追述或许勾勒出其师学书历程的大致轮廓：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

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

[6]269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6]

从黄庭坚的两段跋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苏轼一生学书的不同阶段，对徐浩、颜真卿、李邕、王羲之、柳公权、杨凝式等诸家皆有过留心学习，而博采众家之长正是苏轼“学书观”的重要理念，因此，他对时人学书偏执一家的做法不以为然：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惇）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7]卷五}

蔡卞日临《兰亭》一过，东坡闻之曰“从是证入，岂能超胜？盖随人脚跟转，终无自展步分也！”^{[8]卷二}

章惇与蔡卞皆为“新党”政敌，故而苏轼言语之间颇有嘲讽之意，但也真切地反映了苏轼的学书观。在苏轼看来，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固然是“百代以为法”的经典，但死守着《兰亭》不放，便会使学书的格局变得极为狭窄，非但会对右军之外的诸家之妙视而不见，同时也会使无谓的“日临”成为机械的“重复”，从而难以真正通晓《兰亭》之意。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言：“单线继承的弊病正在于它缺乏比较对象，于是它所能汲取的是一种没有经过整理加工的原始营养，它构不成一个大师所需要的起跳板。”（《陆维钊书法论》）^{[9]5}

苏轼曾言：“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跋君谟飞白》）^{[3]2181}，这一颇具禅理的观点便意味着万物虽各有其理但又息息相通，因而无须执迷于一物，只要掌握其共通之意，便没有什么会令人无所适从。借以论及书法的学习，便是不驻、不执，不仅取一家一帖，而是要在“通其意”的前提下博涉兼取、转益多师。沙孟海先生曾就书法的学习提出过“穷源竟流”的观点，即学某一种碑帖，还同时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

（《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10]202}在笔者看来，坡翁的“通其意”而学之的学书格局或比沙翁的“穷源竟流”更为开阔，更进一步讲，在坡翁眼中只要明了其中艺理，加以通会，那么似乎天下便无可学之书。而章惇的“日临《兰亭》一本”与蔡卞的“日临《兰亭》一过”，之所以“终无自展步分”，除却学习对象的偏狭，其弊还在于“工摹

临者非自得”，从而落得个“随人脚跟转”的地步。然而，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苏轼“尚意”，并且认为即便是作为向古人书法学习的临摹也不可失却“己意”，但他依然警示学书者必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书吴道子画后》）^{[3]2210}

何以一方面主张“新意”，一方面又强调“出于法度之中”呢？尽管以苏轼为首的北宋后期书法多以“申情尚意、趋雅重韵”为旨归，但无论是“情与意”还是“雅与韵”，其本身都无法构成艺术。如果说艺术是情感的符号，那么为了使其价值和意义在接受与解读中实现，符号必然具备某种通约的性质。于书法而言，这种通约性从根本上反映在对于作为艺术规则的“法度”的尊重。在苏轼看来，“若出新意而弃旧学，以为无用，非愚无知，则狂而已。”（《书楞伽经后一首》）^{[3]2085}“创新”未必是“创好”，“己意”若没有“陈法”的支撑，便只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

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宋苏轼评书》）^{[11]卷二百八十六}

沈辽早年学法于沈传师，晚年想要摆脱其束缚而以私意新之，但这种“新”却因出于“私意”而不能成为一种光彩照人的个性缩影，终是表面的浅薄，显得矫揉造作，因而苏轼批评他“遂不如寻常人。”真正能够变法出新意形成个性风格的书家，并不会使前人法度成为某种“影响的焦虑”，相反，他会用前人法度来丰富自我的风格，并运用自己的直觉与眼光去阐释自己对“过去”的理解，与所处的时代书法风尚对话。为此，苏轼极为看重对前人法度的积学，并因此盛赞蔡襄书法为有宋第一：

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宋苏轼评书》）^{[11]卷二百八十六}

苏轼一生对蔡襄推崇备至，并数次申明其书为“本朝第一”，这与其“天资既高，积学深至”是不无关系的。在宋四家中，蔡襄出生最早，然排名（苏黄米蔡）却在最末，这一排名本身便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综合影响的结果。平心而论，蔡襄诸体兼善，书风温文尔雅，而其对书法所下的功夫，更是其前代宋人所未及。但由于自身与时代的双重局限，致使蔡襄的书史地位，只能是一支“尚法”遗绪的安魂曲，而绝不是一座“尚意”发轫的里程碑。^{[5]78}其实，蔡襄书法在当时便遭到不少书家的非议，如黄庭坚所谓“君谟书……

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题蔡君谟书》）^[12]卷十；米芾所谓“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海岳名言一》）^[13]卷二十四；章惇所谓“取君谟墨迹观之……亦少骨力，所以骨弱而笔嫩也”^[14]卷十。与诸家相反，苏轼却为蔡襄极力辩驳：

仆尝论蔡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殊非知书者。若江南李主，外险而中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君谟书》）^[15]

苏轼并非对蔡襄书法存在笔弱和乏新的问题视而不见，不然他也不会有“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16]卷五的评语，但何以对蔡襄的评价如此之高呢？在笔者看来，苏轼的“终守此说”与其说是拜服蔡襄的“天资既高”不如说是称赞蔡襄的“积学深至”。蔡襄诸体皆擅，姑且不论成就如何，单就对古法的浸淫之深，可谓北宋建朝百余年无出其右者。也正因蔡襄的学书理念与书法实践，才结束了北宋建朝以来书法随波逐流的纷乱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蔡襄对传统的“积学深至”也为继起的“尚意”书风找寻到了牢固的根基。而从“积学深至”的扎根传统，到“抒情尚意”的变法出新，才是苏轼学书观的重要方面，无怪乎他会说：“轼亦以为学先生（蔡襄）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17]

二、“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不学”的合理性

“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唐张怀瓘文字论》）^[18]卷四张怀瓘的言论无疑为北宋“尚意”书风之兴开了先路。而相比张怀瓘的“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苏轼更是呐喊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19]235

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19]209

这两句名言对后世学书者可谓是诱惑至极的。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人心灵的物化”，那么书法就绝不仅仅是“有意味的形式”，便无需斤斤

于点画而信手为之，这是其之所以“诱人”的磁场；如果在书法艺术中“晓书”优于“善书”，那么“通其意”便真的可以不学书法之法吗，这是其之所以“惑人”的难题。就这两句名言而论，字面意思的浅显易懂其实潜藏着深刻的书理玄机，而了悟此中奥妙则必须对苏轼所谓的“通其意”进行阐释。

无论是张怀瓘的“物无遗照，何有不通”，还是苏轼的“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其关捩皆在一“通”字。事实上，苏轼的“不学可”正是以“通其意”为前提的，其言下之意是：对于不能“通其意”的一般学书者，并不应该存有“不学可”的斗胆。那么，何谓“通其意”呢？苏轼在《文与可画筍簞谷偃竹记》中说：

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3]365

在苏轼看来，像其弟子由（苏辙）那样只鉴而不画者，只能算“得其意”；而像他自己那样既鉴也画但不精熟者，充其量也只是“得其意，并得其法”；唯有像文与可那样如庖丁解牛技进乎道者，方可谓“通其意”。因此，所谓“通其意”，乃是经由长期修学与实践，对技法的谙熟达到炉火纯青后所展现的合于法而又出于法的“下意识”，到达如此境地后便能融会贯通，才能“不学可”。绘画如此，书法亦然，而在苏轼看来，于书法“通其意”者，首屈一指便是蔡襄：

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宋蔡襄飞白书》）^[2]卷七十六

而在蔡襄之后能“通其意”者，在苏轼眼中大抵只有他自己了：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书赠徐大正四首》其四）^[3]2190

尽管苏轼书法多以真、行见长，少作草书。

但他并非真的不会草书，恰恰相反，他对草书有着独到见解：“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宋苏轼论书》）^{[11]卷二百七十三}不仅如此，苏轼还对自己的草书自视甚高，称其醉中作草可比卫瓘、索靖，“与二妙为三”^{[11]卷三百四十二}，并称“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盛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于东坡上下耳。”可见，苏轼自认为其草书是可望颠张醉素之项背，而比肩蔡襄的。由此观之，苏轼所以言“不会”者或许是觉得庸人不值与谈，而对于“学人”则更能“通其意”，东坡则不屑一顾。草书固然是“积学而成”，但学并不是目的，而当所学之“法”作为一种先验存在时，便更加成为“自出新意”的负担。苏轼所追求者，实乃“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杂言上》）^{[20]卷四}

善书者往往“求工”，其弊便在于“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今之妙处已亡”；而晓书者往往“无意于佳”，不师法于人却以“天真烂漫”为师。师造化，法自然，可谓中国艺术精神之最高理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凝滞于自然物象、对生活日常的机械摹仿，因此，苏轼对当时学书者盲目师法自然以求笔法的做法嗤之以鼻：

世人见古有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书张长史书法》）^{[3]2200}

在苏轼看来，用“通感”先于“通意”的观念想要习得笔法之妙是于事无补的。“通感”是一种后于“通意”的借鉴方式，首先必须通晓艺理，否则就没有什么可资借鉴了。自然物象的天真烂漫之所以可师，必由“通其意”之心的天真烂漫为中介，是以能够不凝滞于法自然的种种琐碎器形，而师造化创生万物之“道”以达表现自我情韵的艺术面貌，所以他在《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中说：

然其为人悦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3]2177}

这或许可作为对苏轼所谓“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最好旁注。但这种“无意于佳乃佳”又往往是可羨而不可学的：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

无法。（《跋王荆公书》）^{[3]2179}

如果说，苏轼认为蔡襄“遗力余意”而自成一体的飞白书“可爱而不可学”，乃是基于其对真、行、草、隶所下的工夫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是后天积学所至的融会贯通；那么，在这里苏轼认为王安石书的“不可学”，乃是因为其书“得无法之法”，是先天禀赋使然的一以贯通。其中妙理，黄庭坚论苏轼书亦是同感：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1]

卷八下

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接受之维中，当经典书作被后世学者所反复选择与效法时，作品所包含的技法手段与形式技巧便会以“传统”的名义为后世学者提供典范，这便是书法之法的可学性。西方学者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但在东方，自古以来“纯然形式”的意味都远不及自觉表达某种意味的形式更打动人。而作为文人的艺术，书法向来强调“书为心画”“书如其人”，这就要求笔墨技法须传达书者的人格学养、审美体验与精神气质，而这种内在的神采之美又并非如外在的字形之美那样可以“规范”，这或许可作为对苏轼所谓“无法之法”的一种理解。

作为“宋四家”之首，苏轼的书法在技法运用层面自然不存什么障碍，因而鼓吹“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便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不学可”除了出于这位书法天才“通其意”的自负，还隐约包含着“不可学”的警惕。

三、“学即不是，不学亦不是”——“学”与“不学”的辩证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宋尚意书风的兴起与禅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观念之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苏轼将这种充满辩证色彩的学书观总结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是”正体现了“以禅喻书”，洞察了从学习法的孜孜以求到不学法而追求意的畅达无束，乃是书法修习的必由之路。至于自命“我书意造本无法”，其实是警示世人学习技法的目的在于“法”的为我所用，而并非在“法”的牢笼中迷失自我。在苏轼的书学思想中，也可屡屡见得禅宗的意味，如他曾在《小篆般若心经赞》里借用禅宗般若智慧来阐释书理：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

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3]618}

书法的创作离不开对于技法的学习，是在对技法了熟于心后以“我”的意志对其进行选择与运用。虽然有时候这种下意识似乎是对法的“遗忘”，但即便是对法从“忘”进入“无”的状态，也并非真就是“无法”，而应是“无定法”，故而他

说：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宋苏轼论书》）^{[11]卷二百七十三}

而对于执笔，他更是认为：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苏文忠公论书》）^{[13]卷二十三}

时至今日，书法界依然对何种执笔才是正确科学的争论不休，其实，苏轼早已将该问题说得一清二楚：执笔并不存在固定的方法，只要笔性体现个性且不失法度便为可取。进一步说，学习技法的规范也需知变通，唯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方是善学。而这种“学即不是，不学亦不是”的学书观也极为典型地落实在他对颜真卿书法的学习上。苏轼曾盛赞颜真卿为“古今书法集大成者”：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3]2210}

唐人尚法，又以鲁公为甚。在苏轼看来，古今书法之法完备于颜鲁公。或许有人会认为苏轼对此颇有微词，原因是苏轼也曾多次说过：

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变诗格》）^{[22]卷十五}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宋苏轼评书》）^{[11]卷二百八十六}

如此言论乍一看似乎是说颜真卿才是“书法之坏”“笔法衰绝”的罪魁祸首，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无论从苏轼的书学理论还是从书法实践看，他对颜真卿始终抱有无与伦比的赞许与崇敬，因此他才有“颜公变法出新意”这样的评价。可以说，在苏轼眼中，颜真卿不愧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最高典范。而真正导致“书法之坏”“笔法衰绝”的，乃是后世学颜书者，往往将自我心性禁锢于颜书法度的牢笼中无法自拔。这样

一来，法度谨严的颜书既成了学书者掌握书法之法的入门途径，又成了学书者闭锁个性创造的前行枷锁。针对学书者学法的僵化，苏轼提出了鞭辟入里的批评：

守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疑，以智先法，则法活。（《书北极灵签》）^{[3]2272}

同样是学颜真卿，苏轼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记潘延之评予书》中说：

潘延之谓予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于前人者也。^{[3]2189}

此句的关键便在于“似鲁公而不废于前人”，这即是说苏轼虽然学颜真卿，但并非没有主见的全盘接受，在取颜书雄强豪放的同时而不失萧散简远的韵致，是既存“古质”，又富“新妍”，正所谓“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而关于苏轼对颜真卿书法的“活学”，黄庭坚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比来作字，时时仿佛鲁公笔势，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题东坡字后》）^[6]

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题欧阳偁夫所收东坡大字卷尾》）^[23]

黄庭坚所谓的“风气皆略相似”“遣笔不工”“暗合孙吴”，说到底，都是指苏轼学颜书并未停留在形似的表面。诚然，苏字得于颜法，是稍有书法审美的人一眼能见的，二者共同之处都在于用笔厚重、字势宽博、结体茂密，给人以沉雄浑穆之感。就楷书而言，相比于颜真卿以横细竖粗之法得虚实整饬之态，苏轼则是以左高右低之势得沉稳端庄之姿。有人指摘苏轼用笔“以手抵案”而有字势斜扁之病，黄庭坚则对此不以为然：

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跋东坡水陆赞》）^[23]

如此看来，黄庭坚可谓真正的“深识书者”，而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书法美学之奥妙：书法艺术的审美接受，无法回避作品与书者的联系，而书

者的人格学养便成了观者审美联想的线索,从而使作品获得不同于他人的“增值”。因而,同一个笔画的“违”与“和”,有人认为是败笔,有人却可能觉得是点睛。就本质而言,书法艺术的动人之处并不是作品作用于观者的直接感官所引起的,而是观者的主观情感外射使之具有情感意蕴与审美价值。如此一来,虽“遣笔不工”又有何失呢?而学习书法之法的目的,自然不是使自己的书法达到理想的完美无缺,有时候这种不完备的缺陷恰恰是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之体现。黄庭坚将苏轼与颜真卿比肩,称“两公皆一代伟人”,而苏轼自认为“似鲁公而不废于前人”则更有略胜之喜。在笔者看来,颜真卿以“颜体”教化后世,而苏轼以“苏体”流芳书坛,二者本无高下之别。苏轼之所以有略胜之喜,或许是因为鲁公一出前人皆废,而已书虽学于颜但相比“颜体”的不完备、不规范,甚至是“石压蛤蟆”的缺陷,恰恰意味着自己的书风有着方兴未艾的生命力,而一旦被认为是完备、规范、成熟,并且成为严格规范的法度,接踵而来的便是衰颓和僵化。

诚然,在苏轼的书论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如“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样的言论,仿佛是在强调学习书法“功夫应在书外”。其实,这正体现了苏轼学书观的辩证之处:“未足珍”并不代表对于“退笔如山”的一概偏废,只不过是警醒学书者不可一味执迷于书法之法。作为一代书法宗师,苏轼当然深知阅读多少书籍对书法本身的提高并没有直接益处,因此他也曾发出过“故人杨元素、颜长道、孙莘老,皆工文而拙书,或不可识……今皆为陈迹,使人哽噎”(《题颜长道书》)^{[3]2194}这样不无遗憾的叹言。自然,对学者而言,若欲使书艺有所精进,那么像苏轼所言“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宋黄庭坚论书》)^{[2]卷六}便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对书法之法的学习,苏轼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警惕,这在他对待颜书的学与不学上尤其典型。

由此看来,所谓“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这样看似反对技法学习的极端言论,实则是苏轼圆融自得的思想体系观照下对机械强调书法技法学习的重要补充,阐明了从学习技法到法为我用的转换过程。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夫大家之能得心应手,正先由于得手应心。技术功夫,习物能应;真积力久,学化于才,熟而能巧。专事技巧不成大家,非大家

不须技巧也,更非若须技巧即不成大家也。”^{[24]211}

注释

- [1] 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 [2] 孙岳颂等纂修《佩文斋书画谱·论书六》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 [4] 孙过庭《书谱》,明刻百川学海本。
- [5]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6] 黄庭坚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 [7]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 [8] 孙承泽编《砚山斋杂记》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陈振濂《陆维钊书法论》,《中国书法》2015年3月刊。
- [10]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3月版。
- [11] 倪涛《六艺之一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汪珂玉撰《珊瑚网》,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张邦基《墨庄漫录》墨庄漫录卷十,四部丛刊三编景明钞本。
- [15] 苏轼《仇池笔记》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朱弁《曲洧旧闻》卷五,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 [17] 董更《书录》中篇,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 [18] 张彦远撰《法书要录》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20] 董其昌著《画禅室随笔》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八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景宋乾道刊本。
- [2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戎恺凯,东南大学2018级艺术学理论博士。

陈秀民《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书考实

杜春雷

内容提要 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两部较为知名的专门评说苏东坡诗文的话、诗话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指出二书体例不纯，采辑随意，并杂收明人著述，故怀疑其是伪作，但未能定讞。今人因缺乏确凿证据证成其伪，也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所利用。本文证明《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为伪书，其作者并非元人陈秀民，二书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冒名元人陈秀民，别署书名，以充秘本。如此，以往建立在二书真实性基础上的相关成果和结论，应重做检讨。

关键词 陈秀民 《东坡文谈录》 《东坡诗话录》 《苏长公外纪》 辨伪

四川眉山人苏东坡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文豪，在诗词、文赋、书画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影响深远。历代研讨东坡诗文者众多，相关著述也十分丰厚，被认为是元人陈秀民所著的《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即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两部。这两种书今传曹溶《学海类编》本^[1]、清抄本，属于诗文评类，其搜集东坡诗文杂事颇夥，又加之是元人所作，成书较早，因此格外受到重视，屡见征引凭依。但其实，这两部书并非元人陈秀民所著，而是清人造伪、托名陈氏的伪书。本文试为辩之。

一、陈秀民其人

陈秀民，元代确有其人。其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元人顾瑛《草堂雅集》的记载，明清两代，《列朝诗集》《元诗选》《瓯海轶闻》《嘉禾征献录》等诸多诗选、地志著作多载录其人，今人所编文

学辞典也曾收录其小传^[2]。杨镰《全元诗》收录其诗作48首，并有小传颇详备，不妨抄录如下：

陈秀民，字庶子，晚号栖老。温州（今属浙江）人，寓居嘉兴（今属浙江）。博学善书，至正间为武冈城步巡检、知常熟州。张士诚据有吴中，陈秀民为参军，历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入明未详所终，洪武二十二年尚在世。编有《东坡文谈录》一卷、《东坡诗话》三卷。顾嗣立《元诗选》三集编录其诗三十八首，题为《寄情稿》。^{[3]194}

关于陈秀民的里籍，除温州、嘉兴二地外，尚有不同记载。

一是四明，即今浙江宁波一带。今传本《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署作者为“四明”人，《四库全书总目》承袭其说，清人沈季友《樵李诗系》也说陈氏是“四明”人。孙诒让《温州经籍志》认为“秀民实永嘉人，后居嘉兴。此云四明，盖曹氏误题，四库提要亦未考正，疏也”^{[4]1693}，否定陈秀民为四明人说，但未做详细举证。察清人朱珪《名迹录》收录元人易伟为其妻李氏所作《圻志》，易伟之子为易伟所作《圻志》，皆记载二人有两女，“次赘湖南帅掾四明陈秀民”“次赘庆元陈秀民掾湖南帅府”^[5]，即二女儿嫁给了四明人陈秀民（庆元为四明别称）。此陈秀民至正年间官“湖南帅掾”，与本文关注的至正间为武冈城步巡检的陈秀民，履历近同（武冈属湖南），两个陈秀民，应为同一人。则说陈秀民为四明人，不为无证。又，清人安岐《墨缘汇观录》记载陈秀民和陈惟寅姑苏钱塘怀古诗诗笺之上，有“四明山道士”白文印^[6]，文征明《溪山秋霁图跋》也记载陈秀民有“四明山道士”的别号^{[7]565}，则陈秀民曾在四明地区生活应无疑问，“四明”可备一说。

二是宛丘,即今河南淮阳一带。明人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收录元代《良常张氏遗卷》,乃元末文人雅士送别原任吴县尹的张经迁官嘉定州同知,分题赋诗而成。陈秀民参加了此次聚会,分题得“灵岩”,作诗一首,末题“宛丘陈秀民”^[8]。此外,《赵氏铁网珊瑚》还收录了陈秀民所作题元人朱桓《卢贤母传》一文,文末题署同为“宛丘陈秀民”^[8],以上二例署名,都出自陈秀民的自述,可信度很高,则宛丘应为陈秀民的族望之地。

关于陈秀民的文集名,《千顷堂书目》《元诗选》《元史艺文志》著录作“寄情集”,而《明诗综》《橈李诗系》及天启《海盐县图经》、嘉庆《嘉兴县志》等志书则著录作“寄亭集”。考《墨缘汇观录》记载陈秀民和陈惟寅姑苏钱塘怀古诗诗笺之上,有“寄亭”白文小长印^[6],文征明《溪山秋霁图跋》也记载陈秀民“号寄亭”^{[7]565},则“寄亭”为陈秀民之号,集名似应作“寄亭集”为是。

陈秀民工诗,多参加元末东南文士雅集唱和,元季顾瑛编《草堂雅集》已收录其诗作二十余首。可惜他的别集早佚,我们已难窥其诗作概貌。《全元诗》从诸书中辑录其诗48首,可尝鼎一脔。《全元文》未收陈秀民其人其作,实则他仍有遗文可寻,除前文提及题元人朱桓《卢贤母传》一文外,他为昆山重建三皇庙所作记文,也仍存世,可供采择^[9]。

二、《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质疑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的主要内容是汇录苏文、苏诗有关评论资料,其文献来源主要是宋人诗话、笔记。其中,《东坡文谈录》共60则,总一卷,《东坡诗话录》共180则,分三卷。这两部书署名元四明陈秀民编,但陈秀民是元末明初人,这两部书在明代的目录书和其他相关著述中却都不见著录。二书现存最早版本只是清初出现的题曹溶编、陶越增订的《学海类编》本,此外只有嘉庆年间的一部清抄本^[10]和据《学海类编》本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而《学海类编》是一种被指斥为“粗编滥造”^{[11]293}“真本仅十一,伪本乃十之九”^{[12]1139、827}的大型丛书。没有书目著录、著述提及,突然出现在一部真伪问题严重的丛编中,这不禁让人

们对《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四库馆臣征集到这两部书,入存目,并首先提出了疑问。

《东坡文谈录》提要云:

是编杂采诸家评论苏文之语,大抵诸书所习见。又秀民既别有《东坡诗话录》,而此编又滥及于诗,为例亦复不纯。^{[12]1799}

《东坡诗话录》提要云:

秀民既作《东坡文谈录》,复杂采诸家论苏诗者裒为此书。其排纂后先,既不以本诗之事类为次第,又不以原书之年代为次第,殊无体例。又如记仇池石数诗,直书原诗,前后并无引述,如此则全部苏诗皆可入录矣。至记芙蓉城诗,于题上加一游字,舛误尤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采历代诗话,苏诗仅其中之一家,而核其条目,较此尚多大半,则此录之挂漏可知矣。所引诸书,惟《燕石斋续》一书世罕传本,然持论颇浅陋,如证“春事阑珊芳草歇”句,引唐刘琮及传奇女郎王真诗,而不知为谢灵运语。则其书亦不足重也。又秀民既元人,而书中乃引《西湖游览志》一条,是书为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见之?曹溶《学海类编》喜造伪书,此类亦可疑者也。^{[12]1799}

四库馆臣认为《东坡文谈录》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采集的资料内容常见,不稀奇;二是文话书中掺入了论诗的内容,体例不纯;《东坡诗话录》则有内容编排无序、滥收原诗、妄增诗题、采集资料数量有限、《燕石斋续》持论浅陋等问题。在列举诸多不足之后,提要最后指出,《东坡诗话录》这部元人著作中,出现了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的内容,又加之《学海类编》喜造伪书,从而推断《东坡诗话录》这部书的真伪是“可疑”的。

继四库馆臣之后,清末孙诒让编修《温州经籍志》,在收录陈秀民及其《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时,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在征引四库《东坡诗话录》提要后,加案语云:

《东坡诗话》亦曹氏《类编》所刻,其书体例与《文谈录》同。末引无名氏《燕石斋补》,有“余从都元敬出示墨迹”云云,元敬为明都穆字,作《燕石斋补》者,既与同时,则亦明人无疑。庶子何以得见其书,

与《四库提要》所举《西湖游览志》一条，同为伪托之墙证也。^{[4]1694}

对于《东坡文谈录》，加案语云：

其书凡六十条，并逐录旧文，全无考证，时代先后，亦漫无义例，与《东坡诗话》，盖一手伪作也。^{[4]1692~1693}

孙诒让在四库提要指出《东坡诗话录》录有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内容之外，又注意到书中还出现了有关明人都穆的记载，从而认定二书确为伪托。

《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诸条目，有的会在一条之末，以小字标注出处，但这样注明出处的只占不到三分之一，更多的则付之阙如；注明出处的，有的标注书名，有的仅标出作者名，体例也不统一。对每条原文进行文献溯源，可以发现，书中文本的漏洞除了出现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都穆这两处外^[13]，还有不少可质疑之处。

一是出自《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的并不如四库提要所言仅一条，而是至少有十五条。《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是明人田汝成（1503~1557）编著的记述西湖及杭州山川形势、创置沿革、掌故轶闻的笔记^[14]。苏东坡与西湖渊源深厚，在二书中有不少记载。经核查，《东坡诗话录》第9至18条（“杭州金鱼宋初甚少”条^[15]、“天竺桂花秋来特盛”条、“苏子瞻有和杨公济梅花三绝”条、“时府治虚白”条、“瑞香有黄紫二种”条、“杜鹃花诸山皆有之”条、“牡丹唐时杭州无此种”条、“枇杷白者为上”条、“宋时梵天寺有月廊数百间”条、“杭州茶宝云山产者”条）皆出自《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四。第61条“苏子瞻佐郡”、第69条“惠勤惠思者”出自《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第62至64条（“朝云者姓王氏”条、“苏子瞻倅杭日”条、“陈直方之妾稽”条）出自《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第66条“智果院旧有参寥僧”出自《西湖游览志》卷二。

二是《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中至少有八条是出自杨慎《丹铅总录》^[16]。《丹铅总录》是杨慎（1488~1559）所著考证类笔记，其中有些条目涉及东坡诗文。经核查，《东坡文谈录》第37条“宋周公谨癸辛杂识”即《丹铅总录》卷十“三苏不取孔明”条，第43条“张子曰造化之妙”出自《丹铅总录》卷二三。《东坡诗话录》

第174条“东坡春事阑珊芳草歇”即《丹铅总录》卷十五“坡诗”条，第175条“宋初置通判”即《丹铅总录》卷十六“监州”条，第176条“东坡梅诗”即《丹铅总录》卷十七“檀晕”条，第177条“魏文帝示群臣诏”即《丹铅总录》卷十八“魏文帝蒲桃诏东坡橄榄诗”条，第178条“禅宗颂古唐僧古梅诗”即《丹铅总录》卷十九“东坡梅诗”条，第179条“杜诗关山同一点”即《丹铅总录》卷二十“关山一点”条。

三是《东坡文谈录》第54条“文与可画竹是竹之左氏也”出自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十二。王世贞《艺苑卮言》有卷帙不同、内容各异的数种不同版本，此条见于十六卷本《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卷十二^[17]，是王世贞的画论。

以上所举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杨慎《丹铅总录》、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条目出现在了元人陈秀民所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中，这不能不让人对二书的真实性产生很大的质疑。

三、《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伪造自《苏长公外纪》

尽管缺乏版本流传信息，仅收录于一部聚讼纷纭的丛编中，且正文出现不少明人著述的内容，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旧题元人陈秀民著《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伪书，但要真正坐实这一判断，仍缺乏确凿的证据。刘德重先生指出，虽然《东坡诗话录》中出现明人著述内容，“然仅此两条，难下定论，或为后人窜入亦未可知。继宋代《集诸家老杜诗评》和《杜工部草堂诗话》之后，作为专门辑录一家之诗话汇编，本书亦可聊备一格。”^[18]认为判断《东坡诗话录》是伪书，“难下定论”，元人著述中出现明人著述内容，也可能是“后人窜入”。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也颇具代表性^{[19]163}，以致虽然四库馆臣、孙诒让等人已经高度质疑《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是出自伪托，但至今学界仍重视二书的价值，多见利用，并未将其视作伪书。

要考实《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确系伪托而成，最直接有效的证据是找出造伪者炮制这两部书所依据的原始蓝本。经查验比对，二书内容与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近乎全同，《苏长公外纪》即是伪造《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的蓝本。

《苏长公外纪》原本十卷，是王世贞取苏东坡“年谱及传志”，并蕞辑东坡“小言与诸家之评鹭、纪述，琐屑亦一一附录”，分类编排而成^[20]。万历二十二年（1594），璩之璞得到此书抄本，遍考苏东坡全集，“按题审类，刊正重复”；兼引宋元及明代诸小史、嘉话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所载东坡事迹，补入原书；又旁采群籍，在原书末增补《逸编》，终成通行本《苏长公外纪》十二卷^[21]。十二卷本全书分年谱、遗事、恩遇、赏誉、好士、志行、政术、诗话、文谈、考误、玄理、禅那、调谑、风流、书画、杂纪、遗迹、讥评、诗案、逸编二十目，其中卷四上诗话、卷四下诗话、卷五上诗话、卷五下文谈，辑编东坡诗文评论资料。

将《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内容与《东坡诗话录》《东坡文谈录》详作比勘，除个别用字不同外，它们之间仅两处较为明显的差别：一是两则条目所处位置顺序不同，《苏长公外纪》“诗话”第2条“昔人作七夕诗”在《东坡诗话录》中为第38条；《苏长公外纪》第41条“东坡诗不可指摘轻议”在《东坡诗话录》中为第2条。二是《苏长公外纪》“诗话”第173条“江干高居坚关扃”比之《东坡诗话录》同条，在条末多出130余字。

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的“发现”，同时解决了诸家关于“燕石斋补”涵义的纷争。《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中明确注明出自“燕石斋补”的有十三处，关于它的具体所指，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云：“内引《燕石斋补》一书，似是元人书。”^[22]¹¹⁵⁹《四库全书总目》云：“所引诸书，惟《燕石斋续》一书世罕传本。”^[13]¹⁷⁹⁹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云：“未引无名氏《燕石斋补》，有‘余从都元敬出示墨迹’云云，元敬为明都穆字，作《燕石斋补》者，既与同时，则亦明人无疑。”^[4]¹⁶⁹⁴或认为“燕石斋补”是元人书，或认为是明人书。现代学者则一般认同《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燕石斋补”是一部世罕传本的著作^[23]。

其实，“燕石斋补”并非什么书名，“燕石斋”是璩之璞的斋号，《苏长公外纪》由燕石斋刊刻，今传本书口下即镌有“燕石斋刊”字样。璩之璞所作记述刊刻过程的跋文，也在文后自言“录成，纪其岁月，藏之燕石斋中”^[21]。前文已及，璩之璞对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原书做了两

方面的增补工作，一是对王氏原书正文，征引宋元及明代诸小史嘉话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所载东坡事迹，“撮百余事，次第补入之”^[21]。二是在王氏原书之末，“旁采群籍，又百余事，系之终卷”^[21]，即在书末增补成《逸编》二卷。所谓“燕石斋补”，就是璩氏在做前一种增补工作时，在所补条目后题署的标识，这一标识在《苏长公外纪》中大量出现，它并非是一部书，而是表示该条目是由璩之璞燕石斋增补。

从《东坡诗话录》《东坡文谈录》与《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文本的相同程度，《东坡诗话录》《东坡文谈录》内容中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杨慎《丹铅总录》、王世贞《艺苑卮言》、“燕石斋补”内容的大量存在，以及璩之璞所做的具体补编工作，可以推定《东坡诗话录》《东坡文谈录》确系伪书。其作伪手段是截取王世贞编著、璩之璞增补《苏长公外纪》卷四、卷五“诗话”“文谈”两部分内容，别署书名，并托名元人陈秀民为作者。这应该是清初《学海类编》的编刊者所为^[24]²⁹³，其目的无非是冒充稀见秘本以射利。

四、结语

作为专门评说苏东坡的诗话、文话著作，《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曾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和重视，在研究东坡、宋代诗文、诗话，汇评汇纂东坡资料、整理诗文话文献等相当数量的著述中，都能见到引述陈秀民《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内容，介绍陈秀民其人其书其学的文字，除前文所举《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诗话概说》外，还如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于“金元”设“陈秀民”小节，介绍《东坡诗话录》中的修辞部分^[25]^{347~348}；蔡镇楚《中国诗话史》于“元代诗话”中，通过《东坡诗话录》介绍陈秀民诗歌主张^[26]^{145~146}；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收录《东坡文话录》，认为其“作为苏文汇评专书，尚属首例”^[27]¹⁵⁰⁷等。此外，台湾李慕如教授还有《析论元代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之形式结构与价值》《试由“文术论”探析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之学术贡献》《试由“文评论”探析陈秀明〈东坡文谈录〉之学术价值》系列文章^[28]，研讨《东坡文谈录》的文章学价值，等等。此类研究、

评述及其他征引、汇编类学术成果,都建立在陈秀民《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真实性的基础上,现在既然已证成其伪,相关成果和结论自然也需要重做检讨。本文粗见,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助益。

注释

- [1] 《学海类编》本误题作者为“陈秀明”。
- [2] 如马良春、李福田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21页),邓绍基、杨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198页)等。
- [3]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
- [4]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33,中华书局,2011年版。
- [5] 易伟《故宜人李氏圻志》、易□□《故从仕郎吉水州判官易府君圻志》,朱珪《名迹录》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安歧《墨缘汇观录》卷2,清粤雅堂丛书本。
- [7] 文征明《溪山秋霁图跋》,《文征明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8] 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卷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陈秀民《昆山州重修三皇庙记》,见收于朱珪《名迹录》、《江苏金石志》等,已有学者指出为《全元文》佚文,参见谷春侠、刘慧《〈全元文〉拾遗七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6期;赵威、魏崇武《朱珪〈名迹录〉文献价值初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8第1期。
- [10] 此清抄本藏南京图书馆,末题“嘉庆清和中浣,白驹居士粗校一过”,笔迹与《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录》正文同,可知此本即抄于嘉庆年间。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 [11] 参见王媛《〈学海类编〉探论》,《国学研究》第3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 [13] 明人田汝成著有《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四库提要言《东坡诗话录》所引《西湖游览志》一条,其实是引自《西湖游览志余》。
- [14] 本文所据《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版本为明嘉靖刻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诸条目无题,取条目开首几字代表该条。
- [16] 本文所据《丹铅总录》版本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王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厄言》,明万历十七年武林樵云书舍刻本。
- [18] 刘德重、罗立刚《东坡诗话录》提要,傅璇琮总主编、刘德重本卷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相同表述又见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修订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9] 霍松林主编《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本书中有《东坡诗话录》提要,也认为这种情况“显系流传过程中后人所妄加。”

[20] 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苏长公外纪》卷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璩之璞刻二十三年(1595)重修本。此文又见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4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参见璩之璞跋文,载《苏长公外纪》卷首目录后。

[22] 此语为翁方纲《东坡文谈录》提要眉注,参见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3] 如前文所及《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诗文评卷》《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等皆持此观点。

[24] 有学者认为,《学海类编》当非出自原题编者清初藏书家曹溶之手,应该是以清初陶越藏书为基础编纂而成,很可能是陶越原书流出后书贾增益并委托于曹溶。参见王媛《〈学海类编〉探论》,《国学研究》第38卷。

[25] 参见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6] 参见蔡镇楚《中国诗话史(修订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7] 王宜瑗《东坡文谈录》提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 三篇文章分载《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467页;《中国学术年刊》1998年3月期,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学术年刊》1999年3月期,台湾师范大学。

杜春雷,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苏轼廉政诗文点评二则

饶学刚

以乐害民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延庆为守，始^[1]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2]诸园，又吏因缘为奸^[3]，民大病之。

予始至，问民疾苦，遂首^[4]罢之。

万花会，本洛阳^[5]故事^[6]，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意^[7]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花^[8]，识者^[9]鄙^[10]之。此宫妾^[11]爱君之意^[12]也。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贡之^[13]。富彦国曰：“君谟乃为此耶？”

题解

哲宗元祐七年（1092），苏东坡知扬州，念念不忘为民请命，继杭州任后又抓治积欠，罢万花会。

时任扬州通判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为了欢迎老师，晁立马筹备万花会。为廉洁吏风，苏东坡立即劝阻，并写了《以乐害民》这篇笔记。如果说《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是借诗传播罢扬州万花会信息的话，那么本文《以乐害民》则是公示扬州万花会兴起、演变、流俗及“民大病之”的后果，也就是公示东坡为何一到扬州就罢万花会的缘由。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有“洛阳牡丹，扬州芍药”之称。哲宗元祐四年（1089）八月，蔡延庆来扬州做太守的第二年，就模仿洛阳牡丹花会，办了个动“用花十万余枝”的奢华芍药会。官吏奸商趁势敲诈勒索百姓钱财。

蔡延庆（1047～1126），名京，字元长，仙游

（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官至侍郎，是历史有名的“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之首。此时他和东坡平级——知郢州（今山东郢城）。元祐五年（1090）十月，王存接任知扬州，第二年也办了一期万花会。后果是扬州诸家芍药园残毁，恶吏勾结敲诈致“民大病之”。

扬州芍药万花会，源于模仿洛阳举办的牡丹万花会，后果是豪绅贵妇笑乐而万众穷民深受其害。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一家欢乐万家愁”作了披露：“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致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目皆花也。”通过赏花、赛花，谁家的花开得好，谁就能光宗耀祖，谁家能加官晋级。

所以历届太守很在意洛阳花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洛阳太守钱惟演，福建转运使蔡君谟。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北宋西昆体的主要诗人。吴越王钱俶（chù）之子。随父归宋，累官至枢密使、同平章事。钱惟演带头“置驿贡花”，被有识之士鄙笑。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就再现了原始场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籍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贡花给谁看的？自然是皇帝。而东坡说贡花也是给贵妇们看的：“钱惟演为洛守，始置驿贡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洛阳往东京进花，真是劳民伤财。

蔡君谟（1012～1067），名襄，字君谟，兴化

仙游(今属福建人)。宋代著名书法家,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齐名,并称“宋四家”。先后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出任开封、泉州、杭州知府。故人称蔡端明,卒后谥忠惠。

“庆历年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贡),被(皇上)旨仍岁(每年)贡之”(北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加法造小团茶的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所以遭到了富弼的质疑。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判官、推官、知制诰。辽重兵压境,富弼奉命出使辽朝,拒绝割地要求。三年,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时河北大水,流民南至京东,富弼动员所辖地方出粟救灾。至和二年(1055),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以母丧罢相。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1068)入觐,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后退居洛阳。元丰六年(1083)病死,年八十。今存《富郑公集》一卷。

注释

〔1〕 始:首次。

〔2〕 残:概指残旧、残缺、残败。

〔3〕 吏因缘为奸:恶吏以举办万花为由串通欺诈。

〔4〕 首:第一次。

〔5〕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丝绸之路”起始点(长安、洛阳)之一,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

〔6〕 故事:旧事,先例。

〔7〕 意:在意,留意,刻意。

〔8〕 贡花:充作贡品的花。

〔9〕 识者:有远见的人。

〔10〕 鄙:鄙视,鄙笑。

〔11〕 宫妾:宫女。

〔12〕 意:媚意。

〔13〕 贡之:进献方物给帝王。

点评

苏东坡是人,是一位富有仁爱的官员,是独具魅力的艺术家。他来扬州照例也应举办芍药万

花会。他不是不喜欢芍药花,而是要看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到什么地点去赏花。他刚到扬州任上,正值扬州各名园芍药盛开,赏悦之余,就作了《浣溪沙·扬州赏芍药樱桃》:“芍药樱桃两斗新。名园高会送芳辰。洛阳初夏广陵春。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他特别喜欢姹紫嫣红的芍药名品:红玉、菩萨面、丹砂、柳枝唇。

他罢万花会是因为万花会劳民伤财。名为与民同乐,实刮民脂民膏,“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何况他被百姓“积欠”案压得喘不过气来,哪有什么与民“同乐”的兴致可言;所以迫不及待地写诗、写文、写信扩大罢而有理的影响。在《与王定国书》中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煞风景,免造业(孽)也。”

在扬州只有半年,苏东坡的敢说敢做行为惊动上下。在一篇短短的笔记里,竟然直面社会人生,严厉批判了宋朝权贵们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批判了三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两任扬州太守蔡京,模仿洛阳“始作万花会”,是为了搞形象工程;洛阳太守钱惟演,“始置驿贡花”,是为了讨好皇帝皇妃;福建转运使蔡君谟,“始加法造小团茶”,挖空心事玩小技,是为了朝廷制造新贡种。一个“始”罢万花会者苏东坡,扫倒了三个劳民伤财的“始”作俑者蔡京、钱惟演、蔡君谟,可谓千古风流,无私无畏,痛快淋漓。

自苏东坡以后,扬州再也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芍药花会;但家家户户种花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后来扬州人将苏东坡奉为“五月芍药花神”。

苏东坡扬州罢万花会的做法,值得当今的执政者深思。

次韵^{〔1〕}苏伯固游蜀冈^{〔2〕},送李孝博^{〔3〕}奉使^{〔4〕}岭表^{〔5〕}

新苗未没鹤^{〔6〕},老叶^{〔7〕}方翳蝉^{〔8〕}。

绿渠^{〔9〕}浸麻水^{〔10〕},白板^{〔11〕}烧松烟。

笑窥^{〔12〕}有红颊^{〔13〕},醉卧皆华颠^{〔14〕}。

家家机杼^{〔15〕}鸣,树树梨枣悬^{〔16〕}。

野无佩^[17]犊子，府^[19]有骑鹤仙^[20]。
 观风^[21]峤南^[22]使，出相山东贤^[23]。
 渡江吊^[24]很石^[25]，过岭^[26]酌贪泉。
 与君^[27]步徙倚^[28]，望彼^[29]修连娟^[30]。
 愿及南枝^[32]谢，早随北雁^[33]翩。
 归来春酒^[34]熟，共看山樱然^[35]。

题解

哲宗元祐七年（1092）正月，苏东坡在颍州太守任。二月，接诰命改知扬州，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很快罢万花会。五月，苏东坡一奏再奏《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同年春，与故友苏伯固游蜀冈，伯固即美好大自然风光赋诗，苏东坡次其韵送李孝博奉使岭表。

苏伯固，名坚，字伯固，澧州澧阳人，他入仕后首先做临濮的主簿。神宗元丰七年（1084）冬，苏东坡赴汝途中，经九江至泗州，两人就会面过。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知杭州时，苏伯固迁为钱塘寺丞，被聘为“督开西湖”的总指挥，是苏东坡得力助手。两人友谊深厚，唱和颇多。

《次韵苏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诗，引出了东晋吴隐之拒贪史事令人深思。养成廉洁这一品质并非异事。廉洁的对立面是腐败，腐败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而滋生。历朝的腐败无不脱胎于自私、剥削、侵占、贪婪、贿赂、淫乱，造成人伦丧尽、贫富不均、分配不公，这是一切罪恶之根源，进而困扰着各个朝代政权的更迭。现代哲学家王亚南指出：中国古代官僚的生活就是贪污生活。又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尽管各朝代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无法逃脱兴亡周期率的轮回：从王朝初期狠抓反腐败斗争，到王朝中叶后反腐败制度渐渐松弛，变得有名无实，再到王朝后期便腐败盛行导致王朝灭亡，然后新王朝又从头开始一轮新的轮回。（《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

岭南贪泉，水净如镜，在广东南海县，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相传人饮其水起贪心，即是“廉士亦贪”。因此，车来马往的过路人，再怎么唇干舌燥，也只好望泉兴叹，没有一个敢妄自饮用的。但也有破例不信这个邪的。以操守清廉著

称的、东晋新升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贪泉时，酌而饮之，还放歌抒怀：“古人云此水，一歠（chuò读淖，‘饮’的意思）怀（招徕）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动摇，改变）心。”即使“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王琨传》）而吴隐之到了广州，在广州刺史这个肥缺上，始终保持清操廉洁，不占不贪，还贪泉以清白。任期满了后，他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与赴任时一样，依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晋书·良吏传·吴隐之》）更为可贵的是：吴隐之为官24年，直至去世，仍“清风肃然，老而弥笃”（吴隐之口述），成为一代有名的廉吏。

而今，苏伯固来扬州看望苏东坡，游蜀冈，赋诗；苏伯固离开时，又作送别词《生查子》（古别离送苏伯固），即著名的“三度别君来”词。蜀冈风景区的禅智寺（即“竹西寺、上方寺”），至今保留有苏东坡《次韵苏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诗手迹刻石，成为扬州的重要文物之一，成为世代官员治政的一面镜子。

注释

〔1〕 次韵：参见《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注〔1〕。

〔2〕 蜀冈：地名。传说，从前，峰上寺里一位老僧游历到四川峨眉山，途中不慎将僧钵落入水中，却被峰上的小和尚在寺中打水时得到。探根求源，原来这山冈竟是蜀中群山的余脉，从此就定名为“蜀冈”。而今，蜀冈西峰森林公园成为扬州城的轴心，真够雄壮美丽。

〔3〕 李孝博：字叔升，山东人。时任山阳（河南省怀庆府，今沁阳市）太守，以治行高第，即拜广东提点刑狱。

〔4〕 奉使：奉命出使。诗中指李孝博出使广东提点刑狱（掌刑狱的官）。

〔5〕 岭表：一作岭海，即岭南、两广之地。北有五岭，南有南海，故称岭海。

〔6〕 没鹤：潜游水中的白鹤。

〔7〕 方：刚刚。

〔8〕 翳蝉：羽毛漂亮的知了。

〔9〕 绿渠：绿色的水渠。

〔10〕 麻水：带细纹的水。

〔11〕 白板：木板。

〔12〕 笑窥：偷偷笑的。笑：喻少女。

〔13〕 红颊：红脸。

〔14〕 华颠：白头，指年老。

〔15〕 机杼：织布机。

〔16〕 悬：垂吊。

〔17〕 佩：环绕，围绕。

〔18〕 犊子：小牛。

〔19〕 府：指扬州府。

〔20〕 骑鹤仙：指苏东坡。〔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次公曰：先生为扬州，故以骑鹤为言。

〔21〕 观风：观民风。

〔22〕 峤南：岭南。

〔23〕 “出相山东贤”句：山东的相家贤才。〔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次公曰：李孝博，山东人，而又相家子，故云“出相山东贤”。

〔24〕 吊：凭吊。

〔25〕 很石：石名。在江苏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前。苏东坡《甘露寺》诗序：“寺有石如羊，相传谓之很石，云诸葛亮明坐其上与孙仲谋论曹公也。”这里代指古之圣贤。

〔26〕 岭：大庾岭。又名东峤、梅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向为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

〔27〕 君：指李孝博。

〔28〕 徙倚：从容，不慌忙。

〔29〕 彼：您，指李孝博。

〔30〕 修：修长，引伸为身材。

〔31〕 连娟：纤弱，苗条。

〔32〕 南枝：梅花。〔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次公曰：“南枝，梅也。”

〔33〕 北雁：到南方去过冬的雁儿。

〔34〕 春酒：冬酿春熟之酒。苏东坡《武昌西山》诗：“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

〔35〕 “共看山樱然”句：如共同欣赏山樱花那样。山樱：山中樱桃花。夏四、五月间开花，花白色或略带红色。〔宋〕林逋《山中寒食》：气象才过一百五，且持春酒养衰年。中林不是不禁火，其奈山樱发欲然。

点评

苏东坡次韵诗，一开头就写春天的山显水露的蜀冈。喜水的白鹤未觉春深，美羽的知了才知叶老。绿水透着波纹，农舍燃着村烟。爱偷笑的女孩有红颊，喜醉睡的老人皆白头。家家欢唱的织布机，树树悬挂着梨和枣。山外没有野小牛的干扰，倒是府上有仙人祈祷。在这样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人面桃花、丰衣足食的桃源蜀冈前送友出使，怎么不叫人纵情山水，心旷神怡，放心出使？

诗中“酌贪泉”故事启示我们：广州刺史吴隐之饮贪泉而不贪，如同贪官饮廉泉而不廉一样，

可见造物主决定不了泉之贪、廉，更主宰不了官之清、污。泉之贪、廉，官之清、污，关键在于外界事物的侵袭，而在于个人的抗贪拒腐的修养和意志力。是伯夷叔齐也好，还是吴隐之也好，他们不忘先贤廉洁遗训，坚持清廉“不易心”：一颗善良的心、清廉的心、正直的心；即使饮了贪泉水也不会改变清廉名节的。吴隐之所以有胆识敢饮贪泉，是因为他面对贪泉无贪欲，抗腐拒贪，洁身自好。贪，并非泉的本性，更非人的本性。

“不贪为我宝，安步当君车。”（《无题》）从这点看来，“常到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俗话，应当从我们的口语词典中删除出去。

佩服苏东坡以担当“观风”重任出使广州刺史吴隐之“酌贪泉”的美谈，作为送李孝博出使广州的箴言，真是匠心独运，可谓神词妙笔。其用意明显是借“泉”发挥，提醒友人和后人学习吴隐之的戒贪精神：“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六事廉为本赋》），清醒做人，清廉做官。

正因如此，所以苏东坡对李孝博出使的结局，方作出如此美好的预示：愿与君从容步入仕途，愿君身心健康；愿君等到梅花谢时随着北雁南归。君回来有春酒迎接，还可以共享满山怒放的樱花。正道是：

“莫愁前路无知己”（高适《别董大二首》），
“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饶学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理事。

《苏轼十讲》前言

朱 刚

《苏轼十讲》精心选择十个专题，用以全面展示苏轼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传奇一生，深入阐述其深邃的人生思考、多彩的文化性格、高尚的政治情操和并世无匹的文学创作，内容丰富、新见迭出。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将作者多年治苏的学术心得，用清丽流畅的语言娓娓道出，既能满足大众读者对深度阅读的期望，其新观点、新视野又能获得专业研究者的印可和省思，以普及读物而优入学术著作之林。

——王水照(复旦大学教授，宋代文学专家)

苏轼是宋文化的代表人物，人生曲折，成就涉众多领域，且皆博综多元，傲视千年，说清不易。本书撷取其一生最重要的十个片段，结合史事与作品，作深入浅出的阐发，传达学界最新见解，允为近年来难得的苏轼新传。

——陈尚君(复旦大学教授，唐宋文学与文献学专家)

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称他为中国人“灵魂工程师”，决不过分。

——朱刚(复旦大学教授)

我于1991年起，随陈允吉先生治唐代文学，1994年转入王水照先生门下治宋代文学，故为博士学位论文选择研究对象时，考虑贯联唐宋，而以“唐宋八大家”的思想与创作为题。后因能力所限，缩小范围，只取韩柳欧苏四家，此“苏”即专指苏轼。毕业以后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正好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主事者来征求《苏轼评传》的撰稿人，遂与王先生一起承担了该书的写作任务。集中精力治苏，盖始于此时。2004年该书出版后，又逢复旦中文系设置专人专书的“精读”类课程，故请得“苏轼精读”一门授之，迄今已十有余年了。

因为是“思想家评传”的一种，《苏轼评传》

的写作方式跟一般文学家传记有所不同，简单记叙生平以外，主要探讨传主的哲学、史学、政治、文学等诸方面的思想，其诗词文作品大都被拆成了零碎的片段，引为论述的依据。但“精读”课程与此大异，解析完整的作品是主要内容，故我大体按照苏轼生平，联系时事，括出十个专题，聚集有关作品，加以讲析。我所备的讲稿，起初比较简单，逐年修订增益，居然也便成帙。有听者以为可出版面世，感其厚意，用了一个暑假疏通文句，交付编辑，名为《苏轼十讲》。其中有些部分，与我近年发表的论文近似，这是因为我先在课堂上讲述新得，听取一些意见后，再写成论文，拿去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听取专家意见再加以修改，然后发表于各类书刊。所以，对提供了意见的同学和专家，我都要表示感谢。不过既是论文，也未免拆碎苏轼的作品，摘引其中信息量较大的语句。而本书作为讲稿，其特征首先就在于，我尽量使每一讲都包含一组完整的作品，在讲析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再引申至其他方面。按编辑的建议，这些作品在书中都用加黑的字体显示，并注明出处。无论对于听讲的学生，还是选购此书的读者，我都希望自己所起的最大作用，是帮助您读懂这些作品。

本书出版之际，又蒙王水照先生和陈尚君先生检读书稿，赐下推荐之语，这是尤其要诚挚感谢的。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编辑王焙尧女士，没有她的辛勤工作，就没有这本书。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选自朱刚著《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第1版。

熊朝东《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读后

方永江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新时代青年，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此际，我正在阅读熊朝东先生的《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书中徐徐展现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语）的精彩人生，正与总书记的殷切期望高度契合，亲切敬佩油然而生。

读朝东书，可知在宋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用人机制也较灵活。除了科举取士外，还有推荐制，只要是人才，经朝廷重臣举荐，亦可入仕为官。为了求得他人举荐，苏洵连续不断地写出一封封求见信，向人毛遂自荐。按常理，求人办事，须得态度谦卑，言语恭顺，博人欢心，可苏洵不是，他的求见信写得很另类。信中全无低三下四、阿谀乞怜之语，而是以展示其才华学识博取认可，求官求得光明磊落，独具风骨。对于苏洵的这个态度，清代学者储欣赞叹为：“向宰相求官，不放倒自己一句。”

好一个不放倒自己！以此观“奋厉当世忠诚有为，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苏轼最为适宜。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读书明理，学史明志，做事先学做人。正是程夫人的言传身教，孕育了苏轼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和勇于担当、不放倒自己的风骨节概。此后漫长的人生中，尊法重教的社会环境，孝慈仁爱的家风传承，满满正能量的朋友圈，助推苏轼飞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苏轼晚年遇赦北归，途经金山寺，看到了当年再莅杭州时大画家李公麟为他所作的画像。画像上的自己，飘逸潇洒，风流豪放，栩栩如生；

而眼前的自己，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恍如隔世。苏轼凝泪成霜，悲痛欲绝，凄然自题：“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欲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诙谐调侃笔触下掩藏着多么深重的愤愤不平 and 人生惨烈啊！苏堤春晓波光潋滟，徐州抗洪，黄楼巍然，密州出猎力克边险，登州榷盐遗爱千年，都不说了，就让我们捉置其在命运遭际困厄磨难无以复加的黄州、惠州、儋州二三事去触摸一下苏轼不放倒自己的硬骨头。

元丰三年（1080）三月，居无定所、贫病交加的苏轼，听说鄂黄民间有一对夫妻只养二男一女，过此数则将初出婴儿放入盆中溺死的恶俗，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奋笔疾书鄂州太守朱寿昌，恳请他出面革除这种陋习。苏轼还给老朋友开具了处置良方：大义凛然的法律依据、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含仁怀义的有效监督、亲仁善邻的互帮互助。苏轼还把西晋王濬的善举和自己在密州收养弃婴的经验告诉了朱寿昌，目的就是要他断然出手施仁布泽。同时，自己也在黄州积极行动起来，联合一帮宅心仁厚的人成立了“育儿会”，布衣蔬食、随僧一餐也捐钱十千。仁心仁术、仁至义尽，自然仁者能仁、求仁得仁。活人无数，苏轼视为谪居黄州的一大乐事，喜作《黄鄂之风》：

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闻之不忍。会故人朱寿昌康叔守鄂州，乃以书遗之，俾立赏罚以变此风。黄之士古耕道，虽椎鲁无它长，然颇诚实，喜为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岁出十千，如愿过此者，亦听，使耕道掌之。多买米布绢絮，使安国寺僧继连书其出入。访闾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辄少遗之。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

苏轼作陂种稻、身耕妻蚕的时候，童年好友

巢谷千里来访。一天，巢谷说起秘方圣散子治疗伤寒极为灵验一事，苏轼惊叹之余恳请传授，以防来日不虞。此方巢谷是连亲生儿子也不传授的，见老友苦苦相求、个中又颇有心得，在反复叮嘱不能外传，并指江水为盟后，方始传授。时隔不久，巢谷与苏轼依依惜别于雪堂，回到眉山。

事有凑巧，鄂黄两地突发伤寒瘟疫，苏轼用圣散子救治百姓，活人无数。为了使圣方发挥更大作用，苏轼违背盟誓，将之传给当地名医庞安常，以期有益于后世。为使巢谷之名与圣方不朽，苏轼又特意作序一篇，其中云：

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

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居惠州。谪居的日子虽然相当艰苦，苏轼却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而他想的是这里的百姓。早在他赴惠州贬所途中，过太和县时，就向致仕的曾安止传授他在定州设计制作的先进生产农具“秧马”。并特意作《秧马歌并引》加以广泛传播推广使用：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到惠州贬所后，苏轼又向当地官员和农民介绍推广这种先进的插秧工具。苏轼谪居惠州，奇在惠州亦有西湖（由南湖、丰湖、平湖、鳄湖、菱湖组成）。更奇的是作为无职无权、被严密监视的“罪官”苏轼，却把惠州西湖治理得如同杭州西湖。

为了凑足修桥治湖钱款，苏轼带头募捐，将皇帝赐予自己的犀带捐出，还动员弟媳史氏捐出朝廷所赐黄金。苏轼的倡议得到惠州各界人士支

持响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苏轼的建议下，由栖禅寺主持希固和尚任总管，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负责工程。于是，绍圣二年（1095）十月，由苏轼提出的“两桥一堤”工程同时开工实施。而惠州西湖的治理与东新桥的修建乃苏轼亲自主持，除了治湖利农一面外，在景观布局上，苏轼仍十分考究，一道长堤从西村至孤山把湖面划为两片，湖水清波荡漾，百舸争游，往来穿梭于堤孔；沿堤种植花草垂柳，远看犹如贴水彩虹，色彩纷呈，与当年修长的杭州西湖之堤可媲美，此堤亦被惠州百姓命名为“苏公堤”。其堤上所修之桥命名为西新桥，使西湖更为壮观。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惠州有史以来的两座大桥落成，分别取名为东新桥和西新桥。新桥落成，百姓为此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杀鸡庆贺。苏轼万分激动，赋诗以记（《西新桥》）：

父老喜云集，簞壶无空携。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三州中的儋州，是苏轼笔下“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之地，此情此景多少人不死必倒！而苏轼呢？

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苏轼登上远离大陆的孤岛，踏入原始生态般的椰树丛林。用苏轼的话说，这里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几乎什么都没有。更苦的是昌化军气候炎热潮湿，很容易生病，吃的就不用说了，米贵如珠，只能顿顿吃芋头。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苏轼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笑谈人生苦雨腥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又以“吾生何处不安生”的心态，让自己的生命在精神超迈平和中得以延伸，从暗淡中寻找生活的亮点，从苦日子中寻找甜美。苏轼要延长自己的生命，不为别的，只为能给儋耳百姓做一点好事。苏轼初到儋耳时，便发现这里学舍荒芜，学风甚弱。儋州教育的落后令苏轼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决定开办学堂，传播中原文化，教化一方。但是，当地百姓却对苏轼办学不感兴趣，热情不高。苏轼经过了解，得知海南从未出过读书人，原因是百姓认为沧海把大陆与海南岛一分为二，截断了地脉。为了消除他们的迷信思想，苏轼走村串户做思想工作，讲解学习文化知识与风水地脉毫无关系的道理，使百姓们都踊跃向学。

（下转第75页）

《十年史料汇编》后记

刘清泉

2020年9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计划开展系列庆祝活动，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如期开展。经积极争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编辑出版《十年史料汇编》和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评选颁奖，得到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被纳入第四届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第六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之中同时举行。

40年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全国苏轼遗址地的党委、政府，以及高等学校联合主办学术或者纪念活动40多次。其中挂届的苏轼学术会议23次，推迟举办1次，依次在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河南平顶山、浙江杭州、陕西凤翔、山东烟台、海南儋州、四川眉山、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河北栾城、四川眉山、河南郑县、江苏江阴、江苏徐州、江苏常州、乐山师范学院、西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平顶山学院、海南大学、江苏理工学院，原定于2020年3月下旬在徐州举行的“全国第24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因新冠疫情原因推迟到2021年3月下旬举办。另外，2009年4月，举办了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举办了全国首届苏辙学术研讨会等。

会员点校、笺注、注释的苏轼作品全集、选集约百种，如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王水照的《苏轼选集》，刘乃昌的《苏轼选集》，曾枣庄的《三苏选集》等。

会员撰写的苏轼研究专著约百种，如曾枣庄的《苏轼研究史》、王水照的《苏轼论稿》、刘乃昌的《苏轼文学论集》、朱靖华的《苏轼新论》、木斋的《苏轼诗歌研究》、唐玲玲的《东坡乐府

研究》、杨胜宽的《苏轼人格研究》、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潘殊闲的《叶梦得与苏轼》等。

围绕中心，服务地方，应用性研究得到加强，相继出版了《三苏文化与眉山现代化》《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苏轼为官之道》《东坡西湖研究》等专著。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迁至眉山和成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为契机，相继召开了全国首届苏洵、苏辙学术研讨会，出版《苏洵研究》《苏辙研究》。同时，三苏文化普及活动得到加强，举办端午、中秋沙龙活动10余次，举办东坡文化讲师团培训讲座10余次、研学4次，培训骨干60人。出版《苏轼诗词写意》《苏轼“立人”》《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三苏教育名篇注评》等普及读本10余种。

会员撰写的苏轼传记年谱等约百种，如曾枣庄的《苏轼评传》《三苏评传》、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三苏年谱》、王水照的《苏轼》、颜中其的《苏东坡轶事汇编》、熊朝东的《苏东坡》、康震的《康震评说苏东坡》、刘小川的《苏东坡》（传记小说）、冷成金的《苏东坡》（电视剧）、宋明刚主编《苏轼全传》（15册）等。

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影响下，苏轼遗址地相继成立的苏轼学会有：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1998.8）、栾城苏氏文化研究会（1998）、江阴市苏东坡学术研究会（2001.12）、郑县苏轼研究会（2002.8）、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2002.10）、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08.3）、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09.12）、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10.1）、定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10.12）、中国苏东坡文化艺术研究会（2010年香港注册）、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13.4）、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2013）、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

会(2014.11)、广东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2017.1)、海南省苏学研究会(2018.12)等。高等学校或者地方政府相继成立的三苏文化研究机构有:乐山师范学院三苏文化研究室(1999)、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2007)、平顶山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2009)、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2011)、四川工商学院三苏文化研究所(2017)等。

相继创办的期刊有:《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的“三苏研究”专栏(2000年创办)、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的《三苏祠》(2002年创刊、2004年停办、2008年复刊)、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主办的《苏学通讯》(2002年创刊)、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超然台》(2003年创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苏轼研究》

(2004年创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的《苏轼研究》(2005年创刊)、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放鹤亭》(2009年创刊)、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的《东坡文化研究》(2010年创刊)、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载酒堂》(2010年创刊)、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的《苏学研究》(2018年创刊)、郾县苏轼研究会主办的《三苏》(2019年创刊)等。

2010年,学会成立30年之际,为了编辑《三十年回顾》,我多方搜罗相关史料,但有些湮没于时间长河的资料,难以寻觅,不免有遗珠之憾。如今,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编辑《十年史料汇编》,却独具近水楼台,手头的第一手资料相对齐全。因为十年来,我从事学会会刊《苏轼研究》编辑,且具体负责学会秘书处日常工作,所需史料皆可从《苏轼研究》杂志、秘书处档案获得。即便如此,这些资料搜集、整理,也花费了半年多时间,之后的编辑、校对,又占用了大量时间。好在这些史料,比较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学会工作,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有重要的研究、借鉴价值。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十年史料汇编》(2010—2020年)分为上下两册,包括学术活动、学会发展、苏学专家和新书序评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大致以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学术活动包括第七届理事会(2010/08—2015/10)、第八届理事会(2015/10—2020/09)的工作,分别以年度为单位分类编排,每一年度之前设置工作大事记,之后设置相关资料附录;学会发展包括会员发展、理事变动和会刊编辑等内容;苏学专家、

新书序评两部分,则按照会刊《苏轼研究》刊载相关内容的顺序编排。

《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是学会在四川省首批十大历史名人工程推进会上的经验交流,后经作者修改、完善,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苏轼研究》(第十一辑)。三苏故里眉山,被中共四川省委,赋予建设开放发展示范市的重任。《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梳理既往、观照当下、属意未来,客观反映了学会在建设开放发展示范市中敢为人先、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生动局面,也是苏轼精神的生动体现,展示了学会十年发展不寻常的精神风貌,故作为代序刊于之前。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同仁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刘清泉于三苏故里

2020年8月18日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书名: 十年史料汇编(2010—2020年)

编辑: 刘清泉

出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2020年9月

内印: 眉新出内 2020-28号

开本: 176×250mm

字数: 560千字

页码: 594页

第一章 “经纶不究于生前”（二）

曾枣庄

少年时代的苏轼兄弟朝夕相处，苏辙对兄十分崇敬。他在《武昌九曲亭记》（卷24）中回忆少年苏轼说：“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这大概是最早以仙比喻苏轼吧。以后苏轼竟取得了坡仙的雅号，宋李之仪《东坡先生赞》（《姑溪居士文集》卷12，粤雅堂丛书本）云：“东坡仙人，岷峨异禀”；陈造《题韵类坡诗》（《江湖长翁文集》，四库全书本）云：“东坡仙伯之文，韩、欧伯仲”；明李贽选有《坡仙集》16卷；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本）云：“诗至天趣，亦难言矣。求之古人，其唯谪仙、坡仙乎！”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栾城后集》卷20）回忆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又《再祭亡兄端明文》（同上）说：“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又《题东坡遗墨卷后》（《栾城第三集》卷2）说：“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苏辙大量的诗、文，都记录、评论了苏轼的志向、才气和他们兄弟间的深厚情谊。

苏轼从小得到老师、长辈的一致好评，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卷10）中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了，则已私识之矣。”叶寅《爱日斋丛钞》卷4（四库全书本）说：“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

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时尚幼。微之赋《鹭鸶诗》，末云：‘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坡从旁曰：先生诗佳矣，窃疑断章无归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刘微之曰：‘吾非若师也。’又云：“巨不第，郡三公以遗逸举，不应，乡人呼为孝廉。其卒，范镇悼以诗，有‘案头曾立两贤良’之句。”“两贤良”即指苏轼兄弟。

称美表彰苏轼的长辈有知益州张方平。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祖籍宋州，后徙扬州。知益州时，访知苏洵，并推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但朝廷迟迟未作答复。他于是对苏洵说：“远方不足成君名，盖游京师乎？”恰好嘉祐元年（1056）诏礼部贡举，苏洵接受了张方平的建议，决定送二子入京应试。苏洵父子三人离家到成都与张方平告别，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卷10）中说：“轼年二十，以诸生谒公成都，一见，待以国士。”苏辙在《追和张公安道赠别》（《栾城第三集》卷1）诗叙里也说：“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苏轼兄弟向张方平呈交了自己的文章，张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初君（苏洵）将游京师，过益州与仆别，且见其二子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以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驎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遂以就举。一上皆登进士第。再举制策，并入高等。今则皆为国士。”^[1]据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说郛本）载，张方平安排苏轼父子住于斋舍，第二天出了六道题来考苏轼兄弟，自己则于壁间密窥之。苏轼兄弟得题后，各自专心思考。苏辙对题目有疑，指以示轼。苏轼不言，只是举笔倒敲几案，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指第二题示轼。苏轼却勾去了第二题，并开始答卷。二人完卷后，出来交与张方平。张方平非常高兴，因为第二题本无出处，是他故意用来考察苏轼兄弟的判断力的。张方平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

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就政治地位而言，张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苏辙的官位高于苏轼。

第二位称美苏轼的长辈当推欧阳修。张方平修书向欧阳修推荐三苏，明李一公说：“（欧）文忠时在翰林，得明允、子瞻、子由著作，喜安道所荐得人，因谢安道曰：‘后来文章当属此人矣！’”^[2]嘉祐二年（1057）举行礼部考试，宋仁宗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负责编排详定等具体事务，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读到苏轼的文章，觉得“有孟轲之风”，把它转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惊喜以为异人”。本拟取为第一名，疑是门人曾巩所为，乃置第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的应试文章笔力豪骋，杜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语，欧、梅皆不知出自何书，问苏轼，轼答曰见《三国志·孔融传》注。欧查《三国志》，无此语，又问苏轼，轼回答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曹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惊问见于何经，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苏轼说，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3]欧阳修喜得苏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4]他在《与焦殿丞千之》（卷150）说：“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其《举苏轼应制科状》（卷112）云：“新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为什么欧阳修等人这样赏识苏轼呢？除了他的应试文章的思想内容符合欧阳修等人的政治主张外，还因为他的文风也正符合欧阳修等人所大力提倡的诗文革新要求。苏轼在《上梅龙图书》（卷49）中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以“无所藻饰”之文矫正“浮剽之文”，这正是当时诗文革新的需要。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由于他对三苏父子的称许、推崇，苏氏文章很快在京城乃至全国流传开来，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人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卷34）云：“（苏洵）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

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自来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曾巩《苏明允哀词》云：“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5]又《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卷43）云：“洵果奋发力学，与其子轼、辙皆以文学名天下”；梅尧臣作《送曾子固苏轼》诗赠二人云：“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6]又作《题老人泉寄苏明允》（卷8）称美苏轼兄弟为“雏凤凰”：“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言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方今天子圣，无滞彼泉旁。”

仁宗看了苏轼兄弟应试文章曾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7]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仁宗嘉祐六年（1061）赴凤翔签判任，至英宗治平二年（1064）还朝判官告院。英宗未继位时，就听说苏轼的文名，因此想召苏轼入翰林知制诰（掌起草诏令）。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这句话充分表明英宗也像仁宗一样，对苏轼很器重。

注释

- [1] 《乐全先生文集》卷39，四库全书本。
- [2] 李一公《东坡密语》卷16《志林》，明刻本。
- [3] 杨万里《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
- [4] 《欧阳文忠公集·书简》卷6，四部丛刊初编本。
- [5] 《元丰类稿》卷41，198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 [6]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 [7] 《宋史》卷338《苏轼传》，元脱脱等《宋史》，1977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曾枣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

张炜的东坡情缘

刘川眉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

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语、日语、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俄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越南语、波兰语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爱约堡密史》《我的原野盛宴》等获多种奖项。

202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张炜的新作《斑斓志》。

这是一部关于苏东坡的讲座集成。张炜以数十年深研之功，兼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思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陈言俗见，直面东坡文本。全书分七讲并一百二十余题，每题必有独见，每见必得服人，呈显出作家独有的思想深度与文章才情。

为什么要讲苏东坡？要写苏东坡？张炜如是回答：“有关苏轼的文字太多了。现当代这方面的文字，从林语堂的那本传记出来以后，苏东坡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他，包括学术上的大致走向，也就在某个层面上形成了。苏东坡作为一个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是相当固化的。当然，许多出色的苏东坡研究也出现了。我不是，也不想写一部苏东坡的传记文字，更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字。一个当代写作者对一个古代写作者的全面接触，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及其他，都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读作品最终还是读人，苏东坡的全部文字都通向了这个人。”

书名为何叫《斑斓志》？张炜解释道：“这是

其中一章的题目而已。‘斑斓’这个比喻其实很直接，因为苏东坡的人生，比其他诗人更加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特征。他和一般人的确是大不一样的。看看他一生做下的事情、达到的水准、踏入的方向，都会有这样的感叹。这个人的确太丰富太有趣了，绝不贫瘠。有的诗人或艺术家，或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很专注很深入，但就多彩多姿这一点来说，还远不足以使用‘斑斓’二字。有人可能觉得这个词用到其他人身上也勉强可以；不，用到苏东坡身上才最为贴切。”

身为作家，张炜写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阅读。自然，包括对苏东坡的阅读和关注。张炜非常喜爱苏东坡，但这种爱，并非满足于古今流传的关于东坡的通俗故事，或是人见人爱的所谓“旷达乐观”的性情之类。爱苏东坡，就要懂得苏东坡。而要真正懂得苏东坡，张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阅读苏东坡，读他所有的文字。”他要求自己“除去他人无数的描述和研究之外，我还要将其诗词及策论诏诰等公文全部读过。”他感叹：“真正进入（东坡）浩瀚的作品才发现，以前自己有关诗人的印象与认知是多么肤浅，他对我而言基本上算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张炜不仅阅读了东坡大量的文字，同时对东坡的遗迹遗址也饶有兴趣，光东坡老家眉山，他就曾两次造访。

2008年9月，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研讨会在眉山召开，张炜来了。他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小说界》主编魏心宏之约，专程来参加小川的研讨会的。研讨之余，除为眉山文艺界做了一场传统文化讲座外，还专门拜谒了苏东坡的故居三苏祠。

2011年8月，张炜450万字的巨著《你在高原》荣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12月25日，张炜又一次来到眉山。在远景楼上，张炜侃侃而谈，谈写作、谈人生、谈环境、谈苏东坡……望着楼下的东坡湖和对岸的东坡岛，张炜道：“眉山城市

不大，人口也不多，满城青绿，有一条清澈的岷江和一汪美丽的东坡湖，更有一个苏东坡，这是一座有文化底蕴又令人心旷神怡的城市，是很多城市无法比拟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陪张炜来到三苏祠，这是张炜第二次走进苏东坡的故居。他说，每到一次三苏祠，他的“武艺”就要增长许多。在三苏祠，张炜一边认真听导游解说，一边看得非常仔细。在苏宅古井前，张炜俯下身察看良久，似乎想要寻觅东坡当年的身影，还兴致勃勃地与同行合影留念。在东园的明代东坡盘陀画像碑前，端详着碑上据说是东坡的真面容时，他道：古人真是高明，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且非常有个性，有特点。今天的人们往往把圣贤面孔塑造成千篇一律的英雄形象，使其失去了个性，结果适得其反。末了，三苏祠负责人请他题词，他欣然捉笔，题了“三苏纪念馆”五个大字，而三苏祠则回赠给他一幅蜀绣张大千的《东坡笠屐图》。

下午，在岷江东湖饭店宏图府，张炜作了题为《数字时代与东坡文化》的演讲。张炜不仅非常能写，而且非常能讲。历时两个钟头的演讲，张炜始终面带微笑，话语如清泉出山一样从容自然，又如珠落玉盘一般脆响悦耳，不时博得全场由衷的掌声。

令我没想到的是，离开眉山仅八年，张炜便向网络时代的东坡迷们捧出了一道诗与思的盛宴《斑斓志》。

书中有不少独特视角下的振聋发聩，有不少独辟蹊径中的深思别悟，有不少独树一帜的真知灼见。

比如，论说东坡的政治立场：“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一个求真派和务实派。”

比如，对东坡“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句话，他别解道：“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比如，对一些业已固化的套语，他认为：“苏东坡哪里仅仅是什么有趣和好玩？又哪里仅仅是什么有才和乐天派？他经历的爱欲洗礼，他在苦海里的浸泡，他的韧顽和软弱，我们作为读者还需做好全面接受准备。”

毫不夸张地说，《斑斓志》对苏东坡的解读，调动了张炜丰富的生命阅历和体验，他站在人性和诗思的高度，从各个层面观照苏东坡，真正是

一次接通千载的幽思，一次打通古今的有益尝试。

2020年10月28日于眉山东坡湖畔

刘川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接第67页）

苏轼便在桃柳庵里开始传播中原文化，“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说，苏轼居儋三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又《琼台记事录》载：“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其中有个叫姜唐佐的学生，最具代表性。据《舆地广记》载：“姜唐佐，字君弼，琼山人。苏轼贬儋耳，唐佐从之游，轼尝称之。黄门（苏辙）曰：‘不谓海南有此佳士。’”苏轼在《书柳子厚诗后》亦说：“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姜唐佐聪明好学，刻苦勤奋，苏轼特别喜欢他，题赠一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说，如果他以后中了榜，再把诗补全。姜唐佐来到已从循州移居汝南的苏辙处，展示其题诗，苏辙“览之流涕”，对姜唐佐说：“先生九泉之下为你中举定感欣慰，让我代兄长为你续完这首诗吧！”随即提笔写道（《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生活狼狈不堪的苏轼，把自己活成了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熊朝东先生治苏学十数年，出版了有关三苏文化的著作十余种，每有新作都要送我一本。我首先为他沉浸苏海收获新成果而高兴，继则又为他贡献新惊喜而感激。读此书亦如是。

方永江，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

我的邻居苏东坡

刘小川

眉山地处成都平原的南端。苏洵说：“古人居之富者众。”两宋三百余年，仅一个眉山县就出了 909 个进士，高居全国州县之首，这是成都（当时叫益州）不能比的。苏东坡考进士乃是事实上的状元，制科殿试又拿了百年第一，所以我称他是宋代唯一的“双料状元”。这个状元后来干了很多大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时候我不知道苏东坡厉害，他的家和我的家相隔一百多米。他的家八十几亩地，我的家二十几平方米。他一天到晚坐在大殿里，看上去委实有些阴森森哩，大殿外还有一口苏家的井。那井水我喝了不少，甜丝丝的，凉浸浸的。井边一棵光秃秃的千年黄荆树，据说苏洵用黄荆条打得小苏轼双脚跳。我是眉山下西街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费头子（孩子王），但凡听到苏东坡挨打，就乐得咯咯笑。苏东坡也属于下西街嘛，论板眼儿（戏耍花样）肯定不如我。他挨打的次数也不如我，差远了。当时我在城关一小上学，课余练武功正起劲，崇拜豹子头林冲，认为区区苏东坡不值一提。林冲雪夜上梁山，苏东坡连峨眉山都没爬过。武松醉打蒋门神，苏东坡在乌台监狱里挨几下就痛得遭不住，真是不经打。他酒量差，当然我的酒量也不行。他下棋不行，我下棋还可以。他下河游泳一般般，我九岁那年就横渡了岷江，弄潮拍浪一千五百多米，浪高一尺啊。他在书房南轩看书，摇头晃脑念子曰诗云；我家没书房，我在后院的柚子树的树杈上躺着看书，看了

四大古典名著，看了《铁道游击队》，看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莎士比亚……

从小学到高中，我跟那个名叫苏东坡的人较劲。

每当爸爸找不到我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到三苏公园去看看。哦，妈妈。现在是 2020 年的深秋了，妈妈在哪儿？

三苏公园啊，下西街文化馆，工农兵球场，电影院，招待所，我何止去过三千回。一年四季，同学们伙起，一个个勾肩搭背东耍西耍，淋坝坝雨，淋阵雨、偏东雨，享受大风中的那种近乎窒息的感觉。爬高高树，跳高高墙，比高高尿，呆望永远神秘的高高的夜空。男孩子打架，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嘛，打出了友谊，也打宽了雄性渠道，学校哪有小鲜肉的市场？通通靠边站。话说硬汉海明威，倒提小鲜肉扔进了汪洋大海。我在说什么呢？说灵动，身心的灵动。

苏东坡小时候是个“三好”学生：好吃、好玩、好学。他的母亲程夫人，他的乳娘任采莲，平日里做菜变着花样，苏东坡就成了好吃嘴，后来自创了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他又把眉山的美食带到江浙一带。我吃上海、杭州的东坡肘子，觉得还是眉山的好。四川人都好吃，川菜很精细，单是肉丝肉片就有十几种。苏东坡出息了，出川做了大官，牛羊鱼吃得多，猪肉吃得少。四十多岁贬到黄州后，他开始研究猪肉，写下打油诗《猪肉颂》。

他对水果也有研究，在汴京南园栽石榴树，在江苏宜兴栽橘树三百本，在广东惠州尝试栽

荔枝、桂圆。他写诗给堂弟说：“忆昔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我抓住这两句，发现少年苏轼的狂走。他上树上房摘别人家的梨子板栗么？杜甫诗云：“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八月庭前梨枣熟，一日上树有千回。”

当年我在三苏公园里游荡，惦记着人道是苏东坡栽下的荔枝树，丹荔挂满了枝头，一颗颗的馋人。嗖嗖嗖上树去也，拨开交叉的绿叶，摘了丹荔，剥了皮，一个劲儿往嘴里塞。眉山人叫作吃得包嘴儿包嘴儿。要赶紧的，要眼观八方耳听六路，防着公园的干部或园丁。那一年的夏天，那个爽啊，树干上爽歪歪，吃了很久很久，剥了很多很多：大约三十三颗饱满欲滴的红荔枝。左右枝头吃光了，再往上爬，寻思摘它一书包，夜里占营时分给下西街的小伙伴们。忽然间，头皮顶了一团软软的东西，我心里叫声不好，撞上了吓人的野蜂窝。一群细腰蜂在头项上散开，摆出攻击的扇形，这扇形我见过的。野孩子到处野，天上都是脚板印。刹那间我纵身跃下五米高的大柚子树，细腰蜂群闻风而动，嗡嗡嗡倒栽下来，有几只直扑我的寸头。大约五六只细腰蜂同时攻击我，头皮痛麻木了，旋即肿了半厘米，像戴了一顶不想戴的皮帽子。我落下地发足狂奔，奔向三百米外的无限温暖的家……妈妈用邻居送来的乳汁揉我的头皮，揉了好久。

街灯初亮时，我又满大街疯去了。第二天晚上疯完了，照例往井台边一站，倒提满满的一桶井水，哗啦啦冲凉。20世纪70年代的男孩子，在挫折中茁壮成长。

苏东坡诗云：“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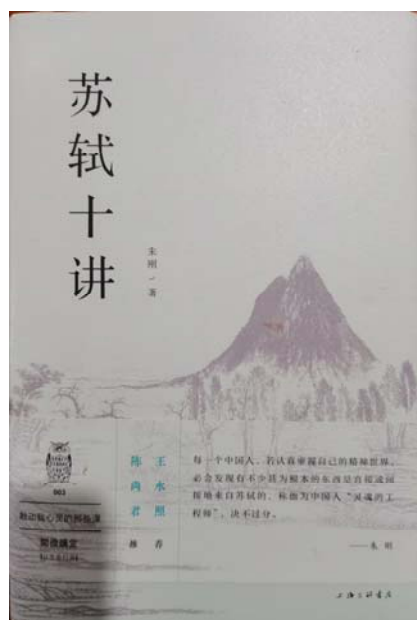
苏东坡词云：“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小时候顽皮不如我，这个毋庸置疑。他家原是五亩园，后来被别人弄到近百亩。我念书的城关一小与三苏公园只隔了一堵青砖墙，翻来翻去很方便。记不清翻墙跳园子多少次，爬树摘鲜果多少次，弹弓射鸟、竹杆钓鱼，更不在话下。

苏东坡显然是我的好邻居，我去他家千百次。当初我有点瞧不起他，现在我尊敬他，我上班的单位研究他。

《品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文人，平均三万字，唯独苏东坡占了五万字。当时我对出版社说：苏东坡是我邻居，能不能多写几页？出版社答复：苏东坡是公元十一世纪的集大成的天才，又是你的乡贤，你还吃过他家的三十多颗荔枝，多写苏东坡完全可以！

刘小川，著名作家，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书名：苏轼十讲

作者：朱刚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889×1194 1/32

字数：314千字

页码：438页

定价：58.00元

苏东坡：一轮叫婵娟的月亮

许 岚

公元 1037 年 1 月 8 日的一场雪。在三苏古宅
呱呱落地

从此，眉州的一轮月亮，中国的一轮月亮，
世界的一轮月亮

从一口古井冉冉升起。从北宋一直悬挂至今
他所照耀的漫漫长路，是风雨、坎坷、泥泞、
江河

是诗词、书画、棋琴、美食、美酒，是悲欢
离合、阴晴圆缺

是魂，是州，是府，是城，是乡野，是庙堂
天下最美、最情怀、最诗意、最温暖、也最
风骨

他的名字，叫苏轼、苏东坡，一轮叫婵娟的
月亮

青神，中岩寺唤鱼池。苏轼，鱼背上的王弗
是您千古初恋的一颗胎记。您的低唤，和沐
浴，使风有了爱

水有了爱。使一山书声、竹声、诗声，也有
了爱

游弋于石笋之上、幽谷之间、瑞草桥中央

眉州，三苏古宅。千古家风家训，为天地立
心

苏轼，母亲的月光。像圣贤范滂故事、纱縠
行的轻纱

古井旁的黄荆条。落在父亲、弟弟和您身上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这一月亮精神，开始在学子东坡心底生根、
发芽

寒窗、襟怀、抱负、华章，终得苏池瑞莲之
文脉

一门三父子之荣光

凤翔，喜雨亭。签判苏轼，您的仕途第一步
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疏浚
修筑东湖

发展凤翔酒业，种植细柳、莲藕、竹子、名
篇

您的第一缕清辉，像一只雨凤凰
在黄土地滋润、飞翔

汴京开封。府推官苏轼，您上书神宗
力言新法之弊，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
“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之谏，终成泡
沫

顷刻之间，一团乌云如幔，罩住了天空
却罩不住您的朗朗光芒

杭州，通判苏轼、知州苏轼。您是定居西湖
的

最辽阔的水月。您两度在这里，修治六井
组织捕蝗、赈济灾民、治理西湖、修筑长堤、
治疫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慈善医院——安乐坊
和大运河、钱塘江一道。将杭州的美
提升到北宋中国第一城的高度

您信手拈来的苏堤春晓、三潭映月

您淡妆浓抹的一丝一缕

平平仄仄地将杭州泼墨为一首诗

一幅天然图画，江南的西子，中国的天堂
世界的天堂

密州，军州事苏轼。您铲蝗救灾、减税治盗
拾养弃婴。一次狩猎，自比杀敌英雄魏尚
弓如满月射天狼。一滴十年生死两茫茫
痴情苦心感天动地，让后来人常思量、永难
忘

忘

超然台，您一次酩酊大醉的思念

一挥而就的一曲《水调歌头》，让公元 1076
年的中秋

永远定格在天下人日日夜夜反复的咏唱中
一轮叫婵娟的月亮上

徐州，知州苏轼。黄楼作证，您亲荷畚鍤
布衣草履、筑堤抗洪。组织民众挖炭、取暖、
炼铁

拯救南山栗林、要斩长鲸

您醉里登上黄茅岗，以石作床

似月醉卧云白天苍

湖州，知州苏轼。您勘察堤堰、治理水患
祈雨祷晴。您悯农、贪吃
赏梅于小梅山。您的点点皎洁

流连于爱山台、墨妙亭、六客堂、水云乡

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挣脱乌台诗案的绳索

您把灵魂折叠成一只飞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从此脱胎换骨。广采民情，您解救弃婴、筹建救儿会

戴着诗词书画的斗笠，您在向阳的东坡，辟土开疆

俯下身予，嗅草木的清香，品人生的肥瘦、春华秋实

您亲手做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东坡羹

和着飘雨的小酒盅，和着黄州子民的幸福
为您的稻麦，送去风调雨顺、颗粒满仓
还有那翰墨天下的《寒食帖》、乱石穿空的赤壁

茫茫月色下的大江

五日登州府，知州苏东坡。昏暗的油灯下
您在宣纸上疾书的《乞罢登州榷盐状》

《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道奏折
像百姓的生命之盐，军事家的铁壁铜墙
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深情地把你凝望
欣喜慨叹。像您倾泻而下的爱恋
韵味悠长

颍州，太守苏东坡。堂前梅花大开
月色鲜霁。您开仓赈难民、治水八丈沟
废止柴米流通税、擒获盗匪
十里荷花菡萏初，《祈雨帖》如甘霖
一场大雪，如西湖月之粼粼波光

扬州，知州苏东坡。您为民请命，免除“积欠”

力戒劳民工程，废除“万花会”
解决漕运困境，推崇扬州美食，开篇扬派盆景

一缕侠骨柔情，像春风杨柳

定州，太守苏东坡。您整治军纪
建立弓箭社、鼓舞士气，以防契丹入侵
南稻北移、手写插秧歌
东坡双槐神龙舞凤，把酒坐看珠跳盆
雪浪石上涌月浪

流放南蛮之地、瘴疠之乡惠州。苏东坡
重塑一座惠民之州，您从恩惠一滴水开始

您在此建塔、筑堤、植梅，为西湖洗眼净心

建立一座失意者的故乡。您说日啖荔枝三百颗

荔枝就丰收了千年，甜美了您的诗篇千年
您说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就丰腴了千年
像您千丝万缕、千年不散的月光

谪居儋州。琼州别驾苏东坡，鸿雪因缘
兹游奇绝冠平生，海南万里是吾乡

您改良民俗、劝化黎汉相亲团结、授徒设帐
传播中原文化、开创儋琼科举及第之先河
珠崖从此破天荒。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您溪边自有舞

雩风

淘去仕途颠簸的失意，褪去少年轻狂的张扬

回归自然的羊肠小道。您也无风雨也无晴
余生欲老海南村。东坡书院，弦歌四起、崇文天涯

歌海诗乡，月色诉衷肠

常州、宜兴。贬官苏东坡，您曾多次游历
上书求归隐，只为溪山好。喜用紫砂壶泡茶、斗茶

携一株海棠，植于友人邵民瞻的天远草堂
北归途中，常州顾塘桥畔孙氏馆
您走完了自己六十六岁的一生
霜雪千年，东坡海棠依旧，像片片红月光

栾城，苏氏源流，苏东坡祖籍地。郟县山水
状若家乡峨眉。您和苏辙完成了一次议定
只为来生还做并蒂莲
还做天下人心中的那轮月亮

往事越千年，梦系魂牵。三苏古祠
捧出了一叠书香，引领我们啜饮宋词之源
百姓、亲人、家国、天下，是我们一生的理想

十八座城池、十八处东坡遗址地
牵手满腔的热爱。我们，寻根、畅游、洗礼、深情守望

我们，以婵娟的声音，祝福世界———

有苏东坡的地方，就有一轮月亮
有月亮的地方，就是故乡

许岚，当代作家、诗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三苏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举行

2020年10月28—29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在眉山市举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在开幕式上讲话并宣布开幕。四川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四川省法学会会长邓勇，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生，眉山市委书记慕新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沈润主持开幕式。眉山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元坤，眉山市委副书记、天府新区眉山党工委书记黄剑东参加有关活动。此次会议主要有论坛和新书发布仪式两个议程。

论坛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共征集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论文276篇。开幕式结束后，部分法学专家学者作了主旨演讲，部分主题征文获奖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中国法学会、四川省委政法

委、四川省法学会，以及眉山市有关市领导，国内高校知名法学教授，苏学专家、学者代表，四川21个市（州）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眉山市地方学者、法学会理事代表，以及新闻媒体嘉宾共200余人参加论坛。

10月29日，参会论文汇集形成的《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苏洵苏轼苏辙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一书发行仪式在三苏纪念馆前举行。三苏文化研究院作为此次高峰论坛协办单位参加仪式并接受赠书。

发行仪式上，眉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周孝平表示，《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苏洵苏轼苏辙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一书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三苏”法治思想研究掀起一个新的热潮，必将促进法治眉山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唐雅兰）

“三苏与眉山”中秋沙龙举办

9月27日，由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中秋沙龙活动在三苏祠消寒馆举行，本次中秋沙龙以“三苏与眉山”为主题，眉山市政协副主席杨常沙、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徐康、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以及眉山本地的苏学专家、苏学爱好者等30余人参加了活动。本次活动还吸引了四川工商学院青昱文学社10多名学生旁听，眉山电视台、眉山日报社跟踪报道。

沙龙活动形式自由活泼，与会专家围绕主题讲三苏故事、谈三苏眉山遗址遗迹、探讨眉

山对三苏的影响、眉山对三苏精神的借鉴等，大家纷纷畅所欲言，遇到有争议的问题你来我往交流见解，毫无保留，场面十分活跃。最后四川工商学院青昱文学社的学生们还对到场专家现场提问，专家们也给出了精彩的回复，学生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每年举办以东坡文化主题的端午、中秋沙龙活动，旨在使东坡文化传播活动丰富化、常态化，让东坡文化融入百姓生活，以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愚）

四川历史名人丛书推广启动仪式举行

传承巴蜀文脉，讲好四川故事。10月15

日下午，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导，新华

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眉山市新闻出版局、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办的“历史谈诵：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暨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播推广启动仪式”在三苏祠东坡盘陀像前举行。

活动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和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就“东坡文化精神的中国意义”进行了名家对谈。全国最美导游、“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晓萍，现场清唱川剧版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让在场的人们领略到了这首词的别样风采。

出版社代表分别向三苏祠博物馆、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军分区、苏祠中学、眉山市图书馆赠送了一套“四川历史名人丛书”。

本次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播推广活动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历史名人丛书的宣传推广，让更多的读者在走进名家经典中学习历史，反思传统，为促进文化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唐雅兰）

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举行

11月10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眉山市人民政府、四川大学主办，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委宣传部、眉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轼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在眉山市举行。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新初出席论坛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眉山市委书记慕新海，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谢海银，四川大学副校长姚乐野出席论坛并致辞。眉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十庆，市政协主席吴小可，中共眉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力出席论坛。中共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迎晓主持行政议程。

受疫情影响，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不仅视频连线收到了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嘉宾的致辞，还通过电视、新媒体、抖音等多种方式录播、直播，为东坡文化爱好者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宴。

今年值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学会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召开了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主要包括修改章程、发展会员、增加理事、总结工作和换届选举等有关事宜。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从学术活动、传播活动、研究成果、学会发展四个方面，对学会近五年来的工作和成绩作了总结。本次会

议的主要成果在于总结了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成立了第九届理事会，从而开启了苏轼研究的新征程，秘书处将采用微信等手段通告未现场参加会议的理事。

东坡教育思想论坛召开

此次论坛以“东坡教育思想”为主题，此次会议共征集论文43篇，其中特约论文10篇、社会论文征集33篇，经评审委员会评选，社会征集论文入选10篇。

会上，18位特约、入选论文作者作精彩发言，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周裕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乐山师范学院原书记、教授杨胜宽，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编审喻世华分别就论文进行了中肯的点评，场面非常热烈。

“东坡教育思想论坛”的召开，旨在深入研究苏轼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索东坡教育思想与学校教育的互鉴模式和互补途径，进一步丰富、完善东坡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

“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花落五佳

眉山生三苏，草木自葱茏。作为三苏故里的眉山，主动扛起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的大旗，2009年召开了首届全国苏洵学术研讨会、2010年召开了首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今天（2020年11月10日），又

在第四届眉山东坡文化学术国际高峰论坛之时颁发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

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的颁发源于一段惊世情缘。痴迷东坡三十载，跨国追随半世情，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眉山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苏学专家、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唐凯琳女士生前先后4次来到眉山，参加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参与对苏学的研究。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之时，罹患绝症的唐凯琳女士毅然决然停止治疗，应邀赴眉，来与她深爱的苏轼、深爱的眉山、深爱的四川、深爱的中国，以及一生敬重的恩师和恋恋不舍的友人，作最后的道别！她不仅拒绝了报销机票，高峰论坛后，她又把主办方付与她的主旨演讲报酬捐赠给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为了让唐凯琳女士的善举和爱心得到传递，特别设立了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裕锴为组长的专家评审组，从《苏轼研究》2019年第1期至2020年第2期刊载的论文中评选青年学者（45岁以下）优秀论文给予奖励。此间刊载的论文中有18篇青年学者论文符合要求，经专家评审组的严格筛选，评选出了5篇获奖作品，分别是：张淘的《苏轼古文在江户时期的接受与批评空间》、万焱的《美国学界的苏轼贬谪心态研究》、徐建芳的《〈周易〉与苏轼的审美鉴赏论》、杨吉华的《苏轼理想人格追求的双重困境与自我突围》、卓夕又的《汪绂〈苏轼论〉评议》。

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的设立，旨在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加入到苏轼研究的行列中来，让苏轼研究走进青年，走进群众，走进

社会，使东坡文化“活”起来、“火”起来、“亮”起来。

编辑出版《十年史料汇编》

2020年9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计划开展系列庆祝活动，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如期开展。经积极争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编辑出版《十年史料汇编》，得到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被纳入第四届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第六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之中同时举行。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40周年《十年史料汇编》（2010—2020年）分为上下两册，包括学术活动、学会发展、苏学专家和新书序评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大致以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学术活动包括第七届理事会（2010/08—2015/10）、第八届理事会（2015/10—2020/09）的工作，分别以年度为单位分类编排，每一年度之前设置工作大事记，之后设置相关资料附录；学会发展包括会员发展、理事变动和会刊编辑等内容；苏学专家、新书序评两部分，则按照会刊《苏轼研究》刊载相关内容的顺序编排。

眉山是文化巨匠苏东坡成长成才的摇篮。近年来，眉山着力实施东坡文化“七个一”工程，不断扩大东坡文化影响，已成功举办三届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分别以“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苏轼书法与绘画”为研究主题，着力推动东坡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熊莉、有愚）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四川交流经验

为进一步推进四川历史名人的研究交流、传承创新工作，11月20日，四川历史名人研究工作推进会在成都举行。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作了题为《苏轼研究：可持续路上行稳致远》的经验交流。本次活动仅推举3个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中心或研究会作经验交流，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是全省众多历史名人研究会中唯一一个。

近年来眉山市大力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认真落实眉山市委慕新海书记

在市“两会”上关于建好研究院、用好研究会指示精神，不断拓宽苏轼研究新领域，设立并颁发全国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有序推进东坡文化讲师团培训活动，探索出了一条苏轼研究可持续发展之路，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受到大会充分肯定。

上一次全省历史名人工作推进会的召开是在2018年11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同样作为全省首批10个历史名人研究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作《开放发展的苏轼研究》经验交流。（熊莉）